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鹿死谁手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作者简介

霍雨佳，68岁，海南省儋县白马井镇人。文史编审。1949年到1992年间，先后任湖北日报编辑、海南日报编辑组组长、海南师专学报主任、海南大学学报主编。现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领导小组历史学科规划组组长，海南省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出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华民族智慧的研究。已出版《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三国智谋精粹》、《三国演义用人艺术》、《三国演义谋略新探》、《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后三书已在海外多次再版发行。现在出版的“智慧四书”，即《权利之争》、《攻心有术》、《鹿死谁手》、《人际是非》，是霍雨佳编审继研究《三国演义》之后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

自序

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伟大祖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感到自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祖辈辈遗留下了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丰富历史遗产，其中积淀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在这“优胜劣汰”的时代，中国人要想登上世界舞台占得一席重要的位置，不是依靠别的，而是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在竞争中智者胜，这个古老的真理，又为今天世界上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实践加以发扬光大，无疑是我们重要的历史使命。

古老的智慧不将之创新，就不能发展，“四大发明”诞生于中国，因没有很好利用，在中国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是，“四大发明”流传到了欧洲，促进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出现。不前进就落后，落后就挨打，中国人正因此曾经尝尽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苦头。

智慧要积累和继承才能发展。这是因为人们认识每一事物，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思考；要证明一个真理，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考验；要有所发明，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试验。这就是说，经过我们的先人一代接一代对客观事物的努力探索，积累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民族智慧的素质是有所遗传的，故中国人的智商是较高的，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将会发挥出来。事实正是如此，今天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在激烈竞争中出人头地，涌现了不少科学巨子和经济巨人；他们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结合民族智慧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可见，要发展必须继承。当今中国人要想在国际的各种竞争中取胜，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智慧。过去，每当发现自己落后时，便出现“学西方热”，对自己则“妄自菲薄”，只强调传统文化糟粕的一面，连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也否认了，有人甚至主张不读中国书。学习别国的优秀文化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但否认自己的优秀文化显然是极端错误的。笔者对此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的。在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记者、编辑生涯中，工作之余，我一直喜读古代书籍，尤其喜读“廿五史”。这是一套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宝贵的中国古代系列丛书，是二十五部纪传体史籍的总称，全部有三千八百一十一卷，共五千四百六十一万八千字。记述了上自黄帝起，下迄清代止的全部历史。这套古史籍的鸿篇巨著，既是祖国文化的宝库，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总汇。将其中能启人智慧、广人知识、长人才干、供人借鉴的典例分类评述。显然是根有意义的。为此，笔者以“廿五史”为主，参考其他史书，撰写了《权利之争》、《攻心有术》、《人际是非》、《鹿死谁手》四本小册子，合称“智慧四书”。希能对读者有举一反三的启迪作用。

霍雨佳

1993年5月31日写于海口胤园

前 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分到合，既有其历史必然性，抑亦有赖于人谋。分时，群雄崛起，逐鹿中原，而鹿终必归于最善集众智众力的强者，这已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所证实的一条规律。

自春秋战国到满清，中国社会分合，即从分裂到统一，反复十次，出现了十个开国皇帝，创建了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十个封建王朝。在这十个开国皇帝中，除个别情况独特，本人较平庸外，其他九个开国皇帝都有超人的本领，他们能统一中国、登上帝位都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他们能大一统，既有其共同点，也各有其特殊性。所谓共同点，是指他们善于用人，策略正确，人心向往；所谓特殊性，是指其人素质，即其性格、为人、作风及才干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这与处境、条件各异有关。如有的平民，有的是贵族，有的是军阀，有的是诸侯王，有的是公子，有的是塞外民族首领。这就是说，有些人原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有些人有所依靠或继承先辈的基业，有些人早就大权在握，他们的性格、为人、作风及图天下的手段也就各有其个性。而他们各自的机智和个性对其创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在评述他们创业的共同点时，还着重探讨每人创业的特殊性，使人更能全面了解他们成功的秘诀。而在每一章里，虽然将他们置于中心地位、但总是从他们所领导的集体着眼，因为其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由于能用众智众力之故。

当今世界合国的斗争，主要是在政治、经济领域上，尤其集中表现在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将各国、地区和厂、商汇集其中，而彼此拼搏之激烈残酷，有如群雄逐鹿中原，虽不流血，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且两者成败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非凡的胆识，同样是难于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以至取胜的。所以，参考在群雄逐鹿中原中的得鹿者的成功经验，也许有所启迪。

霍雨佳

1993年8月20日写于海口胤园

绪论论“逐鹿”胜败

在人类社会上，人们之间的任何竞争或较量，尽管其种不同，其类各异，内容也不一样，但取胜的，都有其共同的规律可循。违反这个规律，必将失败。概括而具体他说，胜败决定于素质优劣、用人当否、决策正误，这就是说，取胜的共同规律是素质优、用人当、决策对。这三个因素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因为素质优，才有可能用人当，决策正确；用人当，即用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为主管者提供各种正确的策略，供其明断。即使主管者能自己提出正确的决策，用人不当，也得不到正确贯彻执行。所以，必须充分发挥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才能保证取胜。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从分裂到统一，反复十次，逐鹿中原的英雄上千上万，而得其鹿者只有十人而已。探讨他们取胜的原因，也正是遵循着上述取胜的共同规律，即素质优、用人当、决策对这三十因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以遵循或违背这个共同规律总结英雄逐鹿中原的胜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一切创业者显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探讨这个取胜的共同规律，并不是说他们取胜的方式、方法、内容都相同，事实上，由于他们各人的思想、处境、条件各异，其所言所行也就截然不同。但他们在取胜的征程上，不是“分道扬镳”，而是“殊途同归”。我们在着重研究其“殊途”时，终于得出了其“同归”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于在人际间的任何竞争或较量者，要想取胜，必须遵循。

一、素质优劣与胜败

素质，是指人的性格、为人、作风及才干等等，简单的说，即是德才。德才兼备，对于一切创业者事业的成败，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不论是要创大业或小业，必须有一批得力的骨干和支持者，其人有德，就得到众人的敬佩、拥护，为之献智竭力；有才略，则能临机明断，作出正确的决策，带领其部属去争取胜利。如果，其无德，人心则离散；无才，决策则会出现错误，把事业搞坏。良好的素质对创业所产生的威力，古代不乏其例，宋太祖赵匡胤就巧妙地运用其德才夺权和统一天下。他以武力为后盾，却引而不发，导演“黄袍加身”和禅位的故伎，以赎买政策让北周的幼帝、皇太后和贵族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使他们乖乖地交皇权，跪下称臣；又以同样的赎买政策，独出心裁地以“杯酒释兵权”，使他的那些拜把兄弟退出禁军——这是经常发动兵变的策源地，从而把兵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不再出现政变和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的局面。夺皇权军权而不用流血，这在历史上是名副其实的和平过渡。而其夺权手段之高明，导演艺术之奇绝，令人叹为观止。之后，他施展“恩威并济”的软硬两手以统一天下。先是用“假途灭虢”之计，兵不血刃轻取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随即出兵西蜀，那些蜀兵因投降可保脑袋，遇见宋兵，没有人为蜀主孟昶“东向发一矢”，孟昶只好投降。于是，越过五岭消灭南汉，那位奢侈、残酷的刘 乞降。对于吴越国主钱俶、南唐国主李煜，宋太祖一贯以恩结，建“礼贤馆”以待之。钱俶倒是诚心巨服，曾到开封朝见宋太祖得先住“礼贤馆”，待之以隆礼，使钱俶感动得哭泣。但李煜表面服而心不服，既然其他南方割据政权已先后消灭，宋太祖已不能让他“卧榻之侧侧睡”了，便起兵灭南唐，这位一生在词、酒、

女人中混过日子的浪荡子，在醉梦中被俘了。

人的素质，有先天的，有后天的，而以后天为主。所谓“先天的”，是指遗传的；所谓“后天的”，是指人们经过实践在发展中形成的素质。有时低劣的素质经过实践改造而趋向完美，有的就从好的素质向坏的发展。刘邦和项羽便是这两种典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无赖，酗酒，好女色，喜吹牛，乐于交友，攀官结府，不务正业，对这样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能创大业，做了皇帝。可是，在战争实践中，他的素质的一些劣根性得到了改造，其良好的得到发展。如他初入秦宫时，住进了豪华的宫殿，拥抱美丽的宫女，使他乐而忘返，以樊哙、张良的提醒，说是步着亡秦的后尘，他苏醒了，只好割爱回军霸上。由于他为人慷慨大度，陈平要实行离间计需钱，就给他大把的钱，怎样花，从不过问；别人有大功，他就给你封王赐地，故人们愿意为他效命。又因他因喜交友，宽客人，什么人都交结，把各种人团结在其周围，因而人才济济，帮其打天下。至于项羽，他为人正派，仁而爱人，对于老战友还很讲义气，所以，范增几次劝他除掉将与他争天下的心腹之患刘邦，他都舍不得下毒手。可是，他却对秦人很残暴，破城屠城，所过残杀，埋秦降卒二十余万。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与秦有不共戴天之仇，报仇报过了头，没有汉光武帝的“为天下不计私怨”的度量。他对秦人如此残暴，实是调动秦人起来反对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他的致命伤。

勤俭是建国之本。在历史上，凡创业之主，大都勤劳节俭，而衰亡之国其主莫不奢侈厌政。北周宣帝统治北中国时，因其荒淫、溺于酒色，巡行游乐，不理朝政，后竟禅位于七岁的儿子即静帝，专事享乐。及杨坚辅政，提倡节俭，政治清明，大得人心，顺利使周静帝禅位。他以勤俭兴，也以勤俭治国，使隋朝成为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迨隋炀帝，因其奢侈无度，人民不堪其苦，是造成隋末天下大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唐之兴，也因唐太宗勤俭，不扰民，人民归心。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时，勤俭治理，公私分明，使元朝更加强盛，故能入主中原。被元先后灭亡的金国和南宋，其统治者都是荒淫无耻之徒，金宣宗被元所逼从中都迁到汴京后，竟忘了国难临头，仍然纵情酒色；而掌握南宋军政大权的贾似道，元兵大举入侵时，还躲在其安乐窝——葛岭，在美女群中日夜淫乐，甚至关起门来邀请老赌友赌博，跟群妾斗蟋蟀。南宋、金国统治者如此，不亡何待。元到其末代，统治者贪污腐化也十分惊人。为满足蒙古人游猎、欢宴、淫乐，元统治者不断加重赋税，频繁赏赐土地，连原耕地的农民也一起划归蒙古贵族当奴隶，少的数十户、数百户，多的十万户。于是，又从治到乱，群雄崛起，而大多是刮民以自肥，如陈友谅、张士诚，故难成气候。只有朱元璋与从不同，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所恃的是“布信义，守勤俭。”因此，他开创了明王朝。可是到明末，朱元璋的后代也逃不掉亡国的规律，昏君辈出，奢侈无度，不理朝政。到亡国之君崇祯皇帝虽勤于朝政，不近声色，但其用来监视全国而无所不在的十万宦官，为所欲为，成为全国贪官污吏的保护人要向他们贿赂，就可升官，犯罪也不受惩处；不然，即使你忠心于国，不从宦官勒索，一句话便使你降职、撤职，以至斩首。崇祯皇帝大喊要惩治贪官污吏，却信任纵容宦官，使腐败之风越刮越大，一直到明亡。李自成在元末大乱中虽推翻了明王朝，但其将相大都开始腐化，入京后不是忙于军国大事，而是忙于追赃和搜美女。而在东北一隅兴起的满清王朝，以其勤俭的良好风气一改明末的腐败现象，得到了人民的欢迎。据有人统计，明宫廷每日斤支白银三万两，而清宫廷每日开支只有

三十两，相差达三百倍，可见，明廷何等奢侈。而奢侈必加重人民赋税，节俭就能减轻人民赋税，当时满清能够统治偌大的中国，节俭减税是原因之一。

二、能否用人与胜败

能否用人，对一国之兴亡至关重要。得人才始能开创大业，夫人才将国灭身亡，这已为历史所证实。

秦国之兴，是因其能用天下士。秦穆公用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并十二国，称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打败楚、魏，拓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连横策，破六国合纵，迫使六国服从秦国；秦昭王用范雎，蚕食诸侯。由于秦国四代君王广招天下人才，善于用人，使秦国从一个西方弱国变成了天下强国。及秦王政亲政，采用李斯、尉僚等客卿的计谋，终于统一了天下，秦王政能用李斯、尉僚，是因他本人有雄才大略，能识人才，并虚心下问，客人纳谏，不然李斯、尉僚等才智之士则不能为秦所用。秦国因郑国案件，下逐客令，李斯便上书谏，以秦用客卿而强的事实以驳逐客之非，秦王终于醒悟、取消逐客令。不然，天下士将不为秦国所用，可以肯定，秦将不能一统天下，尉僚来投，秦王奇其才，十分重视，常虚心下问，甚为谦恭。尉僚对秦王政有看法，对人说“秦王为人少恩而有虎狼心，需人辅佐时能卑谦待人，得志将会杀人。”认为“这种人不可久与交游。”于是，逃走。秦王政派人追问尉僚后，对他严厉批评自己的话毫不介意，而是更重用他，言听计从，任他掌管全国军队。正因秦王政明于知人，虚心下问，容人纳谏，李斯、尉僚的才能才得到充分发挥，对秦统一六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可以说，秦能统一六国也是因能用天下之士。反观六国统治者，不只不能用人，甚至糟蹋、逼害人才，上述秦国所用的人都是因此投奔秦国，这实际是为秦国输送人才，帮助秦消灭六国。

在楚汉战争中，为何刘邦能以智败项羽？本来，刘邦并非智者，他不读书，不学兵法，谈不列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才能。而项羽是将门子弟，受过教育，有家传兵法。两人比较，论军事知识，刘邦比不上项羽；论才智，项羽比刘邦高；论力量，项羽比刘邦强得多，项羽是个“力拔山”的盖世英雄，而这个盖世英雄竟败于这个普通平民的手里，这确是怪事！但说怪也不怪，刘邦虽无奇谋深策，他能把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起，将他们的才智拿过来为己所用，这就是说他集众智成大智。而项羽自恃有才智，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别人的话不愿听，不只蔑视身边卫士韩信，对具屡次献策置之不理，连他的“亚父”范增说的话也当耳边风，于是一个个的智谋之士，如韩信、陈平等都溜到刘邦那边去了。

最后，唯一的一个谋士范增也走了。这就只靠他个人的独谋独断了。而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这么一来，刘邦因能集众智而成大智，其才智就比项羽个人的才智胜得多了。所以，项羽要求与刘邦单独一决雌雄时，刘邦说：“我宁斗智，不斗力。”

智慧是会变成无穷的力量，过去屡战屡败的刘邦，因有众智之助，力量就越来越大，在垓下决战中，将项羽重重包围，在“四面楚歌声中”，这位西楚霸王虽英雄，拼着命一个人杀死了汉兵数百人，但终抵不过汉的千军万马，逼得他在乌江自刎！刘邦终于以智取胜了。汉胜楚败，归根到底，还是用人问题。刘邦用人政策是“五湖四海”，项羽用人只限于其宗族和妻族，

而用人来自“五湖四海”，必然多杰出人才；用人只限于宗族妻族，必然人才少而庸才多，彼此智力相对比就有天渊之别。胜利最终是属于智者，汉胜楚败是必然的了。

重用一贤才，有才能的人就被推荐上来；重用一佞臣，其他的谄媚之徒也就聚集在一起。这正如常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杨坚在他未即帝位前，已十分注意罗致人才为己用。其中，他特别欣赏高颀的才能，收他于心腹谋士。高颀感知遇之恩，信誓旦旦表示，即使灭族也在所不惜。杨坚即位后，军政大事都与他筹谋。杨坚跟他谈及征代南陈时，他提出灭陈方略，并推荐韩擒虎、贺若弼、杨素等人，在伐陈战争中。这三人都立了大功，成为一代名将。而南陈国主陈叔宝重用的是谁呢？就是那位帮闲宰相江总，于是跟他在一起的必然是帮闲官僚如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人，正是这一些人组成一个帮闲帮，整天围绕在陈叔宝的周围，吟诗饮酒，跟在张贵妃、孔贵妃屁股后面，捧场混过日子。这些人吹牛、胡扯还有一套，有时确是妙语惊人，令人捧腹，而让他们参议国家大事，这简直是开玩笑。当隋兵快要临城下时，陈叔宝还轻蔑他说：“王气在此，其奈我何！”坐在帝边的牛皮大王孔范帮腔说，“如隋军敢渡江，臣要升为太尉了！”于是，人家心安理得，欺人自欺，歌舞、纵酒、赋诗如常。而“王气在此”帮不了陈叔宝的忙，他在醉梦中当了俘虏；孔范没有“当上太尉”，而是脑袋搬了家。

唐太宗麾下的将相，大都来自敌营，却效忠于唐太宗，为之献谋竭力，统一天下。而隋炀帝待其贴身将士不薄，待遇优厚，经常奖赏，但到头来竟被其心腹将士所缢死。唐太宗和隋炀帝的下属待其主不同如此，这是什么原因？这与两人素质截然相反大有关系，因为什么样素质的人就重用什么样的人；而君主的素质如何对于择主的人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唐太宗有志于为民除害以治国平天下，其用人不以个人恩怨而定，主要是看其有没有为国为民做事的才能。魏征为其宿怨，他也不计较而重用之，终使魏征成为一代诤臣。房玄龄、杜如晦原都在隋当官，因知隋将亡，便弃官不仕，后知太宗将有大为。便毅然杖策投在麾下。秦叔宝程知节因憎其主王世充奸诈，敬慕太宗以诚信待人，便弃暗投明，从此，铁心不二，身先士卒，为太宗南征北伐。来自敌营的尉迟敬德因感太宗的知遇，拒绝太子建成的收买，始终对太宗忠心耿耿。唐太宗能创大业，实靠这些文臣武将的效忠。隋炀帝则不同了，他即帝位后，穷奢极侈，独断独行，为所欲为。谁违其意，撤职，诛杀；准听他话，信任，升官。于是原不是佞臣的人也学会阿谀奉承，一切视他的颜色行事，谄媚之徒就更大施其伎以取得高官厚禄。而佞臣绝不会忠于一主，都是看风使舵的人，这时忠臣已都被杀光，故当江都变起时，竟无人效忠于他，被他一贯宠信的“心腹”将士缢死了。

明末崇祯皇帝和清开国者皇太极，都想起用有才能之士，但崇祯帝想用而不能，皇太极想用而能用，其原因无他，在于能否信任而已。崇祯帝跟他前几代“混世魔王”不同的是，他不纵情声色，在内忧外患交煎下，勤于国事，想挽救危亡，渴思用非常之才。当时是否有非常之才，有的，且他也得用了，这人就是袁崇焕。他坚守宁、锦防线，使满清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能信任袁崇焕，让他充分发挥其才智，满清要想入关是不可能的。可是，皇太极一用反间计，他便把袁崇焕杀了，这实是自毁长城。他之所以杀袁崇焕，是因其为人猜忌多疑，往往凭主观猜测而疑人，加上其人刚愎自用，不经过调查研究，不分青红皂白，把毫无根据的事当成事实，一怒之下便中了

皇太极的离间计。对于其他不少将相，也因此而被他撤职或处死。这样，剩下的只有他这个自以为高明实是庸才的皇帝，以及他最信任的十万草包宦官，而他们只能给他帮倒忙，一直至明亡。能否用人，往往决定于能否信任人，不能信任人，所用的人的才智就不能发挥。疑而不用，用而不疑，只有充分信任所用的人，才能使其充分施展其才能。这是一条用人的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满清能兴起，主要原因之一是皇太极能用人，而他能用人，是因为他能信任其所用的人。如汉儒范文程因有才能，甚得皇太极的信任，而其信任的程度达到所言都照办的地步。对于汉将就千方百计争取过来，并予以信任，让他们独当一面，甚至封王。也正因此，这些汉儒、汉将也就为之卖命。满清能入主中原，其信任汉儒、汉将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决策正误与胜败

决策正确与否对于胜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我国历次逐鹿中原的战争中，给予我们很丰富的启示，在这里择其要者而评之。是否有了正确的决策，就可稳操胜券？未必。秦经过穆公、孝公、惠王三代的努力，已成为当代的强国，开始东向征伐，不断蹂躏关东邻国。六国为共同利益便合纵以攻秦。秦用张仪连横策以破六国合纵。对于六国来说，合纵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秦国来说，连横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合纵策被连横策破了？这是因为任何正确的策略，仍需要去正确贯彻执行，能执行就显示其威力，否则，就不可能起作用。

合纵策是正确的，如苏秦组织的六国合纵攻秦就旗开得胜，曾使秦下敢出函谷关。问题在于：六国并不一心，各怀鬼胎，各顾各的，只各顾眼前而不顾后患。秦国正是利用六国这些弱点，用连横策去瓦解六国合纵，合纵策就起不了作用。迨秦昭王，他用范雎的“远交近攻”策，对六国进行兼并战争，这是连横策的继续和发展。秦王政亲政，统一中国的战争已提上议事日程，执行“远交近攻”策更具体化，采纳李斯、尉僚之计，以重金收买、离间六国君臣，将之各个击破。先是使齐、楚中立。韩、赵、魏是齐楚的屏障，秦撤这些屏障，齐、楚却袖手旁观。这样，齐、楚也就暴露在秦国的刀锋之下，其末日也就到了。秦就这样消灭了六国。

弱者与强者较量，理应强者胜，但也常有弱者胜强者，之所以如此，这有赖于决策正确。刘邦之能战胜项羽，是因他善于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楚汉战争开始时，刘邦还见不及此，他以强力与项羽较量，结果吃了大亏。他趁项羽出兵镇压东方的诸侯国叛乱，便暗渡陈仓，连下三秦，接着联合诸侯兵五、六十万，一举攻下彭城。刘邦胜利冲昏头脑，日夜置酒高会以欢庆胜利，毫无戒备。这时项羽突然从前线连夜回师袭击。刘邦军大溃，落入淮水的就有十多万之多，刘邦仅以数十骑逃脱。吃一堑长一智，刘邦知难与项羽硬拼，便采纳张良的计谋，决定以防御为主，在滎阳、成皋之间与项羽坚持，以阻止项羽入关中，使关中能保证兵、粮的源源供应，以进行持久战，派韩信率军北上攻城略地，从侧面威胁项羽的后方。派彭越在其腹地游击，神出鬼没地袭击其运输线，以断绝其粮道。这就避开项羽善于攻坚战长处，击其后方虚弱之处。使项羽受到前后夹攻，因而顾前失后，顾后失前，往来疲于奔命。尽管项羽屡战屡胜，但实力不断消耗，形势发生有利于刘邦的变化，刘邦越战越强。最后，刘邦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将韩信、彭越、英布等

兵力也全部汇集到垓下，终于彻底打败了项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即使是最明智的人，也不能事事能预见。因此，既不能都按照原有部署行事，也不能照搬兵法。将帅要善于从战争的实际形势出发，作出正确的决策。唐太宗李世民就有这种本事，能临机果断，取得胜利。而与他同时代的逐鹿英雄，就往往临机失措，致遭失败。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率十余万兵来救援。当时不少唐将恐被前后夹攻，背腹受敌，主张撤退。唐太宗力排众议，断然提出“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他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世充粮尽，上下离心，不用力攻，可以取胜。”而“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我据武牢，扼其咽喉。彼如敢冒险争锋，我取之甚易。”这一战，实是一次决战，唐兵胜，统一天下就成基本定局；如撤兵，让王世充与窦建德并力，就如李世民所说“其势必盛”，这样，战争就难分难解。因此，李世民反对撤退是完全正确的，结果战争正如世民所预料，终于打败窦建德军，俘虏建德，逼降世充。而建德之败，也因其失于明断。世民据武牢，使建德进退两难。祭酒凌敬建议率军渡过黄河，直取山西汾阳、晋阳，趋向蒲津，既可拓地收众，又可威胁关中，如此洛阳之围自解。建德却以“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弃信”，认为“不可”。为小信而不纳良策，致兵败被擒。杨玄感是第一个起兵反隋炀帝的人，李密曾为他献起事三策，即上策截炀帝归路，中策占据西安，下策袭取东都。玄感却采取下策，结果正如李密所说：“天下兵到必危。”自取灭亡。如玄感不采取上策，而采取中策，以其在关陇的势力，炀帝要想镇压也不易。如此，形势将有所不同了。

朱元璋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自己的策略，并小心谨慎，即使力量强大时也不轻敌，而是立足于万全而后战。他摆脱郭子兴的控制而独当一面时，因力量还弱小，仍打起韩林儿政权的旗帜，作为保护伞。及其占据集庆后，采纳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集中力量将集庆建设为根据地。这时，对西面的陈友谅、东面的张士诚以防御为主，向元兵防守较弱的东南地区拓地以扩充实力。当其力量强大到足以与陈友谅、张士诚较量时，接受刘基的“先攻友谅而后士诚”的作战方针，因为这一方针跟他自己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如先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则疲于应敌。”故同意先与友谅决战。消灭友谅后，士诚势较弱，但朱元璋并不因胜利而轻敌，他不同意大将常遇春直捣姑苏，而是主张用“先剪羽翼，后捣心腹”的战术。在与众将谋议灭元时，常遇春也主张进捣元都，朱元璋还坚持用消灭张士诚的战术，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朱元璋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战争有关生死存亡，非不得已，决不能冒险，更不能轻敌，历史上不少百胜将军多败于一时疏忽或轻敌，必须立足于万全。朱元璋正因此，才能芟除群雄，消灭元朝，创建明朝。

跋

由于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拙著《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三国智谋精粹》，该社杨岗副编审经常与我有信往来，我们神交已久。杨岗副编审曾约我有空到京商谈长期合作问题，我趁今年五月间到浙江富阳县参加中国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之便，顺道到京拜访，我们一见如故。我将我撰写的“甘五史类评”的四本书稿（现改为“智慧四书”）的提纲交给杨岗副编审，他看了当即答应“四书”一起出版。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已向韩天雨总编辑汇报，并征得其同意，嘱我将书稿尽快整理寄来。我对中国经济出版社处理书稿的果断、快捷和魄力，深为赞赏和感谢。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深深地体会到“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酸甜苦辣，编辑编改的好作品，人们赞美的是作者，编辑自甘默默无闻。如这“智慧四书”，该社编辑同志费了很多时间审改，并对有关史料、典故逐一稽考核实。仅是书名，杨岗副编审与韩天雨总编辑就商量过多次才最后改定。这套丛书如为读者喜欢，有益于社会，作者不敢专美，因该社编辑也花了不少宝贵的心血。在此，特向中国经济出版社深表谢忱。

霍雨佳

1993年8月13日写于胤园

鹿死谁手

第一章 秦灭六国

春秋时期（前 1722 年——前 481 年），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大国争霸。当时周王朝徒有其名，实权实际掌握在霸主手里，而任何霸主也无力统一天下，取周王朝而代之。这个时期开始共有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其中最强的有晋、楚、齐、秦、吴、越等国。由于大国常对小国兼并，战争极其频繁，据鲁史记载，列国间军事行动有四百八十八次，朝聘盟会四百五十次，总计九百三十二次。而所谓朝聘盟会，实质是大国对小国的剥削掠夺，人民遭残杀和迫害之深可以想见。自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到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史称战国时期。初有二十余国，其中以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最强，这七国互相讨伐，争城夺地，战争同样极其残酷，孟子形容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仍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春秋战国时期，共计有四百二十五年之久，可以说是我国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而人民所受到的兵灾之害又如此之深，人民厌战、盼望统一是必然的事了。而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战国时，其他六国君王都不能完成，只能落于秦始皇肩上，其原因何在？

一、改革图强

在战争频繁、兼并不断的战国时代，任何国家求生存，除了改革图强外，别无他途。这是由于社会在发展在变化，旧的政治、军事或社会制度已不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因此，战国时秦和魏、楚、赵、韩、齐、燕等七国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或变法。

1. 秦国改革最彻底

当时凡是进行改革或变法的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约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魏文侯任李悝为相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方面，他削弱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并制定《法经》。在经济方面，他提倡“尽地力之教”和“善平余”。《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李悝认为“余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勤。”李悝实行“尽地力”和“平余”，“行之魏国，国以富强。”使魏国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国家。经李悝改革之后，楚国吴起也约在前 391 年之后不久进行改革。他“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其旨在强兵，使楚国由弱变强，“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赵、韩、齐、燕四国，也先后进行了一定改革，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由于六国改革不彻底，成效不大，这与守旧势力强大有关。如因吴起“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即裁汰冗员，废除贵族特权，侵犯了楚国贵族和官僚的利益，故“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终被射杀。吴起一死，其法尽废，楚国又恢复老样子。

在七国的改革或变法中，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较全面较彻底，取得的成效最大。

在变法前，秦国是战国时较弱的国家之一，与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的经济、军事文化都比较落后。当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狄

遇之”（《史记·秦本纪》）。这时，秦国的守旧的贵族势力较强大，权贵垄断政权，争权夺利，政治黑暗，国力薄弱，国土常被侵占。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立，为改革图强，下令招贤。在魏不受重用的卫国人卫鞅应招入秦，以霸道说秦孝公引起重视，陈述他的“强国之术”，孝公大悦，决定用卫鞅变法。

但是，秦守旧势力一听说要变法就极力反对，这使孝公犹豫不决，“恐天下议己”。卫鞅便对孝公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有高贵品德的人，绝不随波逐流，建立大功业的人，也绝不去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所以，圣人认为，如能使国家富强，可丢弃旧的传统，只要能利于人民，可不必遵循古代礼制。”孝公赞同说：“你说得对！”大臣甘龙不同意说：“不对！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教化人民，可不用劳心而取得成功；遵循传统的法令规章处理国事，官员们熟悉就可胜任，人民也容易接受。”卫鞅反驳说：“甘龙说的是世俗之言。普通人习惯旧的一套，专家学者就局限于其所闻。这两种人，适于居官守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制定法令，愚蠢的人遵守旧制；贤者改革现状，庸碌的人固步不前。”另一大臣杜挚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复古者不可非议，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对卫鞅反驳守旧派甘龙、杜挚等的言论极为赞赏，立即任卫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见《史记·商君列传》）。

卫鞅实行变法的内容，计有九条，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政治：1. 编制户口，定“连坐之法”。编制户口，五家为伍，两伍为什。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2. 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将若干村组成一乡，若干乡组成一县，将秦地分为三十一个县，每县设令丞，以掌政事。二、军事：1. 立军功的人，各按其功劳大小，授予较高的职位；为私斗的，各按其情节轻重，处以刑罚。2. 宗室没有军功，也不得给爵秩；3. 为表彰奖励有功劳于国家的官员将卒，制定尊卑爵秩等级（共二十级爵），规定各级爵位占有田宅、奴婢的数量和衣服的等次。有功的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无功的，虽富有也不得铺张。三、经济：1. 加强劳动力。每户有二男以上不分居的，就加倍其赋税；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这样可避免互相依赖，劳逸不均，加强生产中的自动性。2. 重农抑商。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工商活动及因怠惰而贫穷的、全家没收为官奴婢。3. 废井田，开阡陌，平赋税。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准许土地买卖。4. 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

卫鞅的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使一个曾经是贫穷落后的秦国，逐渐变成富强的国家。

卫鞅对秦国另一重大贡献是，使秦国能东向控制其他六国。齐败魏兵于马陵，俘虏魏太子申，杀魏将军庞涓，卫鞅认为这时是伐魏的良机，于是对秦孝公说：“秦国跟魏国，互相是对方心腹之患，不是魏并吞秦国，就是秦并吞魏国。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魏处于险要的山岭之西，建都于安邑（山西省夏县），西面距秦国以黄河为界，东面独擅山东（崤山以东）之利。战机有利时则西侵秦，否则可安踞东方广阔平原富裕之地。今由于君王贤圣，

国赖以富强。而魏去年被齐国打败，附庸国纷纷叛变，我们可利用这个时机伐魏。魏国必不能支持而东徙，这样，秦国就可横跨黄河，凭藉山隘的形势，东向以制各诸侯国，这就能成就帝的大业。”孝公赞赏其策，就令卫鞅将兵代魏。魏使公子印率军迎击。当两军对峙时，卫鞅致书公子印说：“昔日在魏国时，我与公子交好，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想与公子相会结盟，乐饮而罢兵，使秦、魏两国相安。”公子印天真地相信了前来会盟，当两人欢饮时，卫鞅的伏兵突起擒公子印，随即趁机向魏军发动进攻，大破魏军。魏惠王知魏军被打败，十分惊恐，便派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求和，而首都安邑已暴露于秦前，只好迁都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卫鞅破魏回秦，秦封给他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卫鞅为商鞅。

商鞅变法虽使秦国强大，但侵犯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因而对商鞅恨之入骨髓。前338年，孝公死，太子继位，是为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反扑，诬陷商鞅以“谋反”罪而将其逮捕，将之车裂。商鞅既死，因商鞅新法取得卓越成就，使秦国富强，秦统治者仍继续实行，为秦国成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奠下了基础。

2. 七国中秦国最强

秦国经商鞅变法以及尔后几代的努力，政治、军事、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秦始皇即位的时候，其综合国力已远远超过山东六国中任何一国，秦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且已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条件。

经过多年的兼并，秦国占有了辽广的土地，计有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荥阳及周国旧地。关中地区又肥沃。秦昭王时，蜀地太守李冰造都江堰，灌溉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郑国渠造成后，灌溉四万余顷，农业生产更大发展。秦具有如此肥沃的两大农业区，加上巴、蜀出产铜铁木材，两北戎、狄地区出产牛羊，丰富的资源，足可支持秦进行统一战争。在政治上，官吏奉公守法，朝廷清静；在军事上，不论何人，打胜仗者赏，打败仗者罚，故人人奋勇，求得军功。荀子曾到过秦国，他在《荀子·强国篇》里认为秦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军队是无敌的，即使是六国最能战的魏国武卒，如碰上秦国的锐士，也无异以卵击石。

尽管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比六国中任何一国都占有优势，但没有正确的政策和英明的领导，其优势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秦昭王未任用范雎前就是如此。秦昭王即任初期，国家权力掌握在宣太后及其弟穰侯的外戚集团手里，他们为私利而误国事，对外政策又犯错误，使秦国无大作为。秦昭王解除穰侯相位，任用范雎后秦形势大改观。范雎最大的贡献是为秦制定“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他向秦昭王批评了穰侯对外政策的错误说：“大王之国，关塞险阻，锐卒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是王者建业之地。而民又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以秦国之强，用以制列国，好像凶猛的猎狗搏击跛脚的兔子。可是函谷关却闭关十五年，不敢出兵以图六国，是穰侯为秦谋不忠，大王之计也有所失。”接着范雎指出了穰侯“越国进攻”的错误：“穰侯越过韩、魏两国而去进攻齐国的刚、寿，是一大失策。由于越国远攻，少出兵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对秦国有害。过去齐湣王南攻楚国，破军杀将，拓土千里，却得不到寸土。齐不是不想占领楚地，是因形势

不允许之故。后来，各国见齐国力枯竭，便联合起兵攻齐，齐国几乎灭亡。齐国虽大破楚国，却肥了魏国和韩国。有鉴于此，我认为秦国的对外战略应是‘远交近攻’、这样，得一寸土地，就永远是秦国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永远是秦国的一尺土地。韩、魏两国位于中国的核心地带，大王如果想称霸天下，必将之据为己有。”秦昭王大喜，便纳其策。过去，秦国缺乏正确对外战略，全凭武力，东征西讨，与六国为敌，所得有限。实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后，出现了大好形势，秦昭王开始进行统一战争。迄秦王政即位，继续执行这一战略，对六国进攻有如摧枯拉朽，使之土崩瓦解。

吕不韦对促进秦国强大和推进秦统一中国大业也是一个有功之臣。据《史记·吕不韦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吕不韦因帮助秦庄襄王有功，得任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死，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政年少，初即位，国事由不韦处理。秦王政二十二岁亲政前，即在吕不韦掌握秦国军政大权的十二年中，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取得卓越的成绩。在政治上，他选贤任能，用李斯为舍人，任秦昭王时名将王龔、蒙骜为将军，请已退休的老臣蔡泽参预朝政。在经济上，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因修建郑国渠，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在军事上，继续执行“远交近攻”的战略。灭东周，伐韩、魏、赵，兼并大片土地，使秦版图在六国中首屈一指，造成了分割包围三晋的形势，使韩、魏、赵岌岌可危，为消灭六国奠下了基础。在思想上，吕不韦广招人才，聚集于他门下的有三千人。他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书名《吕氏春秋》。此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广泛领域，主要是为秦统一中国制造舆论，并为统一天下后治理国家作好准备。

经过秦国几代的努力经营，特别是秦孝公、秦昭王和商鞅、范雎以及吕不韦等君臣的精心等谋，秦国不论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都比六国占优势，成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统一全国条件的，已非秦莫属。

反看战国末期的六国君主，他们都处于软弱的地位，没有其前辈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改革内政、增强国力的事连想也没有想，大多是胡混过日，等着挨打，挨过一天算一天罢了。说得具体点，他们无异一群羔羊，等秦这只巨狼将之一口一口地吞掉。

当然，六国并非都甘心坐待灭亡，被秦逼得急了，也想挽救之法，但却谋不到点子上。例如韩国与秦为邻，是秦国早就想吃的一块肥肉，韩国统治者自知危在朝夕，也想设法以保存自己，而其所做的不是属于异想天开，便是帮了秦的忙，对自己毫无用处。开始是想用黄金孝敬秦国使其高抬贵手，没有黄金就出卖美女来交换，而美女的价高达三千金，当时只有秦王肯出这么高的价，韩国便将卖美女所得的黄金奉送秦国（《战国策·韩》）。当然，秦国不会因得到黄金而对韩国罢休，实际上是韩国白白把美女送给秦王淫乐。此计不行又想一计，这就是“疲秦计”：为使秦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攻伐和并吞韩国。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去劝说秦王政修建一条引泾灌渠，即从池阳瓠口（今陕西泾阳县境）起，横跨渭北高原，由西到东绵延三百余里，进入北洛河。工程是浩大的，由于秦投入无数人力、物力，虽暂时不能集中力量东向，“为韩延数岁之命”，但渠（后命名郑国渠）修成后，“为秦建万代之功”（《汉书·沟洫志》），使蜀中高原的土地也得到灌溉，农业更加发展，秦国更加富强了。韩国的“疲秦计”

实是“强秦计”。又如燕国，当秦兵将临城下时，其君臣谋挽救燕国之策。太子丹征求太傅鞠武的意见，鞠武说：“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联合单于，才能抗秦。”太子丹急于求胜，说：“太傅之计旷日持久，使人等得心烦。”于是太子丹便物色勇士荆轲，对他说：“如果能像曹沫对齐桓公那样，生劫秦王，使其尽归还侵占有各国的土地。不行则将秦王刺杀。秦大将掌兵于外，而内有大乱，君臣必相疑，这时六国联合起兵，必能破秦。”（《战国策·燕策》）这是燕太子的如意算盘，一厢情愿，秦王政非齐桓公，即使能生劫之许还侵六国之地，后必反悔；而想刺杀秦王促其内乱而破之也不现实，当时秦国已具备灭六国条件，内部又较团结一致，即使死一秦王必立一秦王，用行刺一人以改变当时秦与六国优劣之势是不可能的。而太子丹交给荆轲的两种任务都不能完成，结果演出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悲剧：“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鞠武重新提出合纵之策，倒是六国抗秦的唯一良策，这一策曾行之有效，使秦兵一度不敢出函谷关。但由于六国之间矛盾重重，彼此各怀鬼胎团结不到一起，即使组成联军攻秦，如一国之军被打败，其他各国也不救援，而是惊得魂飞魄散，各自逃命，因而往往溃不成军。当时，秦兼并六国之心已路人皆知，而六国统治者大多鼠目寸光，有的不只助秦进攻别国，或对被秦进攻的国家不予救援，甚至互相讨伐，互相削弱实力，实际上等于自杀。

至于六国内部，上下不一心，群臣之间为争权夺利而互相诬谗，甚至暗杀。距离秦国远的国家如齐国的君王，为秦的笑面所惑，相信秦的友好，而放松戒备，高枕无忧。有的国家大臣为秦金钱所收买，成为秦的间谍。

六国形势如此，其前途可想而知

二、用天下士

原是落后小国的秦国，她能逐渐富强以至最后消灭六国，其关键原因是能用天下士。自秦穆公到秦始皇，对秦内政外交作出突出贡献的大臣，都是来自国外。而六国用人大多局限于本国，且往往糟蹋人才，是六国失国主要原因之一。

1. 李斯谏逐客之功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魏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曾学于荀卿，学成，认为：楚王不足事，其他五国皆弱，难建立功业，到秦可大有作为，便西往说秦王说：“要成大功的人，必须抓紧财机。穆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为什么不能兼并六国呢？这是诸侯国很多，周德未衰，故五伯先后兴起，都还尊重周王朝。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互相兼并，关东只剩下六国，而秦日益强大，役使关东列国，有如秦国的郡县。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要统一天下以成帝业，就像炊妇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的容易。如果不抓住这大好时机，让六国复强，台纵抗秦，虽有黄帝的贤明也不能并天下了。”秦王表示同意。李斯又劝秦王派人带金玉到各国去收买、贿赂，离间其君臣，秦王纳其计，封李斯为客卿。

这时，韩国派郑国来秦修建水渠的“疲秦计”被揭露，秦宗室大臣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都是为其主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

切来客。”秦王便下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便上《谏逐客书》说：“我听说官吏们议论逐客，这太过份了。秦穆公时广招人才，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取得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这五人都不是秦国人，而穆公重用他们，才能并国二十，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移风易俗，国富民裕，百姓乐于效命，打败楚、魏，拓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以连横破六国合从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任用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奠定了秦成帝业的基础。秦穆公、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等四位君主，都因重用客卿，才能为秦国建立丰功伟绩。由此观之，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不广招天下之士，拒客而不用，那么，秦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富强了。”

“现在陛下所有的昆山玉、隋珠和卡和璧，身佩的太阿宝剑，乘坐的纤离千里马，这些宝物没有一样是秦所产的，为什么陛下这么喜欢呢？如果是秦所产的才用，那么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美好不充后宫，骏良、骏良馱馱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击瓮叩缶弹筝博髀是秦的声乐，今却不用而用郑、卫、昭、虞等异国之乐，这是为什么？只不过为快意适观而已。可是，今用人却不然，不问有否才能，不论是非曲直，不是秦人则一概驱逐，这说明所重的是色乐珠玉，所轻的是人才。这显然不是兼并天下之术。”

“地广粟才多，国大人才众，兵强则士勇。大山不嫌土壤，才这么高大；河海不辞细流，才成为深渊；王者爱护人民，才说明其有德。今却驱逐宾客使之投向列国，使天下之士从此不敢西向投秦，这无异是帮了敌人的忙。”

“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助敌国，损民以益仇，这就使秦国内无人才辅佐，而外结怨于列国，要想国家不危是不可能的了。”

李斯《谏逐客书》首先阐述秦穆公以来四代君王重用客卿使秦国国宫兵强的事实，用以说明用天下士的正确及其贡献。继而指出喜欢不产于秦的色乐珠玉，而对于来自国外的宾客却一概驱逐，这说明秦王是重物轻人。并强调，此将使天下之士不再向西投秦，这无异将人才推向六国。最后向秦王敲了警钟，“逐客以资助敌国”，“要想国家不危是不可能的了。”这篇谏书，气势磅礴，说理充分，形象生动，秦王政看了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逐客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便取消逐客令。这时李斯已被驱逐离开秦都，秦王立即派人赶到骊邑请李斯回来，恢复他的官职，用他的计谋，官到廷尉。秦并有天下后，任为丞相。

李斯谏逐客之功是巨大的。逐不逐客在当时关系到秦国兴亡的大事。由于秦王政及时取消逐客令，秦才能用天下士以并天下，李斯、尉繚、李、茅焦、王翦、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宾客才得以重用，正是这些杰出的文臣、武将为之献智出力，二十余年，终使秦王政统一天下，登上皇帝的宝座。

在诸客卿中，对秦统一中国贡献最大的除了李斯外，要算尉繚、王翦父子、蒙恬等人。由于秦王政取消了逐客令，继续用天下之士，魏国大梁人尉繚来说秦王：“以秦之强，诸侯国好像秦国的郡县，要消灭东方各国是不成问题的。但恐诸侯合从抗秦，将给秦造成很大的威胁。我建议大王不要爱惜钱财，要用来贿赂其大臣，以乱其谋，而这只要花三十万金便行了。”尉繚

的计得到秦王的采纳和实行。尉繚的计谋，对离间六国君臣，分化、瓦解各国起了极大作用。王翦父子对秦并天下的战绩也卓著，王翦先后率军攻破赵国、燕国和攻灭楚国，后封武成侯；其子王贲也先后率军攻灭魏国，攻取燕的辽东和攻灭齐国，封通武侯。李信曾以兵数千追逐燕太子丹至衍水，大破燕军，俘虏太子丹。蒙恬也为秦立下汗马功劳，他曾与王翦破楚，杀楚主将项燕，攻楚，虏楚王，后又大破齐军，封内史，甚得秦王政信任。

秦王政能得文臣、武将为他效命，这与他能纳谏客人有关。如下逐客令，是秦王政最大的错误，此令果真执行，李斯等客卿尽离去，尉繚等有才能之士也不会来秦，秦的前途可想而知。正因秦王政能纳李斯之谏，李斯等才能继续为秦尽智竭力，有才能之士尉繚等才源源不断投秦，秦王政始能集众智成大事。秦王政能容人，他对尉繚对他的批评不予计较反而重用之，便是典型的例子。秦王政因敬佩尉繚的才能，不仅让尉繚享用跟自己同样的衣服饮食，且在尉繚面前表现得很卑谦。但尉繚与秦王政相处后，觉得与这种人“久游”很危险，曾对人说：“秦王为人，高鼻，眼睛细长，挚乌胸，豺狼声，为人少恩而有虎狼心，需人辅佐时能卑谦待人，得志将会杀人。我一个布衣，他见我常常表现得很卑谦。如果秦王并有天下，天下人都成为他的奴隶了。这种人不可久与交游。”便逃走。秦王政发觉了，便派人追回尉繚，不只有责备或惩治他，而是更重用他，封为秦国尉，掌管全国军队，对他言听计从（《史记·秦始皇本记》）。尉繚是战国末期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现存的《尉繚子》一书是尉繚由魏入秦时所著，是我国著名七部兵书即《武经七书》中的一部。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阐明战争的胜负与政治、经济好坏的关系。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经济是战争得以进行的保证和物质基础。认为“刑德可以百胜”，主张实行“诛暴乱，禁不义”，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在运动战中出奇制胜，“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实现统一。尉繚的军事思想在秦并天下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秦王政的逐客令本为郑国案件而下的，并决定要杀郑国，后因李斯之谏，郑国又对秦王政说：“我虽是为韩作间谍而来秦修渠，但渠修成后秦将得到大利。”秦王认为他说得对，便赦免其罪，让他继续负责修渠工程。“渠成，灌溉四万余顷，亩产量大增。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因此富强，终灭六国，因命名为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2. 六国向秦输人才

“七国为了争天下，都招四方游士。但六国所用为相的，都是宗族及国人，如齐的田忌、田婴、田文，韩的公仲、公叔，赵的奉阳、平原君，魏王则以太子为相。只有秦不是这样，开始与之谋国以成秦国霸业的是魏人公孙鞅，其他如楼缓是赵人，张仪、魏丹、范雎是魏人，蔡泽是燕人，吕不韦是韩人，李斯是楚人，秦都委国听之而不疑。而秦国之所以能并天下，正是由于依靠他们的力量。”（《容斋随笔》卷二）这寥寥几句话，点明了秦与六国用人的不同态度。而六国不只能重用国外的人才，连其本国人才也不能尽其听用，而且糟蹋人才，甚至逼害人才，使他们奔投六国，实际上是为秦国输送人才，以帮助秦并天下。这就是秦兴六国亡的关键所在。

在六国有“四君”，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以善养士名闻天下。有的不是经国之才，有的有才而不容于国。

孟尝君，即田文，继其父田婴被立于薛。孟尝君厚遇宾客，在其门下的多到数千人，据《史记·孟尝君列传》所记，他所养的士有的虽有偏才奇技，但都非济世之才。其最为人称道者只不过是鸡鸣狗吠之徒和冯谖而已，他奉令入秦，被秦昭王囚禁，幸靠鸡鸣狗吠之徒帮助才能逃归；冯谖为他“营三窟”，仅能使孟尝君在齐为相数十年安然无恙。此外，未见孟尝君及其宾客对齐国有什么突出的业绩。而孟尝君虽爱士却不爱民，他及其宾客路经赵国时，平原君迎接他。赵国人听说孟尝君是贤人，便出去观看，见了笑说：“原以为薛公（指孟尝君）是个魁梧丈夫，想不到是个矮仔。”孟尝君听了，勃然大怒，使其宾客击杀数百人，毁灭这个具才离去。可见，孟尝君善养士非为国为民，是为了加强其私家势力罢了。

平原君赵胜，据《史记·平原君列传》说，他是赵诸公子中最贤的，他曾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平原君家与民家隔邻，民家有一腰曲背隆两腿瘸的人在打井水，平原君一美人在楼上看见这人的怪样子，便乐得哈哈大笑。明天，这人到平原君家，说：“我听说平原君喜欢士人，士人不远千里来投，以为君能贵士而贱妾。我不幸有病，而君的美人却笑我，我要得笑我的人的头。”平原君笑应说：“好！”这人走后，平原君笑说：“此人以一笑之故要杀我的美人，太过份了！”从此，宾客陆续离开，一年便走了一半。平原君觉得奇怪，说“胜待宾客从不敢失礼，为何走的人这么多？”门下一人答道：“因您不杀那位笑人的美人，认为您是爱色而贱士，所以走了。”平原君将那美人头斩了，亲自到被笑那人家去谢罪。这样，离去的宾客才逐渐回来。平原君争取士人而斩美人头，虽说他重士，这也太过份了。平原君虽有众多食客，但大多碌碌庸人，其中倒有个敢作敢为之士，这人叫毛遂，他随平原君到楚，与楚王谈判台从抗秦，谈了半天，楚王犹豫不决，毛遂便按剑登陞而上，劫持楚王，逼其定从于殿上。而平原君也不过是个碌碌庸人，司马迁批评他这个“翩翩公子”是个“利令智错”而“不识大体”的人，由于他不听虞卿为赵画策，只听冯亭邪说，使在长平之役损兵十余万，赵都邯郸几亡。

魏公子无忌倒是六国中杰出的人物。他是魏昭王幼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昭王死，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史记·魏公子列传》说：“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从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秦昭王破赵长平军进兵围邯郸，信陵君姊夫平原君致书魏王及公子书请救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兵救赵，因受秦昭王威胁观望不前，信陵君得侯生策划和朱亥之助，盗符，矫杀晋鄙以救赵，秦军退走，终解邯郸之围。信陵君不敢归留赵。秦因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代魏。魏王患之，便派人请公子归，魏王见公子，兄弟两人相抱哭泣。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派使遍告诸侯。诸侯知公子为将，各遣将率兵救赵。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败走蒙骜，就乘胜追逐秦军至函谷关，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便使人带金万斤到魏收买晋鄙的宾客，使其向魏王谗毁公子说：“公子逃亡在赵十年，今为魏将，诸侯都听他的，诸侯只知有公子，不知有魏王。公子亦想趁此机会南面称王，诸侯畏公子的威望，正要立他为魏王。”秦又数次派人来进行反间计，向魏询问已立公子为王没有，或祝贺魏立公子为王。魏王日听人的谗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为将。公子被毁废，便谢病不朝，与宾客作长夜饮，多近妇女，日夜乐饮达四年，

因病酒而死。秦知公子死，立即派蒙骜攻魏，攻占二十城，置为秦的东郡。

《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春申君，楚人，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派他为使到秦，知道秦将联合韩、魏攻楚，便向秦昭王上书指出秦联合韩、魏伐楚是失策，他说：“秦与韩、魏有累世之怨，韩父子兄弟接踵被秦杀死的已有十世。秦攻楚，如借路于仇敌的韩、魏，归路被切断，秦兵就回不来了；如从随水右岸进兵，皆荒芜之地，即使得地也无用，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春申君认为秦最好是与楚联合攻韩，韩必敛手；王再以十万兵占领郑，魏也就屈服。韩、魏屈服了，齐国也就可以‘拱手而取’了。”春申君虽为楚，但其所说对秦是有利的，故秦昭王纳其言，并“发使赂楚，约为与国。”楚使春申君与太子完人质于秦。楚顷襄王病，春申君便策划太子逃归，后继位，是为考烈王。由于春申君使秦罢兵和立太子有功，被任为楚相。他为楚相二十余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使楚国得以复强。楚考烈王卒。楚幽王立，太后之弟李园为夺权谋杀春申君。而李园是春申君任相时所信用的，曾有人警告李园心怀叵测，春申君仍不悟，认为李园不会如此，结果被李园谋杀，说明其不够明智。

以上“四君”都为时人所称道，但孟尝君、平原君无所作为，信陵君虽贤明因受谗废不能尽其才，春申君则因内讧而不得善终。

六国用人之失，不只是不能善于举贤任能和尽人才之用，严重的是自弃或逼害人才，输送人才以资敌国。战国初年，魏国是首先进行改革的国家，也是最早强大起来的国家。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之后的君主，由于不善于用人或逼害有才干之士，使之纷纷投奔外国，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吴起、孙臆、商鞅、范雎、张仪、尉繚等，魏国如重用他们，加上魏国当时的力量以及其处于天下轴心的重要位置，并天下的不会是秦而可能是魏，战国的历史将重写。历史事实说明，秦之所以强大及其能统一天下，商鞅和范雎的功勋是最大的。正是商鞅入秦说秦孝公实行变法，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落后弱小的国家成为强国，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正因范雎入秦说秦昭王，驱逐擅权误国的以魏冉为首的贵戚集团，纠正秦国内政外交政策的错误，在内政上实行论功行赏、因能授官的政策，对外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使秦国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并开始进行统一天下的战争。正因张仪入秦提出连横，以破六国合纵之策，利用六国矛盾逐个击破。商鞅和范雎都是魏国统治者将他俩“输送”给秦国的。而张仪则是楚国相逼其入秦的。商鞅原名公孙鞅，在魏相公孙座手下当中庶子的小官，公孙座认为他有治国的大才，向魏惠王推荐，惠王不用，公孙鞅在魏得不到任用，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才便投奔秦国。秦孝公在公孙鞅辅佐下，秦国益强大，屡败魏军，魏惠王被逼迁都到大梁，魏惠王才悔恨“不听公孙座的话”（《史记·商君列传》），但这时已晚了。范雎在魏的处境则惨得很。范雎，魏人，他在魏中大夫须贾手下工作。魏昭王派须贾出使齐国，范雎跟随前往，在齐逗留了数月。齐襄王见范雎有辩才，使人赐给范雎十斤金和一些牛肉和酒，雎辞谢不敢受。须贾知道了，大为发火，以为难将魏国的秘密告诉了齐国，才得到齐国的赏赐，令雎受其牛肉酒，还其金。须贾回到齐国后，便将此事告诉魏相。魏相是魏的公子，叫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鞭打范雎。肋骨被打断了，牙齿被打掉了。雎佯死，便用草包置于厕所里，令饮醉的宾客向他拉尿，侮辱之以惩后者，使人不再敢妄言。雎从草包里伸出头对守者说：“你能救我，将来我一定厚报！”守者便请将其“尸”抛弃野外，魏齐醉，说“可以。”

魏齐酒醒后后悔，使人取回其“尸”，但这时范雎已被魏人郑安平所救，将他藏匿，更姓名为张禄，适秦昭王派使者王稽来魏，郑安平便请他带范雎入秦。范雎原想尽忠以报祖国，但由于魏相魏齐不查明真相听须贾的主观猜测便严惩范雎，终于“送”范雎入秦（《史记·范雎列传》）。张仪也是魏人，是楚相逼张仪投到秦的。他学于鬼谷先生，学成游说诸侯。在魏不被用，到楚，曾与楚相饮酒。楚相失了璧，其门下怀疑是张仪所盗，说：“张仪贫而无行，璧一定是他盗了。”便拿下张仪，将他鞭打数百，张仪不承认，后因无证据便将他释放了。张仪妻叹气说：“哎！如果你不读书去游说，那会受这样侮辱？”张仪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笑说：“还在。”仪说：“这就够了！”于是西入秦说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行其连横计破六国之合纵之策。（《史记·张仪列传》）

三、纵横之争

在秦惠王时，秦与六国的连横与合纵的斗争已在进行。六国联盟抗秦，称为“合纵”；秦利目六国矛盾，拆散六国联盟，使与秦连横结盟，称为“连横”。韩非子《五蠹篇》将之概括为：“纵者，合众弱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合纵与连横的斗争，是当时秦与六国斗争的主要形式。

1. 六国间各怀鬼胎

秦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日益强大，成为战国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不断东出蹂躏关东六国。六国唯一的出路是联合起来抗秦，因此，公孙衍倡导“合纵”之策。这是秦国最害怕的。秦国比六国中任何一国都强，但六国联合抗秦，其力量则比秦大得多，因“六国之地五倍于秦，兵卒十倍于秦”，如果六国能始终坚持“合纵”，秦国将被打败。张仪入秦提出“连横”之策，当然受到秦惠王的赞赏。从此就拉开了连横与合纵斗争的序幕。

理论和实践往往是不一致的。从理论本身讲好像是“白璧无瑕”，而实行起来有时却漏洞百出，即使最好的理论在实践中也不一定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客观形势是变化无常的，人们的认识却常常落后于形势。“合纵”之策就是如此。六国之间有如唇齿的关系，唇亡则齿寒。从地理位置来讲，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赵在北，韩近西，魏居中，韩、魏、赵接近秦国。也因此，韩、魏、赵成为其它三国的屏障，其他三国尤其是齐楚两大国是韩、魏、赵三国的根基。道理很明显，没有韩、魏、赵为齐楚作屏障，齐楚将危；而韩、魏、赵挖齐楚这根基，韩、魏、赵将垮。但实际上，齐楚对秦攻韩、魏、赵却置之不顾，甚至帮秦大忙，实是自撤其屏障。而六国之间却互相征伐，韩、魏等国甚至与秦国联合攻齐楚，实是自挖其根基。六国统治者如此鼠目寸光，全无远谋，实是六国的悲剧。

当然，六国如能一心一德，合纵抗秦，是会取得成功的。如公元前 298 年，齐、韩、魏三国联合击秦，攻入函谷关，夺回了魏、韩被秦侵夺的一些土地。齐成为关东各国的盟主。公元前 247 年，魏公子信陵君率关东五国之兵反击秦国侵魏，大破秦军，一直追逐到函谷关使秦兵不敢出战。但六国合

纵抗秦大多以失败告终。如公元前 319 年，公孙衍联合魏、楚、燕、韩、赵五国代秦，公推楚怀王为纵长。可是由于各国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齐国听孟尝君计，虽出兵，怕冒尖挨打，却迟迟落在后头；其他各国为保存实力，都不愿打先锋。兵到函谷关，秦断绝楚粮道，楚军无粮先行撤退，其他各国也就争相逃命。秦对魏、韩连年用兵，魏、韩知五国合纵不可靠，只好向秦屈服，五国合纵便散了。公孙衍之后，苏秦游说各国重组六国合纵抗秦，于是六国结盟，任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苏秦致书于秦，宣告六国纵约之事。因此，秦兵不敢出函谷关的有十五年之久。后秦设计与齐、魏联合起兵伐赵，于是六国合纵瓦解。

2. 秦以连横破合纵

由于六国不一心，秦的连横之策执行得很顺利。公元前 313 年，秦欲伐齐，因楚与齐联盟，秦惠王为分化齐、楚联盟。便派张仪往见楚怀王说：“大王如闭关而绝齐，秦国愿把商于地区六百平方里的土地割让给楚国。”楚怀王利令智昏，不用动兵而收回这么多的土地高兴得很，立即答应与齐断绝关系，便摆酒欢宴张仪，公开向群臣宣称：“我复得原先是楚国的商于之地了！”群臣都向他祝贺，只有陈轸一人闷闷不吭声。怀王问陈轸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呢？”陈轸说：“秦之所以看重大王，是因楚国有强大的盟邦齐国。现在秦许给的土地还未得到，大王你与齐断绝关系，这就孤立了自己。楚国孤立了，秦必看不起楚国。如果秦先给地楚才与齐绝交，秦一定不肯；楚国先与齐断交后向秦索地，必被张仪所欺骗。受了张仪的欺骗，大王必怨恨，必与秦齐两国交恶。这样，西有秦患，北与齐绝交，秦、齐两国之兵必到，所以我为楚忧虑。”楚王不听陈轸忠言，与齐绝交后，派使随张仪到秦接受土地。张仪回到秦后，佯醉坠车，称病不出有三个月。楚使没有得到土地。楚王思量说：“是否张仪认为我与齐断绝关系不彻底呢？”便派勇士宋遗到齐国去辱骂齐王，齐王把楚怀王恨得咬牙切齿，立即转与秦结盟。这时，张仪才召楚国使者：“你为什么还不去接收土地？从某处到某处，一共六平方里。”楚使者说：“楚王派我来接收的土地是六百平方里，不是六平方里。”使者向楚怀王报告，怀王气得发昏，起兵就要伐秦。陈轸说：“伐秦非良策。不如割一重要城市给秦国，与秦国联合伐齐，这样，我失地于秦，可向齐取赏，楚国尚可保存。如今既与齐交恶，又责秦欺骗，是促使秦、齐结盟，必招来天下之兵，楚国必大受伤害。”怀王不听，便起兵攻秦，在丹阳（今河南淅川）被秦大败，甲士八万人被杀，大将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汉中地亦为秦所占。怀王还不自量力，又倾全国之师攻秦，在兰田（今陕西兰田）又为秦大败。韩国和魏国知楚连大败，不只不对与之有唇齿关系的楚国伸出援助之手，而是趁机向楚国攻击，想从中捞一把。这时，怀王才恐慌，只好向秦国屈膝，召回残余部队。楚国便与秦订立和约（《史记·魏世家》）。楚国因有这样昏乱糊涂的君王，张仪才得施其连横计，将他玩弄于掌握之中。

但在六国中，像楚怀王这样的昏君还不少，这便是张仪得志于时的主要原因之一。张仪拆散楚、齐联盟并使楚屈服后，便往见韩王说：“韩地势虽险恶，但处于高山之地，土地贫瘠，粮食产量甚少，且什粮多，遇到荒年，民只能食糟糠。仓库所存，无二年之粮。地不过九百里，现役士卒不过二十万。秦国带甲之士有百余万，将骁卒锐，勇不可当，用以攻击不服的弱小国

家，好像干钧之重压在鸟蛋上，必不幸免。大王不事秦，秦军占据宜阳将韩南北切断，东攻成皋、荥阳，供享乐用的鸿台宫殿和桑林花园，便不是大王的了。韩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为大王计，不如与秦联合以攻楚，就可转祸为福，这是最善之计。”韩王听仪计。

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你武信君。惠王派张仪东说齐湣王说：“主张合纵的人，必对大王说：‘齐西有强赵，南有韩、魏，作为屏障，齐临海滨，远离秦国，且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一百个秦国，也无奈齐何。大王只听这片面之词而不考察它的实际。今秦楚北结婚姻，为兄弟之邦。韩国割让宜阳，魏国割让河外，赵国君前往朝见，还割让河间。大王如不事秦，秦驱使韩魏攻齐的南部，驱使赵兵渡清河，直指博关，那时临淄、即墨就不是大王的了。两国战事一起，齐想事秦已迟了。”齐王说：“齐辟陋，没长久的方略，愿听从你的教诲。”便同意事秦。

张仪离齐，西见赵王说：“大王曾率天下之兵攻秦，使秦不敢出函谷关已十五年。为赵所逼而积于心的愤怒之情已压得太久了。秦国为此厉兵秣马，储粮备战，今秦已举巴蜀，并汉中，包围两周，前锋直抵白马津。今集结军队，将北渡黄河，跨过漳水，进据番吾，会于赵都邯郸城下，故先派我来通知大王。且今齐、楚、韩、魏与秦联盟，秦将约四国攻赵，赵破，必四分其地。为大王计，最上之策是与秦国和解。”赵王就到渑池会见秦惠王，割让河间。

张仪又北到燕，见燕昭王说：“今赵王已到渑他朝见秦王，豁让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军进驻云中、九原，使赵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所有。赵国只不过是秦的郡县，王事秦，秦王必喜，赵必不敢妄动，这样，燕西有强秦的支援，南无齐赵之患。”燕王听仪计，割五个城市求和。

张仪以三寸不烂之舌，以连横之策一举而瓦解六国的合纵，作了百万大军做不到的事，确是厉害。

四、远交近攻

七国相争，国家强弱和征伐胜败，决定于有无人才。而能称为人才的，是因他能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自从范雎制定“远交近攻”的战略后，尔后一直为秦王政和李斯、尉缭等执行，并将之发扬和具体化。因这一战略和所执行的具体措施又是正确的，使六国合纵抗秦联盟瓦解，其君臣上下分化，将士离心，故战无不胜，迅速完成统一大业。

1. 以金钱离间先行

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事，用武力强取不行，用收买、离间等手段则能轻而易举而取之。秦国在秦昭王和秦王政先后进行统一战争中，都以重金收买其重臣为间以离间其君臣，对贯彻执行“远交近攻”战略以消灭六国起了极大作用。如对赵国的战争，就因用此计谋而屡次战胜，进而将之消灭。公元前235年赵王迁登位，朝政操纵在宠臣郭开的手中，秦便将重金贿赂郭开，使其成为秦在赵的内奸，听从秦的指挥进行离间赵国君臣的工作。廉颇是赵国良将，屡立战功，被任为上卿，以勇气闻名于列国。后因赵悼襄王派乐乘代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就奔投魏，廉颇在魏不被信用。因赵

数被秦兵所困，赵王想复用廉颇，廉亦想复用于赵。由于廉颇年纪已老，赵王便派使到魏考察廉颇是否尚可用。这时秦间谍郭开使用金贿使者，使他谗毁廉颇。赵使会见廉颇，廉颇在使者面前，为显示其老当益壮，食了一斗米饭和十斤肉，披甲上马奔驰，“以示尚可用”。赵使回来向赵王说：“廉将军虽老了，饭量还很大。”接着谗毁说：“但我跟他坐，一会儿便拉屎三次了。”赵王便以为廉颇衰老了，这个智勇双全的老将便不被任用（《史记·廉颇列传》）。赵的良将李牧也因被秦间谍郭开谗毁被撤职而使赵灭亡。李牧在守代雁门时曾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其后十余年，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后赵以李牧为大将军抗秦，他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败走秦将桓。李牧被封为武安军。秦军来攻番吾，李牧又破秦军。李牧在抗击秦军战争中，战功卓著。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七年），秦王派王翦率军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率军迎战。秦鉴于李牧屡败秦军，料李牧为将难于取胜，便多给郭开金，令他进行反间，说李牧、司马尚欲谋反，赵王乃派赵葱及颜聚代李牧掌握兵权。李牧知赵葱等非将才，根本不是秦名将王翦的对手，为了保卫祖国拒不交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诱捕李牧，将他斩头，并将司马尚撤职。李牧被杀后，王翦猛烈攻赵，大破赵军，杀其主将赵葱，俘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赵国灭亡了（《史记·李牧列传》）。赵良将廉颇不被用和李牧被杀，秦间谍郭开起了关键的作用。可见，由于秦用重金收买郭开为间以离间赵国君臣，故不费吹灰之力便摧毁了赵国。

对于齐国君臣，秦国更是极尽其收买、离间以及笼络、麻痹的种种手腕。这样做是符合秦国的“远交近攻”的战略的。因为齐国远离秦国，如能使齐国自我孤立起来，不与其他五国的事务，当然是大有利于秦国。而齐远处海滨，秦国又表示对她友好，自己乐得“坐山观虎斗”，其他五国中被秦进攻向齐求救也置之不理，并以为是上策：人民既无兵燹之苦，君臣上下又可享太平福，这就不必修军备，全国一派升平景象。殊不知群虎相争必有胜者，当胜利之虎——秦军到齐城下时，齐国除投降外别无他途。

齐襄王死，子建立，初其母太后参与朝政。太后贤明，小心侍奉秦国，取信于其他诸侯国，故齐国与各国关系较好，当时秦国不断进攻韩、魏、赵、燕、楚，五国自救还来不及，就无力侵犯齐国；而齐国远处于海滨，跟秦国距离又远，所以齐王田建即位四十余年，齐国没有受到战火伤害。齐王建二十八年，田建入朝秦，秦王政笑脸相迎，好话说尽，摆酒于咸阳宫，隆重招待。对秦王政如此友好相待，齐王建也就放心，回来不讲战备，高枕无忧。太后死后，后胜任齐国相，秦国便送大量黄金给他，后胜于是成了秦国的间谍。后胜为了讨好秦国，多派宾客入秦，秦都多给他们黄金，这些人回来都说秦国好话，按照秦国指示反间。他们劝齐王与秦结好，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因此得以轻易灭五国。灭五国后，秦大军突袭临淄，兵临城下，齐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齐王建投降，秦将他放逐到五邑（河南省辉县），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 利用矛盾各击破

秦国在统一战争中，执行“远交近攻”战略的同时，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和恐秦心理，进行分化瓦解，逐个击破。

秦国进攻的矛头先指向邻近各国，对距离远的国家就暂时与之修好，使

其中立，以孤立其所要攻击的国家。公元前 259 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对待齐楚救赵所定的计策是：“齐楚救赵，如其合力则退兵，不合力则攻之。”赵军无粮，求救于齐，齐置之下理。齐的谋臣周子对齐王建说：“不如答应赵国借粮的要求，这有利于帮助赵国打退秦军；如果不借粮，赵军无粮士卒饥饿则不能退秦军，这就中了秦计，这是齐国的失策。何况赵国是齐国的屏障，赵、齐两国有如唇与齿的关系，唇亡齿寒。今日赵国灭亡，明天则祸及齐楚。所以救赵是当务之急。救赵是齐国崇高的义务，救助将亡之国，击退强大的秦后可以显示齐国的威名。今下务大事而吝惜粮食，这是错误的。”齐王不听。秦军终于大破赵军，赵军前后死亡四十余万（《史记·田仲完世家》）。长平之战是一次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战争，由于秦国取胜，为秦统一六国铺平道路。而秦在长平大胜，又是秦执行“远交近攻”战略的结果，也是秦国对赵国君臣及其与邻国的关系进行分化瓦解的成果。

秦军进攻长平之初，赵派大将廉颇率军抵御。秦军数败赵军，廉颇筑垒固守不战，采取以逸代劳的策略，消耗秦军力量。双方在长平相待三年。赵王以为廉颇怯懦无能，数次派使责备。这时，秦相范雎见强攻不能取胜，便派人带千金到赵国行反间之计，散布流言说：“秦最害怕的是怕马服君的儿子赵括为将，廉颇易于对付，他将要投降了。”赵王既不满廉颇为将抗击秦军，又听秦的反间之言，便使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括是赵国著名将领赵奢的儿子，虽多读兵书，却只会空谈，缺乏实战经验。秦知赵军更换赵括为将，暗中派著名将领白起为上将军，任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谁敢泄露白起为将者斩。赵括一到长平前线就出兵击秦军。秦军假装败走，设二路奇兵劫之：赵军初胜，追到秦壁，壁坚不得入。这时，白起已派奇兵二万五千人断绝赵军退路，另一支奇兵五千人乘虚攻占赵军壁垒，赵军被分为二为，粮道绝。秦出轻兵击之，赵军屡战有不利，只好筑垒坚守，以待救兵。秦王闻赵军食道绝，亲到河内（今河南沁阳）征发年十五岁以上的男丁组成军队到长平，切断赵国的援军和粮道。赵军被包围达四十六天，士卒不得食，饥饿而互相杀食，数次突围皆不得出。赵括亲率锐卒搏战被射杀。赵卒四十万人降秦。白起说：“秦前取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恐为乱。”便挟诈尽抗杀之，只留下弱小的残卒二百余人归赵。前后赵卒死亡达四十五万人（《史记·白起列传》）。

赵军粮尽卒饥，也是秦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能借粮救赵的只有与之隔邻的齐国，而秦攻赵之初，齐与楚救赵，后又“坐山观虎斗”，甚至不肯借粮食。这是秦国施行断绝“齐赵之交”计谋的结果。在这以前，秦已以重金收买其相后胜及其大臣，他们都劝齐与秦结盟，在长平之战时，又特地派荆苏出使齐国，以计惑齐王建，使其与赵断交。正因此，对赵军粮断也不肯借粮。不仅对长平之战，齐国袖手旁观，尔后秦攻其它五国，齐仍是“坐山观虎斗”，坐看五国灭亡，当五国已亡，最后秦君兵临城下时，赵王建除投降外别无他途。而秦对他的中立及叩头朝拜称臣，也没有对他稍示好感或怜惜，他得到的补偿是：在荒山野岭的松柏树林之中，活活饿死。

不仅对齐采用这种政策，对其他各国也如此。当其要攻援灭某国，便以计使其他各国“中立”，或加以威胁使其不敢救某国，使某国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便不费吹灰之力，伸手而取之。

秦能攻灭六国，当然是靠其国富兵强，但智力在其中比重较大，由于有智力才更能充分发挥武力的威力。在战争实践中，秦国有的君王认识到光靠

武力是难以并天下的，故能招贤才，用天下之士。六国则多不能识才善任，连本国之士也不能尽其才，必然后人才缺少。两相比较，多才与少才，决定多智与少智，秦国的智谋远胜其他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秦国自秦孝公以到秦始皇都能用天下之士，故代代都多智谋之士，而智谋继承并发扬，其智谋也就一代胜一代。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内政改观，富国强兵，但对外建树不大。秦惠王用张仪，以连横破合纵，凭三寸不烂之舌虽胜过百万大兵做不到的事，曾一度瓦解合纵，但敌我友阵线没有分清，敌我友之间往往反复无常，其成就有所局限。后秦武王继位疏远张仪，连横阵线消失，南北合纵同盟再建。秦昭王用范雎，以“远交近攻”为国策，与远的国家交好或暂时结盟，从邻近的国家进攻下手，因而孤立敌国，轻而取之。秦始皇用李斯、尉缭，继承“连横”、“远交近攻”之策，施行重金收买、离间敌国及其君臣的计谋，使六国分化瓦解，各国内部君臣离，将士厌战，秦军到处，势如破竹，逐个消灭：前 230 年，秦灭韩；前 228 年，秦灭赵；前 225 年，秦灭魏；前 223 年，秦灭楚；前 222 年，秦灭燕；前 221 年，秦灭齐，山东六国全部灭亡，秦始皇统一了天下。

第二章 楚汉相争

秦始皇亲政后，挟持秦六代积累的威力，用其雄才大略，以摧枯拉朽之势，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为巩固秦朝的统治，毁名城，杀豪俊，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成十二铜人，以永急兵患：北筑长城置重兵以却匈奴，南戍五岭镇守要害之处，防止叛乱；焚书坑儒，以法为教，实行愚民政策。自以为如此则可高枕无忧，故自称始皇，由一世而传之万世。但传到二世而天下大乱，旋即灭亡，秦朝仅存在十五年（前 221 年——前 207 年）。

为什么秦王朝这个庞然大物灭亡如此之速？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在这四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各国互相讨伐，尤以战国时为最，人民长期苦于兵燹之祸、厌战已极，盼望统一，使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秦始皇正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可是，秦始皇给予人民的不是人民希望所要得的，而是恰恰相反。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使人民更喘息不过气来。迄二世继位，徭役，赋税更重，稍敢违抗的，轻罪重刑。秦灭六国，各国臣民受屠杀无数，旧仇记忆犹新；今又受如此重压，人民新恨又起，于是旧仇新恨交织一起，以农民为主的各阶级组成一股巨大的汹涌澎湃的洪流，将暴秦淹没了。

一、西楚兴亡

在推翻暴秦的战斗中项羽贡献最大。他以三年时间，率领五诸侯兵消灭暴秦，但在楚汉相争中，五年便被刘邦所灭，其兴也速，亡也速，其原因安在？

1. 仇恨变成了力量

仇恨终会变成力量。项羽的叔父项梁举事时，范增往说项梁，主张立原楚国的后人，他说：“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从楚怀王入秦不再回来，楚人到现在还思念他，所以楚国南方一位老人说：‘楚人怨秦，即使存下三户，亡秦必楚。’今您在江东起事，原楚国的将领都争着来归附，这是因您家世世为楚将，必将立楚国的后人。”项梁认为他说得对，便寻找楚怀王的一个孙子，他名叫楚心，便立他为王。因当时楚人还未知楚怀王的生死，仍以楚怀王为名，以广号召，实是从民望（《史记·项羽本纪》）。

从这段记载看，楚人对楚怀王是怀念的，对秦是怨恨的。楚怀王执政时在对外政策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以怀王的儿子子兰等主张亲秦，楚国贵族屈原和臣昭睢等主张手齐，怀王昏庸，犹豫不定，时而亲齐，时而亲楚。初，楚齐结盟，张仪到楚以诡计欺楚王，使楚王绝齐亲秦，怀王知受张仪欺骗后大怒，又背秦亲齐。秦昭王立，以厚金赂楚，与怀王结婚亲，怀王背齐入秦与秦昭王结盟。后与秦交恶，秦先后派兵伐楚，杀楚兵二万，取八城，昭王致书怀王要他入秦再结盟。昭睢等反对，子兰等劝怀王前往。怀王入秦，秦索地不逐，扣留怀王，怀王终死于秦，秦送其丧归楚，楚人皆怜其不幸，悲痛如丧亲戚。列国对秦如此对怀王也鄙其所为。秦楚断绝关系，秦终于灭楚。屈原因坚决主张联齐反对亲秦，受子兰所谗毁，被流放于沅湘流域。诗人恨秦扣留怀王，悲祖国的灭亡，愤群小壅君误国，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

抒发其忧恨的感情乃自投汨罗江而死。诗人的死，也是对秦灭楚的抗议。

不甘心亡于秦而潜伏伺机复楚的大有人在。其中就有项梁及其侄子项羽。项梁是项燕的儿子，项燕是楚国的大将，王煎灭楚时被杀。国耻家恨使项梁、项羽与秦有不共戴天之仇，居吴中时已暗作复楚准备，迄陈胜、吴广揭竿起义，项梁立即起兵响应。

不甘心亡于秦的还有原六国的贵族及其将相的后代。张良便是其中之一。张良是原韩国人，他的祖父在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时任相。父亲张平，在懿王、悼惠王时任相。秦灭韩时，张良还年少，没有当官。韩灭亡后，张良还有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以家财求勇士刺秦始皇，为韩报仇。得一力士，为他制一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张良与力士埋伏于阳武南博浪沙中，秦始皇东游经过，力士跃起用铁椎袭击，误中其副车。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刺客。张良乃更名姓，避匿于下邳。陈胜起义后，张良也聚少年百余人举事。项梁立楚怀王，张良乃说项梁立韩成为韩王以树党，项梁使良找韩成，立为韩王（《史记·留侯世家》）。这时，原燕、齐、赵、魏四国也已立王。各地的豪强、旧官僚也纷起占城据县，混水摸鱼。至此，六国旧势力已死灰复燃，形成一股除被压迫人民组成的主力军外的重要反秦力量。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士人纷纷逃避藏匿，及陈胜起义，都活跃于各反秦队伍中出谋献策。张耳、陈余都是魏名士，秦灭魏后悬重赏追捕，他俩便变名姓，在陈当里监门。陈胜率兵经陈时，他俩立即投入起义队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这时，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也投入了反秦阵线。

秦的暴政使众怨变成力量，终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2. 叱咤风云的英雄

项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生动而形象描绘他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司马迁指出：“秦失其政，陈胜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如果项羽没有本事，就不能在三年间率领楚军与齐、赵、韩、魏、燕五国军队灭秦。他分天下以封王侯，这时政由羽出，自称‘西楚霸王’，这是近古以来未尝有的。”因此，司马迁将为他写的传列入“本纪”，置于秦始皇的“本纪”之下，这是说他继秦而有天下，是当时全国最高统治者。这也是对项羽推翻暴秦的功勋的充分肯定。

项羽，下相（今安徽省宿迁县西南）人。参加反秦队伍时才二十四岁。他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叔父项梁斥责他，他说：“读书不过能记姓名而已。学剑也只是一人敌，不足学，我要学万人敌。”项梁便教羽兵法，羽大喜，但略知其意，又不肯尽学。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时，路过吴中，梁与羽都去观看。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梁忙掩其口，说：“不要乱说，这是要灭族的！”梁以此奇羽，认为他有大志，可雪国耻家仇。羽身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都畏服他。

项梁响应陈胜率领吴中八千子弟兵反秦，深得项羽力助，屡破秦军。项梁胜利冲昏头脑，益轻秦军，脸有傲色。秦增强章邯兵力以攻项梁，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战死。章邯认为楚地兵已不足忧，便引兵渡河击赵，大破赵军围赵王于巨鹿。章邯北上，是犯了重大错误，其时楚军还有项羽和刘邦所领的两支精锐部队，这使楚军得以整顿力量，重振旗鼓。

楚王怕秦灭赵后楚势孤，便议派兵救赵。因宋义曾预言项梁骄兵必败，

楚王认为宋义知兵，便任他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兵救赵。大军行到安阳，宋义却令停止进军，一直逗留了四十六天。项羽对宋义说：“秦军围赵王于巨鹿，应急领兵渡河，楚军击其外，赵军应其内，必破秦军。”宋义不同意说：“今秦兵攻赵，战胜则兵疲，我乘其疲取之；秦兵败，我则引兵西向必破秦。故不如让秦赵拼搏，我坐收渔人之利。冲锋陷阵，我不如你；运筹决胜，你不如我。”于是，下令：“敢违命者，皆斩！”派其子宋襄相齐，亲身送到监。回来后又召集诸将领欢饮。这时，天寒又下大雨，士卒冻饥，项羽入帐愤然对宋义说：“本应戮力攻秦，今却久留不行。今年欠收民贫，士卒食不饱，军中缺粮，却饮酒作乐，不去渡河与赵并力攻秦，而说‘乘其疲’。秦军强大，赵国新立，赵国必败。赵败秦更强，有何疲可乘？且楚军刚被秦军所破，王坐不安席，以倾国之师委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体恤将士而忙于儿子的私事，非忠于国家之臣！”项羽即于帐中斩宋义头，以号令军中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密令羽杀之。”诸将慑服，不敢喟声，都说：“立楚是将军家，将军诛乱。”便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杀之。派人向怀王报告，怀王只好正式任命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使英布先率兵渡漳水击秦。项羽随即率全军渡漳水，“皆沉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到则围秦将王离，九战九胜，绝其粮道，大破之，杀秦将苏角，虏王离。秦将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在巨鹿之战中，楚军勇冠诸侯军。当楚军冲击秦军时，各诸侯将皆从壁上观。楚将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君无不人人恐慌。破秦军后，项羽召见诸将，他们进入辕门，都膝行而前，不敢仰看。项羽由是被公推为上将军，诸侯军皆由他统领。

接着，项羽屡败秦军，利用其主将与赵高的矛盾，促其投降。于是率大军入关。这时，刘邦已先入关占领咸阳，因刘邦只有兵十万，而项羽兵四十万，彼此力量悬殊，只好从属于项羽。天下权力终归项羽。

3. 凭暴力难成气候

项羽在战争中是英雄，在政治上是侏儒。

秦对六国战争，每战大多无敌，当时秦兵确是厉害！张仪游说韩王时，就以秦兵的厉害进行威吓。说：“秦军有一百万之众。六国军队作战，为保护自己，身披重甲，头戴铁盔，笨重作战不灵。秦军却不怕死，一上战场，就扔掉盔甲，拼命向前冲杀，左手提人头，右臂挟俘虏，争杀俘敌以争功得赏。六国兵遇着秦兵，好像懦夫对孟贲，怎能敌得过。秦以如此锐卒攻弱小的韩国，就像以千钧重压在鸟蛋上。”可是现在秦兵碰上楚兵，却倒转过来了。这是一场恶战，两军相争勇者胜，楚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这是因楚国战士有“不生还”的意志，拼着命“以一当十”，听着其“呼声动天”，可见士气之高，战斗之激烈。当然，秦卒是今不如昔，秦卒已不愿拼死为暴君二世卖命，而楚兵为推翻暴秦而战，也是为生存为正义而战，故勇气百倍！楚军取得这次使诸侯军惊得目瞪口呆的大胜利，除将士的拼死外，主要是项羽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且指挥得宜。他的胜利使诸侯将畏服，晋见时都爬着行不敢抬头。这一战，充分显示了他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项羽在战争上是胜利者，在政治上却是失败者。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与政治密

切相关，战争脱离政治，要最后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或巩固取胜的成果是不可能的。历史的事实都证实了这点。秦灭六国，确是秦国胜利了，但秦始皇以至二世之失失在人心上。有了天下却不争取人心的归附，反而实行暴政，促使人民反对自己，从这方面说，秦统治者是鼠目寸光的。政治工作实质是“攻心”工作，也就是争取人心的工作，做好这一工作，才能取得人心归附，统治者的地位才能巩固。而入心向背是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秦之速亡，是用暴政来满足其无穷的私欲，凭暴力来统治天下，结果适得其反，使人心厌秦恨秦，不亡何待。项羽推翻了暴秦，他没有做争取秦人的工作，使秦人心服归附，而是以屠杀为能事，把秦人推向其对立面，谁反对他，这位西楚霸王持其有战无不胜的江东八千子弟为核心的楚军，东征西伐，想凭着武力以占有天下。历史上往往出现重复的现象，也是因一些人对前车之鉴，目视无睹，而是朝着前人覆车之辙跑去，同样翻车也就不奇怪。项羽不以亡秦为戒，而是仍想以暴力治天下，必然是步着亡秦的后尘走去。

由于国耻家仇，项羽恨秦是必然的。但“成大事者不计私怨”，为了有利于图天下，即使不共戴天之仇也要丢掉。而项羽从其狭隘的复仇思想出发，不论是在战争中，或是破城后以至经过的地方，甚至对已投降的敌军俘虏，一概加以屠杀。如项梁派项羽攻襄城，襄城将兵坚守不下，项羽破城后，全部坑杀；项羽攻破城阳，也照样屠城。项羽恨秦军杀其叔父项梁，故怀王派刘邦西向攻秦老巢时，项羽也要求同往以复仇，怀王诸老将因项羽残暴不同意他入关，主张派一贯宽厚的刘邦前往，不侵暴秦人，得秦人心就可推翻暴秦。于是，不让项羽与刘邦西向攻秦，派他跟宋义北上救巨鹿。怀王诸老将对项羽的看法是对的，他对待秦人确是残酷得很。章邯率秦主力军向项羽投降，到新安时进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秦统治时，各地被派谣役或戍边的吏卒、民夫经过秦地，常受到秦吏卒的侮辱，故甚恨秦人，现在秦军为降卒，六国诸侯军把秦降卒像奴隶般役使，且进行侮辱。投降的秦吏卒暗中私议说：“章邯将军诈骗我们投降诸侯军，今能入关破秦，那可以立功；如不能，诸侯军必虏我们东归，秦王必尽杀我们的父母妻子。”诸将听到了，便报告项羽。项羽便召英布等心腹大将计议说：“秦降卒多，其心不服，入关后不听命令，事必危，不如将之屠杀，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在夜间坑杀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

但是，项羽的残暴，并不到此为止，入关后为复仇仍然大肆杀人放火。先入关的刘邦因自料敌不过项羽而归附后，项羽便引兵“西屠咸阳”，这就说是楚兵入秦国首都咸阳后见人就杀，其中就包括秦降王子婴。过去秦兵屠杀楚人，现在楚兵屠杀秦人，各使敌国人与己之仇不共戴天，“楚人存下三户也足以亡秦”，楚兵不可能把秦人杀尽，秦人存下三户也不是足以亡楚吗？后来刘邦正是在秦人的大力支援下打败了项羽。在屠城的同时，项羽还纵火烧秦宫，“火三月不灭”，可见其所烧的范围之大，所烧的之多了。秦灭六国，将天下财宝文物集中咸阳，以天下人之力建阿房宫，全国文化的精华聚集在此，而项羽竟一火烧之，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摧残！项羽不保存祖国辉煌灿烂的文化，使之服务于楚国，并继续发扬光大，可见其愚蠢，而残暴与愚蠢是相通的。

由于项羽凭暴力行事，就不会考虑到其政治后果。因此，项羽入咸阳后还犯了一系列的政治错误。一是不都咸阳而东归。咸阳当时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以号今天下，因此有人向项羽建议说：“关中山河险

阻，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项羽见秦宫室都已烧毁，又舍不得离故乡而心切思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有那个看见呢？”说者对人说：“有人说楚人像个性暴躁的猴子一样，戴王冠是不长久的，他说得对啊！”项羽听到了，便把这人煮了。于是，将掠取到的货宝和妇女东归，建都于彭城。而彭城缺乏建都条件，后刘邦趁项羽外出征伐一攻便破。二是分封诸王，孤立自己。项羽想自立为王，便先封诸侯为王。他对诸侯说：“天下初起义反秦时，都立原六国后以伐秦。而冲锋陷阵，三年间灭秦而定天下的，都是靠将相诸君与羽之力。义帝虽无功劳，也当分地封之”诸将都赞成说：“好！”于是项羽乃分天下，分封十八人为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秦鉴于周国分封，使诸侯各自扩张势力而弱周室，造成尾大不掉，促使天下分裂，互相讨伐，故废分封而改为郡县。加强了中央集权。项羽不继承秦建郡县制度而沿用周的分封制度，尔后诸侯王纷纷叛变使已孤立，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杀义帝。诸侯王各到其封国后，项羽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为借口，派人迁徙义帝到长沙郴县，过江时将之杀害。义帝是项梁为号召楚人反秦而立，他确无功，迟早被人除掉。但他是楚国人的象征，楚人对他是有感情的。当时秦虽被推翻而天下尚未稳定，项羽不利用这象征以号令天下，杀之是一大失策。后来刘邦为义帝发丧，声讨项羽之罪，动员楚人反对项羽。

项羽犯一连串政治错误，皆因仅凭暴力之故，而仅凭暴力行事是难成气候的。

4. 优柔寡断失良机

项羽之所以缺乏政治眼光，是由于他不喜读书，认为读书只不过能记姓名而已，因而不通历史，也就不能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加上他对秦的复仇思想使他顾不及政治后果，这是使他犯错误的一方面。但他的一些失策却是另一方面的情况，不是因其凭暴力行事，而是因他具有恻隐之心。陈平曾在他手下做过事，说他“恭敬爱人”。项羽这人对秦人是恨之入骨的，屠杀而不手软；对于自己阵营里的人，即使疑其有不轨行为，往往不能断然处置，因而有纵虎归山的后患，他对待刘邦就是如此。

刘邦因有怀王的“先入关者王”之约，他率兵破关后，就想遵约据有咸阳称王，故派兵守函谷关。项羽率诸侯兵到不得入，又知沛公刘邦已破咸阳，并派兵守关，项羽大怒，便破关而入。这时，刘邦驻军于霸上。刘邦左司马曹无伤使人报告项羽说：“刘邦想在关中称王，使子婴为相，珍宝都已占有。”项羽大怒，立即下令：“明天早晨让士卒饱饭，击破沛公军！”范增对项羽说，“沛公在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显然想要图天下。应将之消灭，切莫失此良机。”项羽叔父项伯因好友张良这时在刘邦处，便连夜将此消息告知张良，使他离开以免“从俱死”。张良便向刘邦叫他与项伯约为兄弟和婚姻，使项伯向项羽说情。刘邦用其计，次日早上就带百余骑到鸿门拜见项羽，说：“我与将军并力攻秦，在这里得再见将军。由于有人进谗，致使将军对我有所误会。”项羽说：“这是因你的左司马曹无伤向我说你据关中称王，不然，我不会如此。”项羽当即留刘邦饮酒。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立。范增以眼看项羽三次，举所佩玉环示意斩刘邦，项羽都默然不理。

范增便起身，出召项庄，对他说：“上将军为人不忍，你可入向前祝寿而舞剑，乘间斩沛公，否则，我们将来都成为他的俘虏了。”项庄则入上前祝寿，祝寿毕，说：“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舞剑助兴。”项羽说：“好！”项庄便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保护沛公，故庄不得下手。张良见形势不妙，急步至军门，见樊哙。哙问，“今日之事何如？”良答道：“甚急。现在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哙说：“我请入，与之同命。”哙就带剑拥盾入军门。守门卫士举戟相交阻其入，哙侧身以盾撞，卫士仆地，哙逐入，披帷西向立，怒目注视项羽，目眦尽裂。项羽按剑说：“干什么的？”张良说：“他是为沛公驾车的樊哙。”项羽说：“壮士，赐他一大碗酒。”侍从拿酒来，哙一饮而尽。项羽说：“赐他一只猪腿。”侍从拿来猪腿，哙把盾牌放在地上，把猪腿放在肩上，拔剑切食。项羽说：“壮士，能再饮吧？”樊哙说：“我死都不怕，何惧一杯酒。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不多，判罪唯恐不重，逼得天下皆叛。怀王曾与众将约‘先入关者王’。今沛公先破秦下咸阳，他毫不取，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上将军来。派将守关，是防备他盗出入和发生非常的事故。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谗言，欲杀有功的人，这不是要走亡秦的老路吗？”项羽没有回答，只说：“请坐。”哙从良坐。一会儿，沛公出外小便，因招张良、樊哙出，令张良留谢，交给张良白璧、玉斗各一双分献给项羽、范增，沛公与樊哙等便离去。张良入谢说：“沛公不胜酒力，不能辞行，使我奉白璧一双献给上将军，玉斗各一双献给亚父范增。”项羽说：“沛公在哪里？”张良说：“因知上将军有意督过，已脱身回去了。”项羽接受璧，置于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于地上，拔剑击碎，叹气说：“唉！如此庸人实难与谋大业。夺项王天下者必是沛公，我们将为他俘虏了。”

以上便是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所描绘的“鸿门宴”紧张而精采的镜头，项羽的不忍，范增的深算，张良的急智，樊哙的勇敢，都活灵活现。而沛公能脱身归去，主要是因项羽具有恻隐之心。项羽与刘邦都曾是项梁的部下，曾多次一起攻城略地。项梁败后，也由于二人同心协力，振兴楚军，成为两支最精锐的部队；推翻暴秦，二人功劳最大。长期的战友，患难与共，项羽对刘邦是有一定的感情的。他听了刘邦的花言巧语和樊哙的恳切陈辞，便信以为真，即使觉得范增说的有理，一时也不忍斩之。结果是优柔寡断，不纳范增之议，中了张良之计，纵虎归山。

5. 连范增也出走了

凡争天下的，能否得人才是胜败的关键。在战时最起作用的人才无非有两种，即谋臣与骁将。有谋臣运筹帷幄，有骁将冲锋陷阵，才有胜利在握的希望。而有无人才，决定于能否任贤举能，在这方面，将项羽与刘邦相比较，项羽远远不如刘邦。刘邦用人是“五湖四海”，故人才多归之。且善用奇才而信任之，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项羽用人大多限于亲属或所谓“亲信”，有才之士不能施展己才而投向刘邦，即使已有的人才也因疑而不信，不能起应有的作用，或愤而离开。

韩信、张良、陈平和英布等都是难得的人才，都是刘邦的开国功臣。而这些人有的曾在项羽麾下工作过，有的是项羽的心腹猛将，有的与项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项羽能留住和信用他们使不为刘邦所用，那么楚汉相争的历

史就要重写。韩信是淮阴人，项梁率起义军渡过淮河时，他杖剑投于其麾下，及项梁败，又归项羽，项羽只给他当个郎中。他数次向项羽献策，项羽不用。项羽入关后号今天下，自封为西楚霸王，这时韩信认为在项羽手下不能施展己才，当刘邦被封为汉王入蜀时，便背楚归汉。陈平是项羽略地到黄河上游时前往投奔项羽的。陈平从项羽入关破秦，被任为爵卿。殷王叛，项羽任平为信武君率兵击败殷王，项羽任他为都尉，赐金二十镒。后汉王攻下殷，项羽不分青红皂白要杀尽镇守殷的将吏，陈平惊被杀，便投奔汉王刘邦。陈平曾对刘邦谈及他归汉的原因说：“项王不能信人，他所信任的人，不是其项氏族人就是妻子的亲属，虽有奇士也不能用，我才离开楚。听说汉王能用人，故归大王。”张良与项氏的关系比较亲密。张良刺秦始皇不成藏匿于下邳时，项羽的叔父项伯杀人，逃避在张良住处。正因他与项伯的关系，张良与项梁、项羽都有往来，故后来刘邦与项羽不协调或对项羽有所求，都是通过张良疏通解决，刘邦能脱“鸿门宴”之险及取得汉中地，都是张良请求项伯从中帮助。张良是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才，项羽既不发现，也不争取。而当时项羽正在得势，通过项伯是有可能使张良归楚的。张良与刘邦只是泛泛之交，但二人一见如故，刘邦对张良言听计从，十分亲任，故张良死心为刘邦献智效力。

由于项羽不善于举贤任能，其手下人才寥寥无几，能起作用的只不过是范增、钟离昧、龙且等数人而已。龙且虽能战，但骄傲自负。韩信率汉军击齐，齐王求救于楚。项羽派他率大军二十万救齐，齐王信与楚军并军将与韩信战。有人向他献计，认为“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可深壁高垒不与战，使人告知所陷城他的降汉的齐将兵，他们知道齐王尚在，楚兵来救，必叛汉。汉军孤立，又无粮，可不战而降之。”龙且骄傲地说：“我平生知韩信为人，容易对付。”便与信军夹潍水布阵。韩信乃令人在夜间拿万余囊，满盛沙，塞潍水上流，引龙且军半渡而击之，佯不胜而退走。龙且高兴地说：“我固知信胆怯。”就渡水追信军。信使人搬去沙囊，大水汹涌而到，龙且军大半不得渡，信军急击，杀龙且。龙且在潍水东的军散走，齐王广逃亡。韩信率军北追到城阳，全俘虏楚兵（《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龙且远非韩信对手，不是大将之才。至于范增和钟离昧，经不起陈平的反间计，项羽对他俩怀疑而不信用。项羽回兵救彭城，打败刘邦率领的诸侯军，追到滎阳。项羽数次断绝汉军粮道，汉军缺粮，刘邦惊恐，割滎阳以西为汉请和。项羽拟同意。范增说：“汉军将被打败，今释而不取，后必悔之。”楚军便急围滎阳，形势很危急，汉王使用陈平计离间项羽君臣，项羽使者来，使人以丰美的酒食隆重接待，见了使者佯惊愕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原来是项王的使者。”便将美酒佳肴拿去，换粗食送来。使者回告项羽，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便稍夺其权。范增大怒说：“天下事已定了，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去。”项羽因不信任范增也就不挽留。范增是很有才智的谋士，他知夺楚天下的将是刘邦，数次要求把刘邦杀掉，因项羽优柔寡断，致使刘邦得与之争天下。这时，范增是项羽的唯一的智谋之士，现在连一贯忠心耿耿的范增也被怀疑，逼得他出走，项羽的前途可想而知。

6. “四面楚歌”的悲剧

在楚汉相争中，项王是屡战屡胜，汉王是屡败屡战，因项王失人心少助，

汉王得人心多助，最后在垓下决战时，双方力量对比倒转过来了，汉军比楚军多而强。时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间四面皆唱起楚歌，项王大惊说：“汉军已尽占了楚地吗？为什么汉军里楚人这么多！”他不能再睡了，便起来，叫侍者拿酒来，与美人虞姬对饮。项王最宠爱虞姬，常带她在身边。他还有一匹千里马乌骓，常骑之。项王饮了酒，情绪激动，感慨万千，面对今天处境，联想昔日英雄，不禁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睢不逝。
睢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歌词的大意是：力大能拔山啊，英雄盖世；时运不济啊，再不能乘乌骓南征北讨；再不能乘乌骓南征北讨啊，无可奈何；虞姬、虞姬啊，可怎么办？项王反复歌着，虞姬听着，悲痛欲绝，哭而和之：

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颜生。

虞姬随即拔剑自刎。项王不禁流下数行泪水，左右侍从都悲泣失声，不忍看他。

项王随即跨上乌骓马，带上八百余骑兵，在夜间溃围南出奔走。天亮了，汉军才发觉，令骑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追击。项王渡过淮水时只有骑兵百余人了。到阴陵迷路，向一老农问路，老农有意骗他说：“向左走。”项王与其随从向左奔逃，陷入了一大片沼泽，再找路时已迟了，被汉骑兵追到。项王又向东奔走，到东城时只有二十八骑，而追来的汉骑兵却有数千人。项王对其随从说：“我起兵八年来，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便称霸天下。今日被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今日与汉军决死战，必三胜之，为诸位溃围，斩将，砍旗，使诸位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乃分其骑为四队，四面对敌。汉军包围数重。项王对随从说：“我取彼一将。”令四面骑奔到山东边分三处集合。于是，项王大喊向前冲锋，汉军皆披靡，就斩汉一将。这时，汉一骑将赤泉侯来追项王，项王怒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回奔数里。项王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从山上驰下，又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只失两人。项王对其骑说：“怎样？”骑皆拜伏说：“如大王言。”于是项王逃到乌江。乌江亭长已在船上等待，对项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称王。请大王急渡，不然汉军到就渡不了。”项王笑说：“天之亡我，我何必渡！我带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回来，即使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有何面目跟他们相见？纵使他们不责备我，我心岂不惭愧！”又对亭长说：“公是忠厚长者，我骑此马已五年了，战无不胜，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特赐给公。”乃令余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器与追来的汉骑战斗。项王又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刺十余处。项王见故人汉

骑司马吕马童说：“我听说得我头的，汉赏千金封邑万户，你尝有恩德于我，我将此头报答你。”便自刎而死。

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确是生也英雄，死也英雄。他起兵八年，战无不胜，即使在汉军数千骑重重包围之下，一人仍给敌重创。他说“非战之罪”，这没有错。项王失不在战，失在夫人心，失在用人，失在优柔寡断，有此“三失”而要想占有天下是不可能的。图天下或统治天下，仅凭暴力而不讲政治，即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也必将失败告终。这便是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的悲剧，也是项羽给后人留下的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二、汉胜原因

反秦武装力量最强的有两支部队，一是首举义旗的陈胜领导的农民武装，一是项梁响应陈胜而发动楚人起事的项梁领导的武装。而陈胜、项梁都以失败告终，项羽继承项梁事业并领导原楚兵，农民武装则大多归刘邦领导。项羽战河北，刘邦战河南，终于推翻暴秦，接着两人争天下。本来项羽比刘邦强大得多，为什么刘邦终于取胜，并开创了西汉王朝呢？项羽失败的理由已如上述，现着重分析刘邦得胜的原因。

1. 乱世出草泽英雄

古时，人民一般来说是安份守己的，而人民造反，大多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

陈胜等揭竿起义正是因此。二世六年七月，下诏遣发贫民九百人到渔阳（今北京郊区密云县）去戍守，并令当天就出发。这支队伍由陈胜任屯长，还有两都尉监管。适天下大雨，道路泥泞难行，不能按限期到达，而失期，按秦法都要斩头。这些被暴秦压榨得活不下去的农民，久已积愤在胸，陈胜与其好友吴广商议，认为既然要死，不如造反以求生。他俩便设计杀了监管他们的两都尉，并将造反求生的意图告知所属戍卒，大家当然赞成。于是，大家在陈胜领导下起来造反了，攻城略地，各地被压迫的农民纷纷来参加，占据陈时，已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众人立陈胜为王，号为张楚。这星星之火一点，到处燃起燎原之火，各阶级的人反秦的越来越多。

刘邦也是因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刘邦原当泗水亭长，他经常为县押着夫役去骊山筑秦始皇陵墓。有一次送夫役到半路，夫役多逃亡，他自料到骊山时必跑光了。这样，他是要被斩头的。于是，他召集大家饮酒，对夫役们说：“大家都走吧，我也要逃避他乡了。”其中有十余名壮者愿跟随他。到陈胜起义时，刘邦已聚众近一百人了。在沛县掾、主吏肖何、曹参的策划和樊噲的参预下，刘邦率领其徒杀了沛县令，造反起来了。

还有黥布、彭越等人也是被暴秦所压迫而起来造反的。黥布，姓英氏，是个普通平民，犯暴秦刑法，受处在脸上刺字的刑罚，这种刑叫做黥，故称黥布。他被送往骊山筑秦始皇陵墓。当时参加筑陵墓的有数十万人之多，因不堪受压迫，便结伴逃亡，在江中为盗。后黥布率其徒众投奔项梁的反秦队伍，项梁死，归属项羽。黥布率领的骊山之徒因受压迫最深恨秦也最深，在救巨鹿和其他反秦的战斗中打先锋，拼死战斗，常常以少胜多。而楚兵勇冠

诸侯，实赖英布率领骊山之徒的英雄奋战。彭越原在巨野泽中捕鱼为生，因受苛政所逼，铤而走险，结党为盗。秦末大乱，彭越聚众到万亲人。在楚汉相争中，彭越和黥布先后投奔刘邦麾下，在打败项羽军中战功卓著，都被立为王。

这些草泽英雄是在乱世中才能出现的，他们也因在乱世才能称王或成就帝业。

在当时诸多乱世英雄中，开始陈胜的力量最强，影响最大，正如司马迁所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亡秦的序幕是他揭起的。虽然由他首举义旗而掀起反秦战火，但他终兵败身死，不能实现其亡秦壮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陈胜起事时，秦军力尚未削弱，可以集中力量镇压陈胜领导的农民军。二是农民军初起，战斗经验不足，其中自说懂得兵事的，只不过是曾在项燕军里占吉凶的周文，陈给他将军印西向击秦，由于人心所向，到函谷关时已有车千乘，卒数十万。兵虽多，因是乌合之众，被秦大将章邯所破，陈胜被其车夫庄贾所杀。三是脱离群众和用人不当。（《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被内奸所害后，农民军大多汇集于刘邦的麾下，刘邦实际上成为陈胜的继承者。刘邦后来能入关和战胜项羽，这与客观形势发生变化有关。陈胜虽败，他掀起的反秦风暴，严重削弱了秦的力量，而尔后各阶级组成反秦队伍，从四面八方暴秦冲击，使秦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因此，刘邦所处的地位比之陈胜有利得多。特别是，项羽率领楚军救巨鹿，牵制秦军主力，刘邦才得以顺利入关。由于项羽和刘邦两军打击，终于消灭秦军，推翻暴秦。而刘邦之所以能打败项羽，就刘邦其人和汉军而论，是因刘邦本人及其将相以及汉兵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和千锤百炼，战争经验日益丰富，战斗实力日益强大。尤其是刘邦本人善于御将、懂得争取人心和能集众智成大事，故他远比项羽高明得多。这便是他能打败项羽成就帝业的主要原因。下面将具体评述。

2. 实战中不断成长

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只有学而知之的人。任何英雄俊杰之所以成为英雄俊杰，都需要经过学习——实践——学习。只有如此的反复，人的才智才日益丰富，成就才越来越大。汉朝的开创者刘邦和开国功臣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刘邦原是个无赖，他不事生产，酗酒好色，是个“说大话，少成事”（肖何话）的人。其人喜交游，慷慨大度。这种人如在太平盛世，可能成为帮派首领，估计没有更好的前程；恰好他生逢在秦末乱世，苛政逼他投入反秦的战争。在战争洗礼中，他的劣根性的一面得到一定的改造，优点即喜交游、慷慨大度的一面得到发挥，能聚众容人。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野心也就大了。他在咸阳看到秦始皇时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是对皇帝高贵威武的羡慕，入关后就有当皇帝的雄心壮志了。初时，他看见秦宫豪华，美女如云，他好色酗酒的本性又发作，想留此享乐，后纳樊哙、张良之谏，以图天下为重，才还军霸上。这说明，刘邦这时已把争天下放在首位，只要对此有利的话都听，有利于此的事都干，他成熟了。

韩信原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是淮阴人，贫而无行，故没有被推荐到政府去做事。又不会生产和经商，尝寄食于亲戚朋友家，人多讨厌他。淮阴城

有一个卖猪肉的无赖青年对他说：“你这么高大，好带刀剑，实是装模作样以掩盖你胆小。”又当众辱他说：“你不怕死就用剑刺我；你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爬过去。”韩信注目看这无赖一会儿。就趴在地下从他的裤裆下爬过去。全市人都笑韩信胆小怕死。当时，韩信落魄到向人讨吃，未免有自卑感，且因此杀人没有必要，而这无赖还有一群恶棍想帮，他力敌不过，只能忍辱。但像韩信这样游手好闲的人，如果不是乱世，或在乱世而不投入反秦队伍，他肯定不会成为军事家，可能成为流氓。而一个人的变化有时是难于预料的，“士别三日，刮目相视”，不能用老眼光看人。楚大将龙且就是从韩信过去甘受辱的事看不起他，结果自己倒霉。韩信曾在项梁反秦队伍当兵，后又在项羽手下当郎中（侍卫），一直到项羽入关。在这比较长时间里，韩信在战争实践中得到锻炼，特别是他在楚军最高统帅项羽身边工作，从中学习项羽的指挥作战的才能，接受秦、楚战争的经验教训，正因具有如此良好的条件，使他逐渐成长，后来已能向项羽提出作战方略。因项羽不采纳而投汉。肖何与之谈话，甚为敬佩。后来在楚汉战争的实践中，他的军事才能不断增长并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一代名将。

汉军中的谋士、武将，除张良在未投汉前得黄石公授予《大公兵法》而有作战谋略外，其他大都是平民百姓，且都是社会最下层出身。如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患敬是车夫。这些人，原来毫无战争经验，对军事一窍不通，后来能成为汉的主要将领，还不是在战争实践中成长的。樊哙当他屠狗卖肉时，他不会想及天下之事。可是，在协助刘邦打天下后，他所做所想的已从图天下这个大局出发，故刘邦留恋秦宫和美女而不想离开时，他严厉批评刘邦这是走亡秦的老路。在助刘邦打天下中，他忠心耿耿，奋不顾身，在鸿门宴上刘邦危急时，他拥盾侧身冲入，慷慨陈辞，使项羽无话可说，才使刘邦脱身归去。樊哙已从一个计较斤两的屠狗之徒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将领了。周勃这个在丧事混饭食的吹鼓手，不只他人就是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成为将相。而在反秦和楚汉相争中，不断的战争实践，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将领，屡立战功，是刘邦最信任的大将之一，后来升为太尉，官到丞相。

至于陈平，是一个“盗嫂受金”品行不端的读书人。也许他从书本中已懂得兴亡之理，而后来他成为刘邦的杰出谋士，也是他长期从事反秦斗争中学到本领之故。肖何、曹参也只不过是县吏，开始也不懂得治国治军，在为刘邦打天下，肖何功居第一，曹参战功最大，后都位列丞相。如果不参加战争实践，决不会有此丰功伟绩，也不会位极人臣，其成就也是有限的。

在推翻暴秦以图天下中，逐鹿中原的英雄俊杰不知有多少。而最后刘邦得其鹿，固然与刘邦领导有方有关，但如果只靠刘邦一个，即使他有三头六臂或才干超人，也难得天下。显然，刘邦能得天下，正因他这个集团有许多杰出的人材，正因有这个人材群体，他操纵的战争机器，才能运转自如，指挥随意，即使在屡战屡败的劣势下，也能顶得住，坚持到最后胜利。

3. 因人因势御将相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只要善于用人，也要善于御人，而用人和御人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偏颇。如果能用人而不能御人，人将不听其指挥，会造成分裂：御使人而不能用人，人将不服而背离。因此，要使人心服而紧紧团结其

在周围，必须巧妙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刘邦就有这种天才。说是天才，并非说天生便有，而是说其人素质较好，智商较高，经过实践或别人启发，他易于领会，或自我揣摩无师自通。

刘邦能用并能驾驭韩信便是个典型的例子。韩信归汉后，刘邦只给他当治粟都尉，即管理粮饷小官，没有发现他是个奇才。只有肖何与他交谈，认为他是个大将之才，故韩信未被重用而逃亡时，肖何立即前往追他回来。经肖何的竭力推荐，刘邦拜他为大将，从一个管理粮饷的小官一下子提升为大将，这不能不使全汉军惊奇。这种机遇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对于韩信来说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不能不感激无涯，竭智尽力为刘邦打天下。刘邦虽放手让韩信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但对他有戒心，常常加以适当控制，特别是在韩信实力强大的时候。如刘邦曾派张耳随韩信东向征伐，韩信军先后破魏、代军，刘邦就派使抽调其精兵到荥阳以拒楚。这样既可增强荥阳守军力量，又防止韩信力量过大会出现尾大不掉的意外事。刘邦在成皋被项羽围急，刘邦逃出渡河到修武，修武是韩信、张耳军的驻地，刘邦一早自称汉使突入帐中，韩信、张耳还未起床，即在其卧外夺其印符，召集诸将。信、耳才知刘邦到，大惊。刘邦夺两人军，令张耳守赵地，任韩信为相国，收赵兵以击齐。刘邦就是这样既信任韩信，又常常控制其军为己用。刘邦打败项羽登上帝位，也出于对韩信的戒备，便以游云梦计擒韩信，削其王位，降为淮阴侯。有一次，刘邦与信谈及诸将将兵的才能，刘邦问信：“我能将多少兵？”信答道：“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兵。”刘邦说：“那么您呢？”答：“臣将兵，多多益善。”刘邦笑说：“多多益善，你为什么被我擒了？”信答道：“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所以信为陛下所擒。”（《史记·淮阴侯列传》）这说明，韩信是承认刘邦有御将的才能的。

对背楚归汉的黥布恩威并施，也显示了刘邦御将的巧妙手腕。刘邦利用九江王黥布与项羽的矛盾，便派随何去说黥布归汉。黥布到，刘邦却在床上洗脚时召见，布看见刘邦如此傲慢待他，大怒，悔来，想自杀。黥布出，到安排他所住的地方，见内帐、车辆、饮食都跟汉王一样，又大喜过望。刘邦坐在床上洗脚时召见黥布，是有意给他个下马威，以显示两人政治地位已不同。因为黥布和刘邦都同时被项羽封为王，两人地位是一样，现在黥布来投刘邦，彼此有君臣之分，故先施之以威，以明彼此地位。接着又施之以恩，在生活上待之如己，即给予王的优厚待遇。在刘邦的恩威并济下，黥布既安于下属之位，又甘心效力。项羽知黥布背楚归汉，立即派项伯收九江兵，将黥布妻子都杀了。布派人到九江，其心腹将率数千人归汉，从此，黥布死心塌地事汉以击楚，屡立战功，对打败楚起了重要的作用（《史记·黥布列传》）。

对于肖何，既给予重任，又暗中防备，但其手段很巧妙，使肖何小心谨慎，屡以行动表明其忠。肖何任县吏时，刘邦有事，常得肖何袒护。刘邦起事，肖何是谋主，及刘邦为汉王，以何为丞相。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肖何留守关中，供粮供兵无缺。关中成为刘邦的根据地，肖何是否忠心，关系到汉的成败，故刘邦时时派人到关中慰劳丞相肖何，实暗中观其动静。肖何知刘邦对自己有所疑，便派自己子孙、兄弟及宗室数十人到前线服役，刘邦才放心。

信任又控制，给恩惠又施之以威，这就是刘邦用人、御人的妙术。

4. 民心将心都归汉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人们常说而公认的一条规律。而在战时，所谓“人心”，主要指民心、将心、军心，这“三心”是互相联系又密不可分的。得民心，战争需要的人力、物力就源源不断得到供应；得将心，将校才为之拼命沙场。而兵还不是人民的子弟，得民心其子弟当然为之效死；而兵能否打仗还不是由将带出来，得将心就能训练一支勇敢的队伍。故说得民心和将心，也就得军心，军队就乐于战死，胜利在望。相反，如果不得民心、将心，也就不得军心，就使人力、物力不得补充，将领不愿效命，军队不想打仗。这样，不败何待。

项羽反秦，得楚人之心，六国人之心，故能率领六国诸侯军推翻暴秦。但在胜利的同时，他所过无不残灭，逐渐失去人心，特别是秦人对他的怨恨。刘邦与他不一样，他胜利进军入关，既不扰秦人，也不增加秦人的负担，连秦人自动送来的慰劳品，也婉言拒绝，原任官职的照旧，连降王子婴也保护起来。对于暴秦的苛政峻刑尽除去，只与秦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而项羽刚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入关后，不只杀降王子婴，还到处屠杀烧掠，纵火把秦官烧成一片焦土。两相对比，一仁一暴就极其明显。秦人拥护刘邦而怨恨项羽是必然的了。在楚汉相争中，秦人怕项羽取胜，他们将大遭殃，故倾尽全力支持刘邦。刘邦虽屡战屡败，而秦人供应的人力、物力源源不断，使刘邦一次又一次挨过难关，最后打败了项羽。

能否得将心是胜败的关键。项羽重用人是局限于他项氏宗族和妻子的亲属，如此划线，在这圈子里的人才当然是有限的，而圈子外虽有人才也就不能用了。韩信和陈平都是奇才，韩信是归刘邦后立大功被刘邦称为“战必胜，攻必取”的大将才；陈平归汉后曾六出奇计为刘邦取天下安天下。而这两人原是楚营里的人，项羽对他们言不听，计不从，于是便背楚归汉。韩信归汉后屡立奇功，被任为齐王，手握重兵，到后来成为楚汉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时，汉军日益强大，项羽恐惧，便派盱眙人武涉往说韩信。他说：“天下人因苦秦久了，故合力反秦。破秦后，项王计功割地，分土封王，以休士卒。今汉王举兵向东夺人之地，破三秦后率诸侯兵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不罢手，其不知足如此之甚。汉王是不可靠的，他几次落到项王的手中，项王怜而活之，但他一脱身便背约，复攻项王，其人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要被他所擒。足下得以至今不被他暗算，正因项王尚在，需要你为他打天下。当今二王相争，胜败定于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明日必轮到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而王之？今失此良机，一定要为汉攻楚，难道是智者所做的事吗！”尽管武涉分析形势，说明利害，韩信不为所动，婉言加以拒绝。他说：“我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策不用，故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让我统率数万大军，他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我才有今天的地位。汉王如此亲信我，背之不祥，我虽死也不易心。”韩信表明对汉王的生死不易的忠心，实是当时汉将心归汉王的反映。

5. 集众智以成大事

楚汉久相持未决胜败，项王要求与汉王独战以决雌雄。汉王笑说：“我

宁斗智，不能斗力。”以两人智比，项王智不逊于汉王，为何汉王“宁斗智”？这是因为项王自负独断独行，不纳智者之策，而其个人智有限，故多失计；汉王兼听纳谏，集众智成大智，故乡得计。项氏世世为楚将，代代有家传兵法，项羽叔父项梁主曾以兵法传授项羽，项羽打起仗确有一套本领，在垓下决战前，他亲身领导的战役几乎是战无不胜，也因此自负不凡，不仅对身边的郎中韩信几次上策不屑一顾，连老谋深算的范增多次献计也当耳边风，因而屡失战机。使刘邦能屡败屡起，最后置他于死地。刘邦起事之前，是个酗酒好色的无赖之徒，父亲是个农夫，当然无家传兵法，对打仗是外行；他又不读书，也就不能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懂得兴亡之理。但他有个显著的长处，就是虚心听取别人的计策。故能集众智成大事。

刘邦在战争实践中，也懂得些行军打仗之事，但“运筹帷幄”非其所长，往往作出错误的决策。由于他对张良、陈平等谋士言听计从，故能及时纠正错误，实行正确的决策。如刘邦率军西向攻秦，因秦将坚守宛城，攻不下，刘邦率军越宛城西进。张良谏说：“沛公虽急欲入关，但秦兵尚多，拒险而守，难于攻破。今不下宛城，如越城西向，宛守军从后追击，前面秦兵拦截，前后夹攻，将处于危机。”于是，刘邦于夜间率军从他道回来，更换旗帜，天黎明时，包围宛城三周，守将要自刎，其舍人陈恢止之，便往见刘邦，说：“宛城认为降必死，故皆坚守。汉军强攻，死伤更多。为足下计，最好的降，封其守将官职，使其留守，引其甲士西进。其余城池知优待投降将士，必争开门投降，汉军将通行无阻。”刘邦说：“好！”乃封宛城守将为殷侯，封陈恢为千户。刘邦率军西进，无不下者。而汉军所过，军纪严明，不掳掠屠杀。于是，先诸侯军进入关中（《史记·高祖本记》）。

刘邦被项羽急围于滎阳，便与酈食其谋议削弱项羽权力。食其建议：“秦灭六国，其后人无立锥之地。如汉能立六国之后，其君臣百姓必感恩戴德，必支持汉而反楚。”刘邦表示同意，便叫人刻印，派食其前往分封六国后代。食其还未启程，张良从外来到，项羽将食其主张分封事相告，张良说：“天下游士离乡别井来投汉，拼死立功，所盼望的是想得封侯赐邑，今复立六国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谁与您取天下。楚强，六国必从之，那会附属于汉。用立六国之谋，汉大事完了！”这时，刘邦正在吃饭，听了张良的话气得吐出来，大骂道：“竖儒，几败乃公事！”立即叫人销毁印章（《史记·留侯世家》）。

6. 抓战机进行决战

在楚汉相争后期，楚汉两军在滎阳东北广武对峙。这时，彭越在梁地，神出鬼没袭楚后方，绝其粮道；韩信破齐后起兵击楚。项羽恐惧，乃与刘邦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归。张良、陈平认为是消灭项羽良机，让其东归是纵虎归山。刘邦便进兵追项羽，到阳夏南驻军，待韩店、彭越军到击楚军。到固陵，仍未见韩信、彭越应约前来。楚击汉军，大破之。汉军复入壁，深堑坚守。刘邦势孤，毫无办法。后用张良计：从陈县以东到海滨的土地封给韩信，唯阳以北的土地封给彭越，并调黥布率兵来会战。韩信、彭越得封地立即听令会师于垓下，刘邦终于打败了项羽，开创西汉王朝，登上了皇帝宝座。

第三章 光武中兴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在新朝失政农民纷纷起义、群雄逐鹿中原时，刘秀以“复兴高祖之业”为号召，招降纳叛，芟除群雄，统一天下，开创东汉王朝，称汉光武帝。史称“光武中兴”。

刘秀虽属汉宗室，到其诞生人间，已是一个普通平民。青年时，默默无闻，无所作为，未见他有什么超人才干，后为何能崛起于群雄之上，实现中兴大业？这除了“时势造英雄”外，他本人也有其成为英雄的素质和能耐。

一、趁机起事

时势固可造英雄，但其本人没有英雄所具备的条件和胆识，抓紧时势所赋予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敢想敢于善于，时势也造下出英雄。因为在同时代的人中出现的时势，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为什么同处一样的时势，同样是普通平民，彼此原来未发现有多大差别，而随着时势的发展，大多数人依然故我，而其中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却能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不只能操纵时势，且能改变时局，以至扭转乾坤，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的史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1. 新失政天下大乱

西汉末年，政治黑暗，皇室、官僚、地主三位一体压榨百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民不断沦为奴隶。使社会矛盾加剧，流民纷起造反。且西汉末朝皇帝都是庸主或娃娃皇帝，实权已掌握在王氏外戚手中，西汉灭亡已不可避免。王莽用和平手段代汉后，为挽救当时政治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实行井田制以解决土地问题：废除奴隶，铲除这种罪恶制度；实行王均、六筦，稳定物价，减轻人民所受的剥削。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他是按照儒家学说的精华以改造社会，缔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由于受到既得利益的强烈反对，和其所实行的改革措施，或因用人不当，或因理想不适于现实，或因改革过繁和急于求成，终于把好事变成坏事，社会矛盾重重，加上连年蝗灾，遍地荒饥，盗贱蜂起，天下大乱。当时农民起义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有三支起义队伍，即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

王莽统治末年，南方饥荒，荆州（今湖北江陵）广大农民到野泽去掘食鳧茈充饥，连鳧茈也掘不够吃，便互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能为百姓平理净讼，彼众人推举为头头，其众有数百人，劫富济贫为生。不久，一些亡命之徒马武、王常、成丹等人来投，数月间发展到数千人。这支队伍以绿林山（今当阳）为根据地，举行起义。公元21年（地皇二年），新朝的荆州牧率兵二万来攻，王匡等率众迎击，大破官军，杀数千人，尽缴获其军用物资，攻占竟陵（今天门）。转击云杜、安陵，多虏妇女，回到绿林山时，已有五万余人，州郡不能制。第二年，瘟疫流行，死者近半，便各散去。由王常、成丹等率领的队伍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由王匡、王凤率领的队伍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新市兵攻隋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聚

众千余，号平林兵，与新市兵联合作战（《后汉书·刘玄列传》）。

赤眉军是于公元18年（天凤五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义。初起时只有百余人，后发展到数百人。其徒众穷困相聚，无攻城徇地之计。彼此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口头相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地位高的称三老，其次称从事，再次称卒史，一般互称巨人。为了与新朝军作战时分清敌我，便染红眉毛，故被称为“赤眉军”（《后汉书·刘盆子列传》）。

铜马军部众甚多，在今河北省全境和山东北部，有农民起义军数十支，大者数十万人，小者数万人，总共约有数百万人，各立名号，不相统属。

农民军的起义，各种各样的野心家便趁机而起。当时，人们多认为王莽是篡位，当汉帝是天命，皇帝应由刘家人当。因此，农民军的头头们都不敢打出自己的旗帜以争天下，总要找刘邦的后代来牵头。绿林军就找到刘玄当皇帝，据说他是皇室最亲近的一支。赤眉军则立刘盆子为天子。即使是割据者，如占今甘肃全省的隗嚣，初起事，就建汉高祖庙，称臣奉祠，跟其三十一将，割牲同盟，宣誓效忠，说什么“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其实是欺天骗人之举，他并无诚心归汉。有的如河北的王郎，并非汉室，也假称是汉室的后代作为号召。

当时，割据称雄的甚多，除隗嚣、王郎外，东有刘永，北有彭宠，西北有卢芳，西南有公孙述等等。至于乘乱各立门户混水摸鱼的不可胜数。

2. 假图讖举兵复汉

起源于殷周时的天命说，认为“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运，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把自己意志假托为上帝的命令，称为“天命”，使人民眼从其统治。孔老夫子虽不怎么信鬼神，但信“天命”。汉高祖刘邦初举事时，则制造“天命”的神话。据说刘邦饮醉后行经泽中，见一大蛇当路斩之。后来他的徒众有人在夜间来到蛇所，有一老母痛哭，问其故，老母说：“人杀五子，故哭之。”又问：“子为何被杀？”答：“我子是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这暗示刘邦是赤帝子化身，要代白帝子为皇帝。消息一披露，广为流传，人们都畏服刘邦。这显然是刘邦一伙所搞的鬼，为其反秦制造舆论。这也说明西汉王朝从其高祖开始就以“天命”之说来使人接受其统治。迄西汉王朝第六代武帝时，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天”有目的安排，人间的尊卑关系也是天定的秩序。到西汉后期出现图讖说，即“讖书”，是巫师或方士制作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实属于“天命”说的一种，用来愚弄人民或有所为而先制造舆论。刘秀起事之初，就是假图讖以动员人民拥护刘氏以反王莽的。

发动群众参加的大事，必须舆论先行，而舆论宣传要抓住群众相信的进行，才能调动群众。当时，人们迷信“天命”，故统治者或造反者都用它以控制或发动群众，这已成为愚弄群众的一种手段。正如前面所述，都取得一定成效。刘秀对其祖辈所为是心领神会的。当农民因饥荒纷纷铤而走险时，早就“好侠养士”以伺机反莽的刘伯升立即聚众起事。伯升是刘秀胞兄，因伯升的宾客多为小盗，官衙追捕，累及伯升兄弟，刘秀避匿在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讖说刘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初不敢当，但想其兄伯升素轻财结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之兆已现，天下正在大乱，李通等所言

正合己意，便与李通定谋，招兵买弩，在宛举事。那时刘秀才二十八岁。刘秀率领其徒众回春陵（今枣阳）时，伯升已起兵。于是，便与新市、平林兵联合作战，连败王莽军，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因众虽多而无所统一，便共议立刘玄为天子，改元更始。由伯升率领的队伍攻宛城；由王凤和刘秀率领的部队攻昆阳（今叶县）。

新、汉“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也是刘秀为起义军立下最显赫的战功，对新朝是致命一击。这一战使刘秀初露锋芒，从默默无闻到扬名于当世。义军攻入昆阳，其它义军屡胜，王莽十分恐惧，便集中力量想一下子将之消灭。王莽征调六十三家善兵法的数百人，任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组成大军，其行军时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个名叫巨无霸的人，身高一丈，腰阔十围，任为垒尉；又把许多虎、豹、犀象等猛兽带入军中。以助军威。这是自秦、汉以来，出师如此盛大的未尝有过。这支官军共有四十三万，号称百万，由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导率领。刘秀率领数千兵进驻于昆阳外城阳关，诸将见莽军声势大，惊得急奔回昆阳，为保妻儿，欲分散逃命。刘秀激励诸将说：“今我兵粮既少，而外敌强大，并力抵抗，可望立功；如各分散，将全被俘虏。且宛城还未攻下，不能相救，昆阳被攻破，其他各部也将消灭。今不同心胆以立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是自取灭亡。”诸将怒说：“你有什么办法，敢说大话！”刘笑而不答。适前往侦察敌情的骑兵回来说敌大军将到城北，军队长有数百里，还看不见其后。诸将无计可施，只好再请刘秀计议。刘秀复为之论成败之计，诸将听从。时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便使王凤、王常留守，晚间自领十余骑奔出城南门，到各处收兵支援。到鄠县、定陵调义军各营兵马，诸将贪惜财货，要留守不愿救援昆阳，刘秀说，“如能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被打败，脑袋也没有了，还有什么财宝！”经刘秀动员，诸将才同意。官军围昆阳数十重，甚为危急，王凤等乞降，不许，只好死守。而王邑、王寻破城在翻身间，甚为得意，不虑其他。刘秀率援军到，自领步骑千余，距官军四五里列阵。寻、邑派数千兵迎战，刘秀率军冲锋，斩敌数十。这鼓起诸将勇气，大家兴奋他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真怪！我们要上前。以助将军！”刘秀得诸将助，挥师进攻，寻、邑兵退，诸将追击，斩敌数百，连胜，士气高涨，勇猛向前。时伯升已攻占宛城，刘秀还未知，他使人谎报城中，说：“宛救兵到”，但将其书有意失落于邑、寻军前，寻、邑得书，心中害怕。而刘秀军因胜，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十。刘秀亲率三千敢死队人其中军，寻、邑阵乱，遂杀王寻。昆阳守军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呼声动天，莽兵崩溃，互相践踏，潢水满溢、虎豹股栗，士卒争逃，溺死以万数，水为之不流。王邑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义军获莽军用物资，不可胜数（《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玄深忌伯升威名，以他事将之杀害。刘秀知道了立即到宛城请罪，伯升部属来迎接，他不交一私语，只引过自责。他既不自夸昆阳之功，也不为伯升服丧，饮食谈笑如常。刘玄对这位堂兄弟也无可奈何，也因刘秀如此而感到惭愧，便任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王寻、王邑大军溃败，长安不久即为起义军所破，王莽被杀，洛阳也被起义军占领。刘玄建都于洛阳。刘玄派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名义出使河北。这对刘玄来说是纵虎归山，对于刘秀来说是摆脱更始政权放手大干的良机。刘秀一到河北就极力争取人心，上自郡守，下到佐吏，一一亲自接见，

既为了解情况，也为更好团结下属。他还平遣囚徒，革除苛政，救济饥民，恢复汉官员。官吏和百姓都喜悦，争持牛酒慰劳。当时王郎占据邯郸自立为皇帝，由于刘秀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终于打败和消灭王郎集团。刘玄封刘秀为肖王，召其回洛阳，刘秀以“河北未平”为辞，便与刘玄决裂。后镇压并收编铜马等农民起义军，队伍扩张到数十万。公元 25 年（更始三年），刘秀的老同学强华献《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所谓“四七之际火为王”意是：四七即二十八，自汉高祖至刘秀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汉属火德，故说火为王。这《赤伏符》是预言刘秀为帝。刘秀便以《赤伏符》的预言为依据，在部（今河北高邑）南即帝位，改元建武，创建东汉王朝。不久入洛阳，定为都城，后降新市、平林军，派兵镇压赤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于公元 36 年（建武二十年）统一全国。

二、其人风格

同是人，就有其共同点，也都有其特点。刘秀不例外，必然也有他个人的独特风格。而人是各种矛盾的综合体，其本身也是互相矛盾的。如刘秀这人性谨厚，平易待人，但又城府根深，使人难测其高保，且能忍人所不能忍。他这两种对人对事互相矛盾的态度，对其事业的成就都有较大的影响。客观世界是在变化的，作为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的人，也必然在变化。刘秀从一个勤于农耕的人到成为学富五车的人，这是客观形势所促成的。这对他驾御部属，操纵战争以至治理国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下面将对刘秀其人的独特而矛盾性格进行具体的分析。

1. 性谨厚笃志于学

刘秀年轻时，为人谨慎，厚道公正，平易待人。他因有这种性格，故得到人信任，并能团结人，故在他争天下中得道多助。

当他的哥哥伯升在聚众起事时，人们都不听他的话，皆逃亡自匿，说：“伯升杀我。”因造反是灭族，伯升叫他们造反，这无异是要杀害他们。后来，看见刘秀也穿戴红衣大帽的将军服装，从宛率领的队伍回来参加造反了，都惊奇他说。“象刘秀这么谨慎、厚道的人也造反了！”由于他们信任刘秀，认为刘秀这样做大概不会错的，于是，才放心了。这么一来，不少人参加进来，伯升终于招聚了七八千人的队伍。后与新市、平林兵联合作战，打胜仗时获得财物，因分财物不均，众人愤恨，欲反攻诸刘。刘秀不贪财物，便将其宗人所得的交出，全部分给众人，众人才高兴，避免一场内讧。由于刘秀为人谨厚，又不贪财物，得到人们信任，威信较高，将众人团结在他的周围。

刘秀厚道性格不变，但其人在变，即由一个勤于耕田的农夫变成笃志于学懂得文武之道之士。由于刘秀年轻时“勤于稼穡”，伯升讥笑他好像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仲。刘邦年轻时，游手好闲，到处游荡，不如他的哥哥刘仲勤治产业。刘邦父亲为此批评刘邦，而赞他的哥哥。及刘邦为皇帝，把这旧话重提，对他的父亲说：“今我的产业比之刘仲谁的多？”用以自夸。伯升就以刘秀比刘仲，以此讥笑刘秀。这讥笑也许对刘秀有刺激，使他笃志于学，发奋图强，后刘秀到长安向中大夫许子威学《尚书》，略通大义。《尚中》

的“尚”通“上”，即上古帝王的史书，它记载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史实。如尧舜禅让、夏禹治水、商汤伐桀、盘庚迁殷、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事迹。同时对这段历史时期中的天文、地理、刑法、教育、治国之法，哲学思想、典章制度等都有真实的反映。既然刘秀这时已略通《尚书》大义，说明刘秀在参加反莽起义前已懂一定治乱之理，已非昔日“勤于稼穡”的刘秀了。刘秀在以后仍笃志于学，并在实战中不断得到提高，逐渐成为一个文武全才的统帅。孙权在鼓励吕蒙读书时，曾引用刘秀笃志于学的例子说：“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正因此，刘秀的才智日益增进。由于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又能结合实践经验加以发挥，故在决定作战方案上比其麾下大将高明。吴汉率大军讨伐割据西蜀的公孙述，行前刘秀告诫吴汉说：“公孙述在成都有十余万兵，不可轻敌，要坚拒于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如敌不敢来，则迫进之，待其力疲，乃可击之。”吴汉因初胜，便率步骑兵二万余进逼成都，驻兵于江北；使副将率万余人驻兵江南，彼此相距二十余里。刘秀得其部署兵力的情况，大惊，派使带诏书责备吴汉说：“曾有告诫，为何临事如此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那能相救，敌如出兵阻击公，并派军攻尚，尚破，公即败。即急引军还广都。”诏书未到，公孙述果派将卒兵十余万攻汉，另派将万余人击尚，令不得相救，兵败，汉走入壁，被敌包围，经诸将拼命战斗才突围回广都，留刘尚抵抗述军，并向刘秀报告，深自谴责。刘秀回书说：“公还广都，甚得其宜，敌必不敢攻尚而击公。如敌先攻尚，公从广都援尚，路程只不过五十里，公军到时，适敌已危困，击之必破。”吴汉按刘秀部署，与述军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胜。最后，述兵败走，被汉护军高午突前刺杀述（《后汉书·吴汉列传》）。在处理匈奴问题上，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结合当时形势，并能从政治上考虑，作出正确的决策。藏宫以勇敢善战闻，屡立奇功。他见匈奴饥荒又瘟疫流行，上书主张联合与匈奴相邻少数民族军夹击匈奴。刘秀不同意，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是指仁德，刚是指残虐，施仁德则得道多助，残虐则众怨归之。所以说有德的君主，能以自己所乐于与人同乐；无德的君主，以所乐乐己身，与人同乐的其乐长久，只乐己身的不久而亡。不根据当前实际而好高骛远，将劳而无功；不做好高骛远之事能从当前实际出发，既安逸且终有所成。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所以说只以暴力广地的亡，广施仁德的强。享有自己所有的安，贪别人所有的凶。残暴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还要外征边外，那么，祸患不在外而在内。且匈奴尚强，而边报多失实。如果能以天下之半的兵力永除匈奴边患，我当然是赞成的。但现在非其时，不如息人。”刘秀主张“不如息人”，这是因历史给他的教训太深刻了。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立即想解决匈奴边患问题，兴大军深入，在于城被围几乎灭亡；为消灭异姓王，又往攻黥布，致被流矢所中，归来病重身亡。可见，兴兵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只恃力而肆意征伐将自招祸患。正由于刘秀笃志于学，熟悉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前人正确的经验，将之结合于实际运用，故少走弯路。前人错误的教训，他引以为戒，故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

2. 善忍而谋不外露

在世间上的所有动物之中，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是最复杂、其本

身又最是互相矛盾的。以刘秀为例，他为人是这么谨慎、厚道、公正，待人平易且开诚布公。但又不尽然，有时表现得城府甚深使人莫测其高深，即使与他经常相处共事的人也被其所惑。如他对哥哥刘演被杀，其外貌与内心大不一样，表面上是“向刘玄谢罪”，表示效忠，实则与刘玄之仇不共戴天；与人“谈笑如常”，内心则极其伤痛。刘秀在众人面前不敢显露他心里的悲痛，但当其独处时，饭也食不下，吞声悲泣，眼泪流得枕席都湿了。冯异发现其枕有泪痕，深体其哀情，加以宽慰，刘秀急止之说：“不要妄言。”（《后汉书·冯异传》）正因刘秀能忍人所不能忍，刘玄竟为其表现“效忠”所惑，仍然给予重任，派他到河北巡抚，他才能脱离刘玄控制以图天下。刘玄杀刘演，刘秀就与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忍痛与之周旋，他不报仇只因其力未足时机未到罢了，及到河北便将之作为根据地，与群雄争锋。初，刘秀派尚书令谢躬率六将攻割据河北的王郎，不能下，刘秀至，表面虽与之协力，实际想趁机铲除谢躬的势力。每见谢躬，就加以慰劳以安其心。谢躬勤于职事，刘秀常常称赞他说：“谢尚书确是能干的良吏。”谢躬得到刘秀的美誉，也就不疑刘秀会加害于他，这时，谢躬率兵数万驻于邺，这时，刘秀南击青犊，对躬说：“我追青犊贼于射犬，必破之。在山阳的尤来贼众必惊走，以你的威力击之必能胜。”躬说：“好。”及青犊破，尤来果北走，躬便派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邺，自率诸将军追击尤来。尤来无路可走，拼死反扑，其锋不可当，躬被打败，被杀数千人。当躬率兵离开邺时，刘秀立即派吴汉、岑彭等将袭其城，事先派辩士说陈康投降，陈康果同意，逮捕刘庆及谢躬的妻子，开门投降。及谢躬率败军归邺，不知康已叛变，只带数百轻骑先入城，被吴汉伏兵所杀，其众皆降。谢躬妻曾疑刘秀不利于谢躬的行动，常告诫躬说：“你与刘秀素难相处，今却信其好话，不加以防备，终将受其所制。”躬不听，终及于难。

三、御人妙术

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崛起，要壮大队伍以扩张势力，只有瓦解敌众使之投入自己的麾下。要达到这目的，就要招降纳叛。刘秀后来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人马最多力量最强者，正因其善于招降纳叛。他不只善于招降纳叛，且善于化敌人为臣属，这是因他有巧妙的御人术。正因其能御人，敌人乐为之用，人乐为用是能成大事的关键。

1. 推赤心于人腹中

人心向背决定胜负，刘秀率兵反莽，始终都重视争取人心，千方百计使人心归向，当时刘玄诸将，横行暴虐，到处抢掠，百姓失望，无所依赖。只有刘秀所部纪律较好，他到河北后，派官吏到各郡县，处理冤屈案件，解决鳏寡和穷困人民的困难，对犯罪的亡命之徒自投案的减轻或免除其罪。与刘玄诸将比较，更见刘秀与众不同，成为老百姓希望所在，故积极支持和拥护。他安定河北后，派冯异讨伐赤眉军时，亲送到河南，告诫异说：“三辅地区遭王莽、刘玄之乱，加上赤眉的酷虐，百姓涂炭，无所依诉。今前往征伐，主要不在于略地屠城，而在使人民安定。诸将不担心不善战，但恐其虏掠。你本善于御使吏士，要严明纪律，不要使百姓受苦。”冯异顿首受命，引兵

西向，所至皆布威信，不扰人民，终于平定赤眉，威行关中。后有人上书说异专制关中，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刘秀便以书送给冯异看，冯异惊恐，上书谢罪。刘秀复诏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谦何疑，而有惊意？”

刘秀就是这样安抚人民，以争取民心；对将领开诚和信任，以争取将心。

对争取来自敌营的将心军心归附，更显得刘秀御人的艺术。刘秀军在与绿林、赤眉、铜马等农民军作战时，不是屠杀以灭其身，而是降服其心。刘秀到河北邯郸时，汉景帝八代孙刘林进见，说赤眉可破。刘秀问其计，他答道：“黄河水从列入县北沉，如决河水灌之，其百万之众皆可使之为鱼了。”刘秀对用如此毒计消灭赤眉，不以为然。因为消灭赤眉，无益于壮大己军。刘秀降铜马军后，即采取安抚之法。刘秀打败铜马，其众归降，封其诸将为列侯。但降者心有疑虑，恐刘秀散其众，刘秀知其意便使他们各回各营统领其部属，并轻骑冒险到各营巡视安抚其众，降者因之心安，说：“肖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我们哪能不乐于效死！”由是皆服。铜马军的归降，使刘秀队伍扩大到数十万人，人们称刘秀为“铜马帝”。降服铜马军，使刘秀成为群雄中最强者。

2. 图天下矫情任算

“矫情任算”，意是说控制感情按照理智来谋事。刘秀决策行事都能从图天下这个大局出发，凡有利于其图天下，即使是对不共戴天的仇人或对背叛自己的人，也不因深恨他们而感情用事，甚至违背自己的感情，宽恕仇人和叛己者，力争其为己效命。也因此，刘秀能团结更多的人助己打天下。刘秀的“矫情任算”，确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一般人做不到而刘秀做到了，这便是刘秀超人之处。

朱鲔始终反对刘秀及其哥哥伯升，是他两兄弟的死对头。朱鲔对汉室是忠心耿耿的，当刘玄封宗室及有功的为王，朱鲔也被封为胶东王，朱鲔却反对，坚持要遵守高祖约，“非刘氏不王”。他要遵守高祖的，自己得到的王位也不要，坚决辞掉，可见朱鲔是个忠汉派。但他的忠也只忠于刘玄，他是支持刘玄为帝的主要人物之一。伯升、刘秀举事后与新市、平林军联合作战，因屡胜莽军，众至十余万，为统一指挥，便决定利用汉室作为号召。因此诸将开会议立谁为皇帝，下江军头头王常和南阳士大夫都主张立伯升，但新市、平林诸将一向胡为，因伯升威明恐受其所制，而刘玄为人懦弱易于操纵，都反对立伯升而支持刘玄。他们议立刘玄后，才派人召伯升来，宣布要立刘玄为帝。伯升也想为帝，但不好说，便认为现立帝还不是时机，说：“今赤眉在青、徐地区拥众数十万，如知我们立宗室，恐赤眉亦有所立，这就引起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必互相削弱，非破莽良策。且首举义兵自立的，很少能成事，陈胜、项羽失败便是例子。如赤眉所立的是贤君，我们前往从之；如赤眉无所立，待破莽降赤眉后，才立帝也不为晚。”朱鲔、张卬坚决反对，张卬拔剑击他说：“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新市、平林诸将皆支持立刘玄。刘玄既即帝位，伯升的支持者大失望，不服刘玄，因此，两派逐渐矛盾加深。由于伯升军功卓著，威望日隆，刘玄君臣不自安，便谋杀伯升。谋杀伯升，朱鲔是其中主谋之一。伯升部将刘稷，数陷阵溃围，勇冠三军，闻立刘玄怒说：“起兵图大事是伯升兄弟，刘玄曾干什么？”刘

玄君臣知道了，心甚忌之，便派兵逮捕刘稷，将斩之，怕升力争，朱鲔便劝刘玄逮捕伯升，即日害之（《后汉书·伯升列传》）。伯升被杀后，因刘秀善于韬晦之计，刘玄派刘秀北伐，而朱鲔却劝刘玄不要让刘秀北伐，主张控制刘秀，以免出事。朱鲔对刘秀及其兄伯升如此。

这种势不两立的不共戴天之仇，是不能宽恕的。但刘秀在攻洛阳时，派人劝降并接受其投降。对于来降仇敌，有的人是今日不杀，明日必借故杀之，以永除后患。而刘秀却计不出此，朱鲔来降后，不只任他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还升为少府，传封累世。

刘秀不只宽恕朱鲔，对刘玄失败后也表示宽大和关怀，刘玄是杀其兄伯升的罪魁祸首。本来，伯升和刘玄是堂兄弟，而刘玄本是懦弱无能之辈，也国此被新市、平林诸将认为易于操纵而立为帝。但他为人虽懦弱，但涉及权利问题时却表现得很凶狠，因恐伯升在其位下固，便下毒手将之谋害了。一般来说，刘秀对这“不共戴天”的仇人也是不能宽恕的，但是刘秀却宽恕了，且对他表示关怀，甚至加以保护。赤眉攻入长安，刘玄逃奔高陵，这时已即帝位的刘秀下诏说：“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儿流落，朕甚悯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如有人敢杀害，将以大逆不道论处。”攻入长安的是赤眉，刘玄奔逃如被杀，对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刘秀既不负责任，又可借刀而手之，这本是快意事。可是，刘秀不仅公开下诏书表示对刘玄的怜悯，且特封他为王，还郑重宣布：“如有人敢杀害，将以大逆不道论处。”对于仇人而如此关怀，显然是违背常情之事。刘秀之所以如此，也显然是“矫情任算”，出于其图天下的一种策略。刘玄虽败，还有其大批将士，如何对待这些人是一件大事，如能争取他们归降，将可不战而胜，可以壮大刘秀的队伍。而刘玄诸将有不少是谋杀伯升的参预者，他们显然对刘秀心有恐惧的，害怕刘秀会报仇，处置他们。而刘秀对于杀其兄伯升的罪魁祸首刘玄竟如此宽恕关怀，对于其他也就能不计私怨了。后来，新平、平林诸将率众投降，始知刘秀宽恕关怀刘玄的高明之处。

刘秀烧叛书、谤书也是他“矫情任算”的一种具体表现。刘秀军攻破邯郸，缴获不少文书，其中得其部属与王郎私通和毁谤的达数千件之多，刘秀连看都不看，召集诸将军，当众焚烧，说：“令反侧子自安。”缴获这些书，那些私通王郎的人怕被处置，惊恐不安，必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把它烧了，这些人就安心了。因那时河北刚定，刘秀刚脱离更始政权，势力还不够强大，如清理处置内好，搞得不好，必株连扩大，将严重削弱自己的势力。何况在那群雄互相讨伐的时代，在群雄麾下的臣属，大多是谁势大就依靠谁，所以反复的人多，对这种人都加以清除或杀害，剩下少数忠贞的人也难以打天下。

因此，在那个时代，谁能壮大自己的队伍，就看他能否善于招降纳叛。刘秀正是这方面的能手，而他成为能手，也是因其人能“矫情任算”，宽恕人。刘秀烧叛书、谤书宽恕人，因而使人感激，从离心变为一心。所以说，这也是刘秀图天下的一种巧妙手段之一。

刘秀的“矫情任算”，不只行之有效，对后世也有影响，行之也取得同样的效果。曹操在争天下中也是“矫情任算”，其所为与刘秀一样，显然是向刘秀学来的。如张绣投降曹操，后不满曹操所为便叛变，在叛乱中，曹操长子、侄儿、爱将被杀，他险些遭难。这“涪水之难”，曹操终身难忘。但张绣听贾翊策再归降曹操时，曹操因这时与袁绍对峙，如不接受张绣投降，张绣将投降袁绍，将使本已强大的袁绍其势更大，对于自己必大不利，终于

控制自己对张绣仇恨的情感，从理智出发，也就是为图天下的大局计，接受张绣投降，并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以固其心。曹操“矫情任算”接纳张绣再降，对孤立和打败袁绍起了一定的作用。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掉。他之所以如此，也是跟刘秀出于同样的想法和目的。

四、未逢敌手

刘秀取天下比其高祖刘邦较轻易。楚汉相争，项羽是力取，刘邦是智敌，彼此旗鼓相当，各有长短。而刘、项的所长都超人。项羽是屡战屡胜，刘邦虽以智取胜，但经屡战屡败、九死一生才在坟下打败项羽。刘秀取天下没有其高祖艰苦，是因时下群雄的才干与之相差甚远，且大多是昏庸之辈，故刘秀不逢敌手。

1. 割据者乡不成器

由于王莽失败，天下乱糟糟，人民困苦不堪，加上被汉受命于天的迷信所惑，人心思汉。当时涌现的绿林好汉，不敢自树一帜以图天下，而是打着汉室招牌，有本事的不立，却立听话的或小孩子使能放肆胡来；而另一些割据者也不具备成大器的才干。这些人以失败告终是不足为奇的。

刘玄是最早被农民军拥立为帝的人。他是刘秀的族兄，他的弟弟被人杀，结纳侠客以报仇，后因客犯法，他逃入平林避难，初任安集掾，负责安集军众，因其姓刘，又懦弱，新市、平林诸将认为他可以利用，便拥立为帝，改元为更始。他本无图天下的壮志，一下被拥上皇帝宝座，惊得冷汗直流，连话也说不出。更始政权派军分别进攻洛阳、武关、三辅震动。是时海内豪杰纷纷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认可。长安中自发起兵攻未央宫，王莽被杀。当时，天下归心更始，形势大好，取天下并非难事。但刘玄到长安后，他唯一关心的是财和色。当诸将来朝时他忙问：“虏掠得财宝多少？”说这话只有出自强盗之口。这时站在他左右的侍臣都是宫中旧吏，惊得注目相看。当时长安的宫殿，除未央宫被烧毁外，其余宫馆保存完好，宫女数千，备列后庭。刘玄被美色迷住，日夜作乐欢饮。刘玄纳赵萌之女为夫人，深力宠爱，便委政于赵萌，自己躲在后庭饮酒作乐。群臣欲奏事，往往因醉不能见，非要听奏，就叫侍中坐在帷内回话，诸将知不是刘玄的声音，出外都埋怨说：“成败未可知，为何荒淫放纵如此！”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侍臣奏事，因扫其兴，说：“帝方与我饮酒，却偏在这时来奏事！”起来，将书案击破。赵萌专权，作威作福，乱往私人。侍臣有人说赵萌放纵胡为，刘玄不只不听，却拔剑砍之，自是无人再敢说话。军师将军李淑上书进谏，刘玄怒，将他逮捕送进监狱。从此，上下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役置牧守。后更始政权内讧，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赤眉入关，王匡等迎降。刘玄逃走，后终被杀（《后汉书·刘玄列传》）。

赤眉所立的刘盆子，也是汉宗室之后。因赤眉军日益扩大，在西向攻长安时，有人说樊崇：“更始荒乱，政令不行，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各为群贼，不可持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

不服？”樊崇同意，便立刘盆子为帝。这时，盆子才十五岁，见众人朝拜，恐惧得哭了。攻入长安，盆子居长乐宫，诸将争功，互相毆杀。盆子恐惧，日夜啼哭。后赤眉军因城中粮尽，出外大掠，收载宫中珍宝，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后因严寒，士多冻死，又复回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赤眉军乃东归，被刘秀军屡败，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罪，并率十余万人投降。明晨，刘秀在洛水边大陈列兵马，令盆子君臣列队观看。刘秀对盆子说：“自知当死否？”盆子答道：“罪当死，幸上怜而赦免。”刘秀笑说：“这儿狡黠？”又对崇等说：“是否后悔投降？朕今让你们回营再带兵。鸣鼓直攻，一决胜负，而不欲强你们降服。”徐宣等叩头说：“诚心投降，决不后悔。”刘秀称赞他们有“三善”：“攻破城他遍天下，原配妻子都无改易，是一善；立宗室为君，是二善；别人立君，迫急皆杀其君持头投降，自以为功，而你们不杀盆子将他交给朕，是三善。”乃让赤眉头领与其妻子居洛阳，每户赐住宅一所，田二顷（《后汉书·刘盆子列传》）。

至于隗嚣、公孙述，都是好谋无断、犹豫不决之辈。隗嚣安于割据，缺乏争天下之志；公孙述敢于称帝，却无英主之略。隗嚣虽表示拥汉，实割据一方。初与汉反对公孙述，后又叛汉归述，但对述和对汉一样都不一心，想左右逢源以取利。及更始败，士大夫多投奔归嚣，其中多文学之士，善诗文，但非经世治国之才，嚣谦恭相待，寻章摘句甚为投机。其中军师方望是个智谋之士，因见隗嚣无大志，以书辞谢而去。更始政乱，四方瓦解，隗嚣不乘危进兵关中以争天下，却想独守一隅以求安乐，其败固宜（《后汉书·隗嚣列传》）。公孙述据蜀自立为皇帝后，既不急于图天下，而忙于修饰边幅，摆设排场出入法驾，銮旗旄骑，盛陈陛戟。对此，马援讥他是“木偶人形”，认为他“不足以留天下士”。述性苛细，察于小事，缺少大略，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又立两子为王，各赐数县为食邑。臣下多谏，认为成败未可知，战士拼死于外，却立皇子，表明没有大志，伤透战士的心。述不听，述所信的皆其族人。由此大臣皆怨，上下离心。公孙述既无力出外争锋，迄刘秀降服铜马、新市、平林、赤眉等农民军，其力已无敌于天下，公孙述之亡是必然的了。及吴汉率仅大军入蜀，公孙述末日也到了（《后汉书·公孙述列传》）。

2. 人心归光武一统

显然，刘秀才干远远超过时下群雄。而以上所述的其人风格、御人妙术，是其才干的具体表现。而刘秀之所以得天下，关键在于得人心，尤其是得将士之心，使上下一心，共同患难，出力献智拼死对敌。如来歙，与刘秀同乡，其父娶刘秀祖姑，刘秀甚亲敬之。刘秀称帝，歙任中郎将，转战多年，平定羌陇，战功卓著。公元35年（光武十一年），翕率虎牙将军蓄延等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等于河池、下辨，破城后乘胜前进。公孙述大惊，便派刺客刺来歙，中歙要害。歙急召蓄延嘱以后事。延见歙，伏地痛哭，不能仰视。歙叱延说：“虎牙何敢然！我被刺，无以报国，叫你嘱以事，竟学女儿哭泣！”延收泪强起，受歙所诫。歙向刘秀上书说：“臣在深夜被敌派刺客所刺，刺中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不称所职治理国家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写好书，投笔抽刃气绝而死（《后汉书·来歙列传》）。歙信义待人，尽忠于国，临死仍推荐贤以代，其对刘秀忠心如此！邓禹是南阳新野人，年十三，会诵诗，就学于长安。这时，刘秀亦来游学，二人一见如

故。及汉兵起，更始立，虽有多人推荐，但禹不肯从，及知刘秀占有河北，立即北渡投其麾下。刘秀见了邓禹很高兴，对他说：“我有权封官，你远来，愿当官吗？”禹说，“不愿。”刘秀说：“不愿当官，你想干什么？”禹说：“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微力，垂功名于史册。”刘秀听了微笑，因留禹夜谈。禹说：“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动以万数。更始既不理事，诸将不尊主安民，只贪财物，争用威力，以求朝夕之乐，致使西方分崩离析。明公虽欲辅助，也无能为力。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公能如此天下可定。”刘秀听其计很高兴，令左右称禹为“邓将军”，常与止宿一起，商定计议。在与王郎军战斗中，屡立战功。及赤眉入关，王匡等莫能当，刘秀料赤眉必破长安，以禹深沉有大略，便授以西讨之任，以乘机并关中，乃分麾下精兵二万人，由邓禹率领西向。邓禹连胜，逐定河东。刘秀这时也即帝位，便派使者任邓禹为大司徒。诏书说他“筹谋帷幄，决胜千里。”并引孔子的话：“自吾有回门人日亲。”将邓禹比作孔子的首席门生颜回，意是说自从有了邓禹，他的事业日益发展，赞扬邓禹“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这时，邓禹才二十四岁（《后汉书·邓禹列传》）。寇恂初为上谷郡功曹，甚为太守耿况所重。王莽败，更始立，寇恂随耿况归更始。寇恂因刘秀尊贤下士，劝耿况樊附之。数与邓禹谋议，禹奇其才，便与交结。刘秀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鲋等盛兵据洛阳，欲北怔恐朱鲋起袭击，乃物色人守河内。邓禹推荐寇恂说：“昔高祖任肖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志山东，终成大业。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可胜此任。”刘秀便任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刘秀对寇恂说：“河内富裕，我将因是而志。昔高祖留肖何守关中，我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于是，刘秀卒兵北怔。寇恂果不负刘秀所托，他伐淇园竹，制矢百万余，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供给北征之军。朱鲋派讨难将军苏茂率兵三万余人渡河攻温，军吏以敌势大，主张待各县兵到才出击，寇恂说：“温，上谷郡的屏障，失温则郡不可守。”就毅然出兵，适冯异及各县率兵到，大破苏茂军，死敌数千，生俘万余人，自是洛阳震恐，城门紧闭。刘秀传闻朱鲋破河内，内心甚忧，忽而捷报到，大喜说：“我知寇恂可任！”诸将军祝贺，刘秀因上尊号，于是即位（《后汉书·寇恂列传》）。贾复从刘秀征伐，未尝败北，数次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伤。他从击青犊军于射犬，大战到中午，敌阵坚攻不入。刘秀传召复说：“将士皆饥，吃饭再战。”复说：“先破敌，再吃饭。”于是举旗先上，所向披靡，敌乃败走。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遍体创伤，性命危急，可是病好后，又急追上刘秀于蓟，又英勇参战，刘秀即位，任复为执金吾，封冠军侯（《后汉书·贾复列传》）。此外，冯异、吴汉、耿弇、藏宫等大将，都为刘秀拼死沙场，战功显赫。刘秀得将心如此，群雄岂其敌手！

第四章 三国归晋

东汉王朝自第四代和帝起开始腐化，迄桓、灵二帝更甚，外戚、宦官轮流擅权横行，人民苦不堪言。灵帝掠夺民财嫌少，公开标价卖官，上行下效，贪官污吏疯狂吸吮民脂民膏，人民活不下去，终于激起黄中大起义。官僚、地主为保护其既得利益，以“勤王”为名纷纷起兵镇压。在农民军血泊里成长起来的各个军事集团，各据一方，进行割据，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公元190年至199年（汉献帝初平元年到建安五年），群雄逐鹿中原，混战不休。混战结果，曹操称雄北方。这时，一向寄于人下的刘备得荆州豪杰归心，代替刘表父子而成为荆州新兴势力的代表，孙权也继承父兄之业据有江东。后经赤壁一战，孙、刘联盟打败曹操，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从此，由群雄混战进入三国鼎立时期，三国争战长达近半个世纪。可是，三国都先后灭亡，天下终于归晋。

在这一章里，主要探讨的是：东汉末年逐鹿群雄大多消失，为何只有魏、蜀、吴三国能长期鼎立？三国三杰曹操、刘备、孙权为何都不能统一天下，而由一个只具有常人能力的司马炎独得其鹿呢？

一、群雄逐鹿

黄巾大起义时，各州郡起兵镇压，豪强地主聚兵自保，形成了大小无数武装势力。在群雄逐鹿中原中，大多被兼并，如刘虞、公孙瓒、韩馥、陶谦等。这些人虽也据有一方，但因或无雄心壮志，或无智谋，他们失败在人们意料之中，毋庸赘述。而曾掌握天下大权如董卓，勇冠三军如吕布，名重一时如袁绍、刘表，英勇善战如孙坚、孙策父子，也是先后消失。这些人之亡，有其历史教训，仍需一评。

1. 暴与无谋必败亡

董卓与吕布曾显赫一时，他俩誓为父子，一个靠父势，一个凭子勇，以为无敌于天下。但董卓终因残暴而亡，吕布无谋而败。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性粗猛有谋，青年时游羌中，与羌族豪强交结。他膂力过人，善左右张射，羌人畏服。后参加镇压羌族叛变，屡立战功，任并州刺史，河东大守。在征伐韩遂、马腾的战斗中有功，被任为前将军。朝廷曾征召入朝，以上卒挽留为辞。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董卓终等到了千古难逢的机遇，这是连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与宦官为争权夺利而拼死活，谁得胜谁执政，这在东汉中后期已是一种经常而特殊的现象。南阳人何进因妹妹被灵帝立为皇后，虽然他是个草包也得任为大将军。灵帝死，因立皇子问题，何进与管禁军的宦官蹇硕斗争白热化。何进当然要立他妹妹何皇后生的儿子辩，蹇硕则受灵帝临死前所托要立王贵人生的儿子协。结果，何进得胜，将蹇硕杀了。在何进手下任司隶校尉的袁绍建议杀尽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便私叫董卓等将兵入朝，以胁太后。何进当时大权在手，要除宦官是轻而易举的事。主簿陈琳就曾谏说：“将军军权在握，除宦官就好像鼓炉火以烧毛发，如召外兵聚会，强者为雄，正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能起祸乱。”后果如陈

琳所说。何进召董卓等外兵入朝，还要他们公开上书“以请君侧”为名，要杀中常侍张让等。事情被张让等所知，于是，张让等宦官联合起来，拼死反扑，何进入宫向何太后要求杀尽诸常侍时，被张让等所杀。袁绍等又引兵捕杀宦官，不论长幼都杀个精光。东汉外戚，宦官的祸患就此两清。这时，卓始进兵洛阳，掌握军政大权，任相国，兼太尉。因陈留王是其同族董太后所生，便废少帝，立陈留王为帝，是为献帝。群臣畏其威，大多敢怒不敢言。

董卓为何一入朝便能慑住群臣？他有其诡计：一是虚张声势。董卓带来的兵，步骑合计只不过三千，他自知兵少，恐不能吓人，在他驻兵于外时，夜间派军潜出营外，明日一早就大张旗鼓回来，扬言西兵又到，如此四五日重演一次，人们误以为西凉兵多，被其军威所慑。当时袁绍还有一定的军队，有人劝其攻卓，袁绍恐力不敌，不敢动。原由何进所领的部队也因卓“势大”而归其统领。卓又使人诱吕布杀其主将、同他一起被召入京的丁原而并其众。于是，兵权全归董卓，故能为所欲为。二是拉拢名士。如蔡邕是天下名士，声望很高，因被宦官迫害，逃避他乡，不愿为官。董卓派人寻查，终于找到。蔡邕不应召，卓威胁说要“族之”。蔡邕被逼只好应召。他一连给蔡邕升了三次官。他还为因党锢之祸而被杀的陈蕃、窦武等党人平叛，并请一些“党人”出来做官。对于有名望的官员，也分别给予高位或提拔，而他自己的辛信，并不任显职，只做将校而已。董卓如此用人，确能迷惑人于一时，蔡邕在他被杀后还表示伤感之情。董卓之所以如此，为显示他用人唯贤，以收买人心，他不让亲信任显职，而使他们紧握军权，这是因他懂军权的重要，只要军权在就可任其所为。

当时，董卓已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如果他能整顿朝纲，施行仁政，纠正桓、灵以来的腐败现象，以苏民困，其统治是可以巩固的。但董卓这个唯武力论的军阀，以为凭武力便可统治天下，为取得其将士支持，纵容他们抢劫掠夺，放火杀人，致失尽人心，时洛阳富户甚多，家家积满金帛财产，董卓士卒穿家入户，任意搜劫，奸淫妇女，使人人朝不保夕。卓曾派军到阳城，适逢村民在“春社”节日迎神赛会，尽皆杀之，掳掠妇女和财物载在车上，悬人头于车下，扬言杀贼大胜，欢呼返京。对董卓横行，激起朝野愤恨，于是，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被迫迁都，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到长安，步骑践踏，互相拖押，饥饿寇掠交加，积尸满路。还发掘帝陵、官民坟墓，取其主宝。临行，放火烧光洛阳，二百里路无人烟。董卓到长安后，别筑郿坞，高厚七丈，称“万岁坞”，仓库屯积三十年粮食，藏金二三十万斤，银八九万斤，金玉、彩帛、珠宝堆积如山。董卓自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养老。”这时，天下人恨不得食其肉；事不成，必死，何能“养老”，其愚如此！董卓更不料到其养子吕布已暗与司徒王允谋杀他。吕布常侍卫董卓，因小事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由是内心怨恨，后布与卓侍婢私通，布更不自安。王允知其情，便说布谋杀卓。董卓入朝，被王允伏刺客所伤，卓回头大呼：“吕布何在？”布应声上前说：“有诏讨贼臣。”持矛刺倒卓，斩之（《后汉书·董卓传》）。吕布既能杀其主张丁原，又何不能杀假父董卓，而董卓以为有虎将吕布保卫，将可万全，其愚又如此！这个穷凶恶棍，就这样被其义子宰了。

吕布骁勇善战，御良马赤兔，能驰城飞堞，时人有说：“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但其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王允使吕布杀董卓后，却不赦凉州人。这时，董卓将李傕、郭汜等都在外，因不得赦便收集卓将兵拼死攻

入长安，吕布战败出逃。吕布曾先后投奔袁术、张杨、袁绍等，因不被信任，便入主袁州，后曹操来争，将之打败。吕布投奔刘备。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持于淮上。袁术送米二十万斛给吕布，诱其攻刘备。布为利所动，忘了刘备接纳之情，竟起兵袭下邳，备败走。布夺得徐州后，又与袁术反目相攻。后曹操与刘备攻布。谋士陈宫对布说：“曹公远来，不能持久。将军如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如操向将军，宫引兵攻其背；如操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下过一月，操军食尽，击之可破。”吕布赞同。吕布告知其妻，其妻说：“过去曹公待陈公如赤子，陈公犹舍之而归我。今将军厚待陈宫不如曹操，今却委以全城，弃妻子而孤军远出，如一旦有变，妾哪得为将军的妻子？”布便保城不出。操挥军围城，堵塞沂、泗水以灌之，长达三月之久，使布军上下离心，终于被迫出降。布见操，大言不惭他说：“今后天下定了！”操反问：“为何这样说？”布说：“明公所忧的只不过布一人而已，今布已服了。如令布将骑兵，明公将步兵，天下就可定了。”他见刘备也在座，说：“玄德，你为坐上客，我是降虏，绳缚我紧，你为何不为我说句好话呢？”操笑说：“缚虎不得不紧。”便叫人松布缚。刘备说：“不可。明公不见吕布杀丁原、董卓的事吗？”操便令人缢杀之（《后汉书·吕布传》）。吕布之死，是因他无谋，如听陈宫的话，也许不至于此。

2. 好谋无决失战机

袁绍与刘表都长得一表人才，很有威仪。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虎踞冀州，兵众粮多，士多归附；刘表是皇室宗亲，占有用武之国，威镇九州，是当时逐鹿中原的两个很有势力的军事集团。但后来袁绍被弱于他的曹操打败，而刘表也无所作为。陈寿为他俩在《三国志》作的传中指出，二人的弱点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由于他俩的好谋无决，屡次失去大好战机，使曹操坐大，致被动挨打，所建立的割据政权终于败亡。

袁绍身边，开始确是人才济济，不少智谋之士向他提出图天下的良策，但不被他所采纳。沮授曾建议：西迎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将从其计，后听郭图等说：“汉室将亡，兴之实难，今迎天子，反受其制，不是善计。”沮授说：“如下早定，必有智者先行。权不失机，功不厌速，要早图之。”袁绍终不听。后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收服中地，黄河以南皆归附。这时袁绍后悔已迟了。曹操征刘备时，田丰说绍起兵袭许昌，绍却因幼子有病，不愿出征。田丰以杖击地，叹气说：“得此难遇的战机，却以婴儿有病而失掉，太可惜了！”

袁绍当决而不决，不当决而自决，官渡之败，实由此所致。袁绍恃有众数十万，骄心转盛，议欲南征。田丰谏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敌。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用奇兵乘敌虚出击，以扰河南，敌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敌已困，不过二年，可坐而胜。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如不得志，悔之无及。”绍不听，田丰恳切苦谏，袁绍大怒，将他关进监狱。于是，率大军南征，曹操率军于官渡相拒。沮授分析敌我形势说：“我军数众而敌军精锐，敌粮少而我粮多，故敌利急战，我利缓战，宜持久战。”绍不从，便进军逼近官渡与操会战。操坚守。许攸建议派

奇兵袭许昌，首尾相攻，操可擒。绍又不能用其计。因许攸家人犯法，攸恐累及便投操，使袭乌巢烧其军粮。绍军无粮大乱，操军勇猛出击，袁军大溃，袁绍带去十万大军只剩下八百骑兵跟他逃回，绍军既败。有人对关在狱中的田丰说：“你有预见之明，必被重用。”田丰说：“如我军胜，必能救我；今军败，我必死。”绍回冀州，对左右说：“我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便把田丰杀了。袁绍外表宽雅，优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田丰之被杀，便是他“内多忌害”的表现。不久，袁绍病死，后冀州也被曹操攻破。

在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不是你灭我，便是我灭你，要想不灭人又不被人所灭是不可能的。刘表居用武之国，四可出击，战机有的是，而他既不图进展，却企图左右逢源，以独保其存，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派使求助，表答应却不派兵，但亦不助操，想保持中立，以观天下变。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对表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欲有所为，要乘其弊；如果不是这样，要择所从。将军想以十万之众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以操公的英明必将胜绍，之后举兵向江汉，将军恐不能抵抗。为将军计，不如举州附曹公，曹公必德将军，长享福贵，传之后嗣，这是万全之策。”表狐疑不决。

刘表遇事就是这样犹豫不决，虽有战机，因其好谋无决也失掉。且因其人多狐疑，故不能任人信人，也就不易听人计。刘备来投，表厚待之，但不重用。曹操征柳城，刘备说表使袭许都，表不听。及曹操胜利回师，刘表后悔，对备说：“不用君言，致失去这大好机会。”刘备说：“今天下分裂，互相征伐，战机常有，不会只是这一次。如果能抓住以后出现的战机，是不必后悔的。”对于刘表这种人来说，他的最大愿望是据江汉以自保，即使以后有战机，他也是同样失去的。曹操大军下江南讨伐时，适表病死，其子刘琮无力抗拒，便率众投降。

袁绍、刘表的致命伤是“好谋无决”，这也是其两人的共同点。但两人也有阶不同，袁绍野心很大，有图天下之志，跟袁术一样也在做皇帝梦。不过，其人虎皮羊质，志大才疏，当然不是曹操的对手。刘表则没有袁绍那么大野心，即使有时也有所想，如后悔不袭许都，却没有胆量来实行。他最大的愿望只不过是荆州称王而已。这当然不现实，是一厢情愿。荆州这块肥肉，有不少人在觊觎，赤壁之战，曹、刘、孙终三分荆州。

3. 轻而无备终丧生

孙坚、孙策父子都有胆有识，英勇善战，是当时逐鹿中原的佼佼者。但都轻而无备，孙坚征荆州时，单马行岷山，被箭射死；孙策单骑外出，被刺客所杀。

孙坚青年时便显示他胆识超人。他十七岁，跟其父乘船到钱塘，海贼在前掠取客商的财物，船不敢进，坚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划，如分派士卒击贼状。贼望见，以为是官兵来捕，弃物财逃窜。坚从后追，斩一贼头级，其父大惊，由是闻名。后以镇压黄巾有功，任长沙大守。他随司空张温镇压边章、韩遂等叛乱，张温征召董卓，卓迟迟才来，温责卓，卓语言不顺，孙坚建议以“不听军令”斩之，温不听。后卓擅朝政，横恣京城，坚叹气说：“张公如听我的话，朝廷无今日之难。”诸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孙坚亦举兵。坚军与卓军于阳人会战，大破之，斩其都督华雄。卓畏坚勇猛，派使来求和亲，

坚拒绝说：“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彼三族，悬其头示四海，我死不瞑目，哪能跟他和辛！”孙坚入洛阳，分兵出函谷关，以截卓后，卓对其诸将说：“关东军数败，皆害怕，无能为，只有孙坚，诸将要小心对付。”后孙坚攻荆州，刘表派将黄祖迎战，坚击破之。孙坚率军渡汉水围襄阳，只身骑马行于岷山，被黄祖军士所射。这年坚才三十七岁（《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孙坚死后，其所部归袁术，孙坚长子也在策军中。术奇其才，将坚所部归策统领。术常叹说：“使木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策一骑士有罪，逃入术营，藏于马棚，策指使人人内斩之，才向术道谢。由是，军中益畏惧。策虽为术建战功，但术用其心腹，不重用策，策知留此无用，便说术愿往平定江东。这时策只有兵千余，马数十匹，但宾客愿从者有数百人。到历阳，已有众五六千人。策渡江战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策终于据有江东。策时年少，人们称为孙郎。初，百姓听说孙郎至，皆失魂魄，及至，见其军纪严明，一无所犯，百姓大喜，争以牛酒劳军。孙策为人，美姿颜，好说笑话，性格豁达，能纳人谏，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莫下尽心，乐于效死。曹操知孙策并有江东，惊呼：“狮儿难与争锋”。这时，袁绍方强，操便派使结纳孙策，以弟女配策小弟孙匡，又为儿子娶孙策堂兄孙贲女为妻。

但是，孙策不因此附操。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秘密调练兵马，部署诸将阴欲袭击许都，以迎汉献帝。其谋未发，竟为原吴郡太守许贡宾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儿与其宾客亡匿江边。策单骑与之相遇便为所害。策死时只有二十六岁（《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以孙坚、孙策父子之勇猛及其才干，如其不死，与群雄争天下，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如孙策袭许都之计实现，曹操将前后受敌其势必危，曹操将不能打败袁绍而在北方称难，有可能灭亡，这样，三国历史将重写。可是孙坚父子自恃其勇，经常单骑外出，以致受害。在敌我激烈斗争中，四面多敌，稍有疏忽，将受其祸。孙坚父子之死，正因其轻而无备。孙策之死，早为智者所预料。当曹军听说策将渡江北袭许都，其众皆惊，郭嘉却料之说：“策新并江东，所杀的都是英豪雄杰，皆能得人乐为效死的人。而孙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一人独行于中原，如果刺客伏起，一人之敌罢了。以我料之，孙策必死于刺客之手。”

二、三国鼎立

魏、蜀、吴三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而三国中任何一国都不能完成其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是因在决策、用人等方面各有优劣之故。其好处使三国势均力敌，谁都难消灭谁，故能长期相持；其坏处，或使其力不足，或使他从其顶峰上跌落下来，或使其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会。

1. 决策略各有长短

在三国三雄中，曹操的雄才大略在刘备、孙权之上。陈寿所写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赞他“明略最优”，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曹魏的死对头诸葛亮也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见诸葛亮《后出师表》）可见，“曹操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鲁迅话）。

曹操父亲曹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家极富。他虽为宦官之孙，但在宦官与外戚斗争中，他却站在外戚一边。他任济南相时，敢于与权贵斗争，政绩卓著。及董卓擅权，拟任他为骁骑校尉，欲与他议事，他便变易姓名逃归，散家财，兴义兵以讨卓。各州郡起兵讨董卓，袁绍被推为盟主，曹操任奋武将军。董卓徒献帝到长安，各路讨卓军不敢进攻，操虽以大义喻之，却不听从。卓败亡，群雄逐鹿中原。操参与镇压黄巾军战斗中，迫降青州黄巾军三十万，编成“青州兵”，军力得到扩充，便以兖州为根据地与群雄角逐。公元196年（建安元年），迎献帝于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破袁术、杀吕布、败刘备，接着在官渡大破袁绍，进而远征乌桓，杀蹋顿单于，统一北方。

在与袁绍的较量中，充分显示曹操的雄才大略。当操与绍起兵讨卓时，绍问操：“如事不济将如何？”操反问绍：“足下意欲怎办？”绍说：“我北据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操说：“我任天下的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一以力敌，一以智取，二人争天下之法是如此不同。而结果是：袁绍虽人多势大，曹操却以智计胜之。袁绍兼并四州之地后，有众十余万，自以为比操强大，便起兵攻许都。操众将以为不可敌，操说：“袁绍这人，志大智小，色厉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其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为我供奉。”于是起兵迎击，后相持于官渡。

时操军粮将尽，拟回许都。操这人有大智，是因他能用众智，他对军国大事，往往能与众谋士议而后决之。这时，贾诩随征，操向他问计，贾诩答道：“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胜负未分，是因顾万全之故。如能抓住战机，就可取胜。”操还写信问荀彧，或回信说：“绍倾全军于官渡，是要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如不能胜，必为所乘。今粮食虽少，还没有楚、汉相持时那样困难，而刘、项都不肯退兵，因先退者将势屈。绍是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使之不得进，已经有半年了。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切不可失！”经与贾诩、荀彧计议，曹操认识到这是两军决胜败的大机，后退必被敌所乘，必将失败；待变寻机以战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取胜之法。于是，操乃罢退回许都之议，继续坚守以待变。在两军坚持中，必将有变，而变中出现的战机，彼此都可利用，问题是谁能抢先抓

住，这就决定于主帅的决断。袁绍的谋士许攸截获曹操向许都催粮书信，知操军粮将尽，建议绍袭许都，前后击之，本是致操军于死地之策，而好谋无断的袁绍却不能接受；后许攸投操，建议烧绍在乌巢之粮，多谋善断的曹操立即执行，绍军无粮大乱，便乘其乱而取之。显然，操之胜，在于他能集众智而善于决断。

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有些人败亡不是在其势弱时，却是在其势力达到高峰之日。操统一北方后，进军取荆州，这时其兵强马壮，粮食丰足，势力已越过当时在南方的刘孙军事集团，统一南方已在望。可是，曹操南征在孙、刘联盟抗击下以失败告终，这确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操得荆州后，是否直下江东，谋士贾翊、程昱与操有不同的意见。操将顺江东下时，贾翊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强大；如利用荆州的富饶，以休养士卒，安抚百姓，使其安居乐业，则可不劳而使江东稽服。”操不听从。对于孙权、刘备的关系，当时曹操及不少谋士也有错误的估计、总以为取荆州是孙权的国策，必不能容荆州新兴势力的代表刘备的存在，操取荆州，刘备奔东吴，他们都认为孙权必杀刘备。只有程昱跟他们的看法不同，他预料说：“孙权新即位，未为海内所服。曹公无敌天下，初得荆州，威震江东，孙权虽有谋，不能独当。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孙权必资助刘备，加强其力量，与之联盟以御我。这样形势将复杂化，难解势分。刘备得资助则能站得稳，就不可得而杀之。”曹操没有接纳程昱的论断，没有正确估计孙刘联盟的力量，认为取江东不在话下。曹操伐吴前，志满意得，他致孙权的书口气极其傲慢，说：“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骄军必败，曹操之败显然与其骄傲自满有关。对操之败，在《三国志》的《武帝纪》和《吴主传第二》里记载略有不同，前者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后者说，孙权派“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这里共同之处是，操军之退主要因“大疫”、“士卒饥疫”而“多死”、“死者大半”。据此，南北朝宋人裴松之肯定操军之退“实由疾疫”，这“天实为之”，不是曹操失算，认为贾翊反对操欲“顺江东下”是不当的。

后人对裴松之的看法，有肯定的。对此，笔者认为既不能笼统的肯定，也不能笼统的否定。在当时操南下统一天下的条件已成熟，从战略来说是对的，而操退军主要由于“大疫”，不然，不会因“初战不利”迅即溃败，胜败则难于预料，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曹操之失，在于对孙、刘联盟估计不正确致有轻敌思想，故不听贾翊之策。贾翊所论是万全之策，如操听其计，在取得荆州后，不急于向东吴进军，孙权可能不资助备，也不敢冒然向操进攻。而操先休养士卒，安抚百姓，待巩固其荆州的统治，可能如贾翊所料“则可不劳而使江东稽服”。也许有人说，在操坚守官渡时，贾翊曾批评操不能决胜是因“顾万全”所致，而在操势力比那时更强大，为何却提出“万全”之策呢？这是因时势不同。那时操、绍两军决战，不是你胜便是我败，而持久战对操不利，后退势必屈，只有寻机速决战，才能胜利，故操要图万全之策是不可能的。而在取荆州后，缓战以巩固自己胜利成果，并待敌的分化，再攻之就可稳操胜券，又何乐而不为。兵是危事，兵谋家往往是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战。由于操急于灭吴，迫使孙权资助刘备，而那时刘琮虽降，刘表长子刘琦与刘备协力，且荆州人心归备，这就削弱了操在荆州的力量。刘备与孙

权合力一起抗操，也就如程昱所预料的，“难解势分”。因之，曹操赤壁之败，也与其失策有关。赤壁之战三分之势开始出现。曹操也因此而第一次失去统一天下的良机。

赤壁之战后，刘备势力壮大，占荆州，取益州。这时，曹操征张耳，占有汉中。刘晔对操说：“今破汉中，蜀人震恐，乘胜进攻，蜀可传檄而定。如果延缓，诸葛亮明于治国，人民归附；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据险守要，则不可犯了。今不取，必为后忧。”曹操不从。司马懿也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取蜀，蜀人未附，现在却远出与吴争江陵，这是取蜀的大好机会。今扬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时不可违，机不可失。”曹操说：“人不知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于是，引军还，留夏侯渊守汉中（以上见《三国志·魏书》的《武帝纪》和程昱、贾翊、司马懿的传记）。其实，那时蜀中一日数十惊，人心震动。如操进军，有取蜀可能。蜀如破，吴孤立，有统一天下希望。而操“得陇不敢望蜀”，又一次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会。从此，孙、刘坐大，三国鼎立之势形成，终操之世，要消灭孙、刘是不可能的了。

至于西蜀刘备，在客观上虽元统一天下的条件，但刘备却有“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辅佐刘备的诸葛亮则“尽人谋以听天命”。刘备虽是汉室后代，到其出生时家道已没落，少年丧父，跟母亲卖鞋织席为生。黄巾起义，他举兵参加镇压活动。在军阀混战中，虽有万人敌关羽、张飞之助，但他颠沛流离，没有立锥之地。刘备曾一度归曹操，操对他评价很高，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后投刘表，不被重用，只让他屯兵于新野（今属河南）。此后长驻荆州达八年之久。正是在荆州时，他“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相助，向他献“隆中策”，其主要内容是：强调“人谋”的重要性，首先提出“天下三分”观点，主张联孙权以抗操，取荆、益二州，对曹魏进行“钳形”攻势。诸葛亮认为能如此，则有复兴汉室的希望。从赤壁之战到刘备西蜀称王，这个“千古奇策”得到顺利执行。而它得到执行，其基础是蜀、吴联盟。后来由于两国在荆州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蜀国想据有荆州这用武之地，吴国也想取之以保江东安全。这都是两国的国策所决定的，两国都不肯让步，其矛盾就不可调和了。曹操正是利用吴、蜀两国这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关羽北上围樊城时使东吴起兵袭其后，于是出现“关羽毁败，秭归蹉跎”，吴、蜀联盟遭到破坏，蜀国对曹魏的“钳形攻势”的企图也变成泡影了。荆州被袭、关羽被杀，刘备气得发昏了，也就不顾其严重后果，倾师伐吴，致有猇亭之失，从此蜀国从其顶峰跌落下来（见《三江志·蜀书》的《先主传》和《诸葛亮传》）。“隆中对策”的基础是蜀吴联盟，既然这个联盟被孙权、刘备先后将之彻底破坏了，它也失去了原有的威力，不成为“奇策”了。不久，刘备病逝于白帝城，诸葛亮受命托孤，竭其智力，与东吴重修旧盟，企图东山再起，可已是强弩之末，虽然六出祁山以北图中原，但由于司马懿坚守秦川，以老蜀兵，使诸葛亮劳而无功，只能如其所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

“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衅。趁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是鲁肃初见孙权时向他提出图天下的策略。因此策是两人“合榻对饮”时谈，史称“榻上策”。孙权是很赞赏的，奉为国策。史学界多说孙权志在偏安，其实孙权不是不想图天下以登皇位，事实上他是按照

鲁肃所说“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即袭取荆州后，“建号帝王”。当他称帝登坛时，高兴地对大臣们说：“鲁肃早已料到，可说是明于事势。”既然孙权也有图天下之志，为何在他据有东吴期间，没有诸葛亮那样六出祁山以北图中原的雄心壮志，而是“兵不妄动”，重于防守呢？这是因为在三国之中，魏国最强，而孙权较谨慎和现实，他自料以吴国之力是难征服魏国的。对于蜀国，地势险阻，而备得蜀人归附，取之也不易，何况蜀吴有如唇齿关系，因此袭取荆川后，终与蜀国重修旧盟。为了扩大吴国力量，伺机以图天下，一是袭取荆州，全据长江天堑；二是向东南地区拓展。230年，孙权派载一万兵士的船队到远海直州（今台湾）等地，在南方其所统区域城竟远到今天的海南岛，公元242年，孙权就派将军聂友率兵三万攻珠崖、儋耳。当然，吴兵远渡海洋，主要捕捉人口以加强兵力。此外，他还派入北到辽东，与公孙渊结好，以削弱曹魏在辽东的势力，但由于魏吴力量悬殊，孙权又谨慎不敢冒险，故终其一生，只能偏安一隅。

2. 用人才不相上下

曹、刘、孙都善于知人用人，都有贤才为之辅佐，这是魏、蜀、吴三国能鼎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曹操“知

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赞曹操“知人善察”，并非虚语。初，曹操因养祖父是宦官，而士人多恶宦官乱汉政，故不屑与之伍；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士人多归之。后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又以己的雄才大略统御海内为世人所服，才智之士纷纷来投，如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程昱、刘晔等都是当时第一流谋士，其中荀彧、郭嘉等都是从袁绍营来的。荀彧是颍川颍阴人，曾在颍川为小吏，因天下大乱，弃官归，对父老说：“颍川，四战之地，天下有变，常为兵燹之地，要急离开。”便带其宗族到冀州，这时，袁绍已占有冀州。他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谏及同乡辛评、郭图，都为袁绍聘任为官。而彧料绍终不能成大事，那时袁绍为各州郡起兵讨卓军的盟主，操为奋武将军，彧却弃绍投操，操一见大喜，称彧为“我的子房”。操任彧为司马，这时彧才二十九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郭嘉也是颍川人，团慕绍名前往拜见，会见后，郭嘉对其同乡辛评、郭图说：“智者要善择主，功名始可成。袁绍表面上学周公下士，实不知用人。他好谋无决，要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是难的。”于是，便离开。颍川戏志才是有智谋之士，曹操甚器重他。志才早死，曹操致书荀彧说，“自志才死后，身边无人可与计事，汝、颖多奇士，谁可继之？”彧推荐郭嘉，操召见，与论天下事，操甚为赞许，高兴他说：“使我成大业，必是此人。”郭嘉出亦欢喜他说：“操公真是我主。”上表任嘉为司空军祭酒，参与军机（《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正由于曹操广招人才，知人善用，故在其身边，人才济济，为之运筹献谋，故曹操才能芟除群雄，统一北方。如荀彧向曹献三大决策，即“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奉天子以令诸侯”、“坚守官渡以待变”，曹操才能建立坚固根据地兖州立于不败之地，并抓到天下权力，最终打败袁绍而称雄北方。郭嘉向操提出“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策略，使曹操不劳师动众而下冀州、

定辽东。但是，说操“知人善用”，不能说操用人全都正确，如司马懿也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对曹氏是有贡献的；因他有“狼顾相”而有所疑，由于司马懿善于韬晦之计，瞒过了曹氏三代而取得高度信任，终于夺取权力为晋代魏奠下了牢固的基础。曹氏用人的失误，即重用避马司，也是曹氏不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备明于知人，虚心下士，忠贞之士多归之。诸葛亮隐居于隆中时，还年轻，没有什么建树，因徐庶、司马德操的介绍，不借“三顾”之劳虚心请教。刘备得聆隆中策，深佩其才，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将都有意见，刘备说：“我得孔明，如鱼得水，诸君不要再说了。”诸葛亮感刘备知遇之恩，尽智竭力。刘备深知诸葛忠贞，临死托孤于诸葛，诸葛恐负所托，为复兴汉室英勇地奋斗一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见，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也就没有诸葛的“鞠躬尽瘁”。刘备对魏延的提拔，也说明其知人善用，不论资排辈。魏延随入蜀时只是刘备身边的一个亲兵，因数有战功，被升牙门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迁都于成都，要选一大将镇守汉川，众论以为必是张飞，飞亦自料非他莫属。詎料刘备却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刘备大会群臣，问延说：“今委你重任，你有何打算？”延答道：“曹操亲率大军来，请力大王拒之：如是其偏将率十万之众到，请为大王吞之。”刘备称善，众人都壮其言。魏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为刘备立了汗马功劳，其功不在“五虎将”之下（《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对于马谡的看法，刘备与诸葛亮的看法不同，后马谡失街亭证明，刘备的看法是正确的。马谡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任绵竹成都令、越嶲太守。他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特别赏识他。正因此，刘备耽心诸葛重用马谡，临死前，特别郑重地叮嘱诸葛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却不以为然，任马谡为参军，每次引见谈论，自昼到夜。公元228年（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等，论者认为应令为先锋，诸葛却违众提拔马谡，令他率大军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诸葛只好回军汉中（《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诸葛与谡情如义子，为不废法，挥泪斩之，并上疏承认自己“明不知人”。请自贬三等。马谡街亭之失，可见刘备有知人之明。由于刘备知人善用，选拔诸葛、魏延等文臣武将为之保卫蜀国，使司马懿“畏蜀如虎”，不敢西窥西蜀。

孙策临死，对其弟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锋，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你。”这对孙权的评价是对的，他确是善于“举贤任能”。孙权任用江东四督，便是他善于“举贤任能”的具体表现。由于有四督保卫江东，魏、蜀来犯，都以失败告终。曹操统一北方后卒大军入荆州，降刘琮，得其船步兵七八万，连其所将兵共二十多万，号称八十万，直指东吴。吴国将士都恐惊，众议认为魏吴力量悬殊，都主张降操，只有周瑜与鲁肃坚持抗战。在这危急之秋，孙权毅然排除众议，同意周瑜、鲁肃之议，委任周瑜为帅，率精兵三万人，与刘备协力，终在赤壁大败操军。周瑜死，孙权任鲁肃代领瑜兵。鲁肃家富有，慷慨好施，大散财货，账穷结士，瑜军缺粮求肃支助，肃给三千斛，瑜因其慷慨与之结好。经瑜推荐，孙权与语，肃献“榻上策”，于是得权信任，鲁肃虽被张昭訾毁，权不信从，更贵重之。及操南征，鲁肃征得孙权同意后前往说服刘备与孙权联盟。后备来见权，求都督荆州，吕范劝权扣留刘备，鲁肃反对说：

“不可。曹操初据荆州，威信未立，宜将之借给备，使其安抚荆州军民，这样，可多操之敌，我可结为党，这是上计。”曹操知道权以土地借给刘备，这时他正在作书，惊得笔落于地。鲁肃促进孙、刘联盟，对打败曹操起了关键作用。吕蒙少而勇猛，因被人辱，便将其人杀了，后自首，权召见奇之，引置左右。在战斗中，屡立奇功，任偏将军。权劝其读书，蒙才笃志于学。鲁肃因公到蒙处，与谈惊奇，抚其背说，“我原以为老弟只有武略，而今学识英博，已不是以前吴下的阿蒙。”正是在孙权的提拔和教诲下，使吕蒙成为文武全才的大将。鲁肃死，权使蒙代领其军，守陆口以拒关羽，他以奇计，兵不血刃而袭取荆州。因荆州被袭、关羽被杀，刘备倾师伐吴，孙权不派武将，而是任一介书生陆逊为大都督。这是权认为其人有谋略，能忍辱负重。果然，陆逊不负孙权所托，先避敌锐气，坚守以伺战机，最后以火攻，四面击之，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仅得身免逃入白帝城（以上史实分别见《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列传）。

3. 收人心巧妙不同

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人心向背决定成败，故都注意收买人心，但各有巧妙不同。曹操御人有术，刘备以情感人，孙权结之以恩。

曹操对人，即使忌之，但为顾全大局也能自我控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投。他与备谈话时，说天下英雄只有他和刘备，这就是说将来与他争天下的必是刘备。这时刘备正在跟他对饮，听了惊得筷子都掉了。程昱也知刘备这人厉害，便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说：“现在正是收揽英雄的时候，杀一人而失天下人的心，不可。”有一次，操率军征张绣时，麦田正熟，下令说：损坏田麦者处死。不料他自己的马跃入田中，他拔刀将作自杀，部属认为主帅不能自杀，可割发以代割头。操照办。虽说操遵法和爱护农业，但也是一种权术。操以法治军，凡犯法应处死的，不论故人旧怨，都不留情。但置之以法后，往往流泪惋惜，表示是不得已之举。但不能说，操所为都出于权术，他有时表现也出于对人的关怀。他破袁绍定冀州后，因冀州人民遭兵燹之难，他下令尽免冀州当年租赋，因而得到河北人民的拥护。对于阵亡将士家属也予以安抚。他下令说：“我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我凄枪伤怀。凡举义兵以来，将士无后人的，求其亲戚为后，授给田和耕牛，开办学校教其读书。”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年轻时“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杰，年少争附之。”及起兵，数有战功，得任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视刘备，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向他说实情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说刘备得人心，确胜过曹、孙。曹、孙都有凭藉和依靠，刘备是白手起家，全靠自己去闯，如果不得人心，就不可能从一个卖鞋织席之徒成为蜀中之王。在与群雄拼搏中，他是重视争取人心的。他在荆州八年，因虚心下士，荆州士人多归之。及操取荆州，刘备奔江陵，操派军追逐，沿途荆州人投入刘备队伍多达十余万。而大多是老百姓，行动迟，有人对刘备说：“应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如曹操兵到，何以拒之？”刘备说：“成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我何忍弃去！”对此，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是刘备能成大业的主要原因。刘备被刘璋请入蜀讨代

张鲁，法正及庞统都主张在与刘璋相会时袭击之。刘备不同意。刘备是对的，未得蜀人心而杀其主，将引起蜀人憎恶，不得人心，只得其地也坐不稳。于是，刘备先驻军于葭萌，不急于讨伐张鲁，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得了人心，他才借它故取蜀。取蜀后对于原任官吏，不论是新归附的，或曾反对自己的，或是刘璋的心腹，都加以招揽，按才任用，以至给予显职，故得蜀人心，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巩固了他在蜀的统治。

孙权对待将士，施之以恩，待如骨肉，故将士乐于效死。周泰，是孙权部下，为权所爱重。孙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山贼数千人忽到，权才上马，山贼刀砍权的马鞍，权甚危急，泰备身卫权，左右也奋勇迎战，山贼被打散，而泰已中十二创，昏迷好久才醒过来。是日无泰，权将被杀。权抚其创伤，感激流泪说：“你为我兄弟战如熊虎，不惜性命被创十二、肤如刻画，我能不待你如骨肉，委你以重任！”（《三国志·吴书·周泰传》）周瑜亦因孙权待之如骨肉，感其知遇之恩，在赤壁战斗中，操派周瑜同乡老友蒋干来游说时，周瑜不为所动。周瑜以其“文武筹略”，为孙权打败曹操立了大功（《三国志·吴书》裴注引《江表传》）。甘宁依黄祖时，曾射杀吴校尉凌统，虽有战功却不被祖所信用，甘宁后得周瑜、吕蒙推荐，乃归孙权。孙权赏识其入，待之如旧臣，宁献计擒黄祖。宁因感孙权知遇之恩，乐于效死，屡立奇功，任折将军。他曾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宣称将率士五千人夜渡浅滩袭击吴军，宁率军不及千人往守。羽素知宁英勇，不敢渡，停军结营（《三国志·吴书·甘宁传》）。由于权得将心，为之奋勇战斗，故魏蜀来犯，东吴岿然不动。

三、晋并三国

曹操、刘备、孙权都是当代的雄杰，却不能统一中国，司马炎没有超人之才为何能创建晋朝呢？曹、刘、孙不能统一中国，其原因已如上所述，司马炎能统一中国，是因其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为他和平代魏奠下了牢固的基础，故能利用当时三国中最强的魏国实力。当司马炎效曹氏故伎逼魏帝禅让上帝位时，蜀国早已灭亡，唯一剩下的吴国又由暴君孙皓所统治，使上下离心，人民厌恨，国穷民困，故晋军到处望风归顺。

1. 夺权术远超前人

魏、晋两朝的奠基人都以权术著称，但一代胜过一代。司马懿与曹操的智计不相上下，但他夺权之隐蔽、艰苦以及其韬晦之计则远远超过曹操。曹操夺取汉朝权力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时汉室已名存实亡，他只是打起汉室这个招牌，即“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而这是明干的，那时有不少人想这样干，曹操不过捷足先登而已。有人要他上帝位，那时司马懿也在捧场，操明确他说他要做周文王，意就是要让他的儿子当皇帝。司马懿要夺魏国军政大权，不知绞尽了多少心血，才躲过一次又一次被杀头的危险；低声下气表了无数次的忠心，才获得曹家祖孙三代的信任，最后他又又有幸遇着当时掌权的曹家那位庸才曹爽，才能取而代之。司马氏之得天下既凭其权术，又遇着其对手都是无能之辈。

《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少年时笃于儒学，有知人之称的杨俊，

说他是“非常之器”。公元201年（建安六年），时任司空的曹操征召他出来任职，他看不起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不愿应召，便以有风瘫病为辞。曹操在夜间派人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验他的风瘫病是真是假，他却坚卧不动，才免于死。曹操任丞相，又征召他，派人去警告他，如不应召，就要杀头，司马懿才不得不出来就职。

司马懿出来就职后，曹操发现这人不简单，听人说他有狼顾相，曾验之，使他前行叫他回头看，他面正向后而身不动。这更引起曹操对他不放心，曾对长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必干预你家事。”曹丕因跟他相好，便为他说好话，而司马懿“勤于史职，夜以忘寝”，逐渐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从疑虑而放心，给予信任。曹操死，曹丕代汉称帝，对司马懿更重用，任为侍中、尚书。曹丕出征，常命他镇守，内扶百姓，外供军资，对其任重如此。曹丕病危，司马懿与曹真、陈群三人被召见，受顾命辅政。明帝即位，司马懿拒蜀和平襄平有功，更受到重视。明帝病危前急召他入见，亲执其手，目视齐王曹芳说：“今以后事相托。我忍死侍君，得相见，无所恨了！”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佐幼主曹芳。

曹爽虽是个碌碌庸人，但在争权夺利上是不会让步的，也就动点脑筋。当时司马懿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掌握着军政大权，曹爽便暗中奏请曹芳升司马懿为太傅，位虽高却无实权。曹芳削去司马懿实权，可见曹氏对他的疑虑和不信任。司马懿心中不满，也不好公开抗争，便装病在家伺机反扑。曹爽虽独掌大权，对于司马懿还是不放心，适河南尹李胜被调任荆州刺史，曹爽便命他去向司马懿辞行以探听情况。司马懿一听说李胜来，也知他与曹爽的关系较密。便诈装病笃，使两婢扶侍，才请李胜入见。司马懿以手指口说渴，侍婢进米汤，懿将口就之，米汤流满襟。胜说：“明公风病，想不到如此病重！”懿乃作哽噎之声，说：“年老病笃，死在旦夕。”胜说：“某被任为荆州刺史，特来拜辞。”懿佯答道：“君到并州近胡人，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拜托。”胜说：“不是并州，是荆州。”懿又有意错乱其辞说：“君到并州。”胜说，“是荆州。”懿说：“年老糊涂，不解君言。”李胜告退回去，告诉曹爽说：“司马公快要死，不足优了！”曹爽听了大为放心，自以为今后可高枕无忧了。

当曹爽不把懿放在心上与曹芳往谒高平陵时，懿立即发动政变，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曹爽不能入屯兵于外，有人劝爽奉天子回许昌，杆檄征天下兵讨懿，爽不听。懿使人责其过失，并派人指洛水为誓，只止于免官。爽欲听之，其智囊桓范援引古今的失权命将不保的事例规劝，爽终不从，说：“司马公只不过想夺我的权，我得回家，还不夫为富家翁。”桓范气得拍胸说：“为了你，我要被灭族了！”曹爽回家不久，司马懿便以谋反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桓范等全都杀害。

曹爽临死不悟，辽想当“富家翁”，其愚如此！曹氏却委之以重任，这说明这时曹氏已没有什么人才了。正因司马懿遇着如此庸人，才得逞其志。

从曹操到曹爽，对司马懿是疑忌的，而司马懿正是在疑忌中，以其韬晦之计和权术，逐渐取得信任，权力不断上升，最后终于夺取了曹氏的权力。

2. 黄雀伺螳螂之计

司马懿死，司马师继其职；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位辅政。自司马懿夺

曹爽军政大权后，司马氏已成为曹魏政权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权谋于略不下于其父司马懿，在他决定伐蜀前，防止将帅取蜀后叛变自立，已预作防御，因而出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事，钟会之谋不得逞，邓艾功大而无辜被杀。

诸葛亮死后，姜维继其志屡次北伐，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弄权于内，谗毁姜维，后主刘禅昏庸受其摆布，姜维下敢回成都，屯兵于沓中。司马昭知其上下不协，庸主候臣掌权，料蜀可破，便与众议代蜀，说：“我自东征以来，息歇六年，治兵缮甲，以灭蜀、吴。今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这是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计。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其余众不过五万。先绊住姜维于沓中，使其不得东顾；再派军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蜀主刘禅昏庸，边城被破，上下震惊，料必亡之。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时机还不成熟，屡陈异议。司马昭使人晓喻，艾才奉命。于是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派镇西将军钟会率兵自骆谷袭汉中。西曹属邵悌对司马昭说：“钟会难信，不可令行。”司马昭笑说：“取蜀如指掌，而众人皆说不可，只有会与我意同。灭蜀之后，将士思归，蜀地百姓，犹怀震恐，钟会纵有异志，也无能为。”司马昭虽料钟会“无能为”，也暗派其心腹卫瓘作为监军。

钟会大军屡胜蜀军，姜维引军与张翼、廖化等将合守剑阁，阻敌不能前进，姜维曾上书建议派将守阳安关口、阳平桥头，黄皓求鬼巫，说敌不会到，刘禅也相信，置之不理。邓艾率万余人偷越阴平，经绝险到江由大破蜀军于绵竹。斩诸葛瞻。随即进军雒县，刘禅降。刘禅令姜维降会。蜀亡（《三国志·晋书·文帝纪》）。灭蜀后，邓艾被任为太尉，钟会被任为司徒，钟会潜谋叛乱，便密使人诬毁邓艾。司马昭令卫瓘逮捕邓艾。钟会所忌唯艾，今艾被擒，而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送艾后，便谋反。这时，他接到司马昭的来信说：“恐邓艾不听命，已派中护军贾充率步骑万人入斜谷，屯兵于乐城，我自率大军屯于长安，相见在近。”钟会大惊说：“相国知我有异心了！”便与姜维密谋杀异己诸将，由其亲信统军，因谋泄被魏军所杀。会死，艾本营将上追回邓艾，卫瓘派将前往杀艾，遇于绵竹，斩之。邓艾子邓忠也被杀，其他子女也在洛阳被杀，其妻及孙被流放到西域，灭蜀立大功的邓艾便这样被冤杀了。

及会奏艾不轨，司马昭率十万大军将赴长安时，邵悌说：“钟会所统兵将，比邓艾多五六倍，令钟收艾便可，何必自行。”司马昭说：“你忘记前时所说的话了，为什么却说不必自行呢？不过，这些话不可外泄。我以信义待人，但人不当负我，我那会先疑人！近日贾充问我，说：‘疑钟会呢？’我答道：‘我今派你去，难道要疑你吗？’贾充无话可说。我到长安，事则自了。”司马昭出兵名为制邓艾，实意在钟会，自统大军到长安，是为声援其在蜀的心腹将校和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以上事迹见《三国志·魏书》邓艾、钟会的传）。司马昭的心计比之钟会高出一筹。当“螳螂捕蝉”而扬扬得意时，“黄雀在后”伺机出击，“螳螂”终入了“黄雀”的口腹。

3，顺形势摧枯拉朽

迄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依样画葫芦，效魏故伎逼魏主曹奂禅位时，蜀已灭亡，只剩下吴国一国。蜀吴本是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按照司马昭的计划，

灭蜀后再准备三年则可灭吴。可是蜀亡于公元 263 年，吴直到公元 280 年才被晋所灭，即蜀亡十五年之后。本来吴末帝孙皓由于残暴使吴国弊民困不堪一击，而晋迟迟不敢代吴，与司马炎犹豫不决有关。

羊祜为都督镇守襄阳，以德化吴军民，收其人心；并屯田储谷，作为灭吴的准备。后见吴国腐败，上下离心，人心厌弃，便上书建议伐吴说：“今江淮之难，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强于往时，不于此时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此非良计。孙皓恣情任意，残虐多忌，将疑于朝，士困于野，决不为其效死，我兵临之际，必有应者。攻之必克。”而议者多不同意代吴，司马炎也不允其所请，祜知了叹气说：“天下不如意事，常十居七八，天与不取，真是可惜！”羊祜伐吴之志在其生时终不能实现。祜临终时，乃推荐杜预以自代（《晋书·羊祜传》）。

杜预代羊祜职后，镇守襄阳，抚民养兵，准备伐吴。杜预准备妥当，就上书献伐吴之计说：“从前羊祜与群臣对伐吴意见多不相同，而羊祜只与陛下密议，故异议更多。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伐吴十有八九利，其不利只占一二，而其害也只止于无功。自秋以来，我讨贼之形颇露，如果中止，孙皓恐惊，迁都武昌，修筑江南诸城，迁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可掠，那么破之就更困难了。”当时，中书令张华正与司马炎围棋，适杜预表到，炎看毕交华，炎看了推却棋样，敛手奏说：“我国富民强，吴民忧国弊，今如讨之，可不劳而定。愿陛下不要再狐疑。”司马炎终于批准杜预起兵伐吴。晋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吴人纷纷归降，迅即平定东吴，天下终于归晋（《三国志·杜预传》）。

自司马懿守曹爽军权，司马懿已成为实际的统治者，魏已名存实亡。迄司马昭掌权，虽不迫曹氏禅位，也是实际的统治者，被灭亡的蜀国，也就归属于司马氏的势力范围。及司马炎灭吴，可以说是司马氏，即晋先后兼并了三国。

第五章 隋有天下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凡逆形势、逆人心的则事难成；而能顺形势、顺人心的则事易成。隋文帝杨坚之有天下，正是由于他能顺形势、顺人心，且其对手非娃娃即昏君，周静帝登基时只有七岁，实权全由他这个外祖父掌握。迷于诗酒色的南陈后主叔宝又不理国事，故能顺而取之。

一、人心厌乱

自公元 190 年，即东汉末年到 581 年南陈被隋消灭止，共有 391 年。除了司马炎灭吴到其死的十年间，中国算是统一外，其中长达 381 年之久都是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西晋“八王之乱”及“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国人民遭受兵燹的祸害不下于战国时期，因此，人民无不厌乱思治。杨坚正是顺着人民的这种愿望创建隋朝的。

1. 近三百年的兵燹

在司马氏家族中，司马懿及其两子司马师、司马昭算英雄好汉，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还不能列入昏庸之列。到了司马氏的第四代司马衷，即晋惠帝，却是个十足白痴，与其同辈的兄弟及以后子孙的智商都不高，大多是低能儿。司马衷继位，致发生“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晋室诸王力量消耗殆尽，于是，中国北方五胡得以兴起，践踏中原。灭西晋的是汉主刘聪。偏安南方一隅的西晋也不能免于灭亡，其末期的一个皇帝，即晋安帝司马德宗比白痴晋惠帝还白痴。晋惠帝还能说两句使人啼笑皆非的傻话，而晋安帝自少及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是个哑巴，连寒暑饥饱也不知。可是，刘裕却不放过他，将他杀了，另立其弟司马德文为帝，即晋恭帝，只当了一年皇帝便逼其禅位。刘裕在南方创建宋国。亡国之君，其遭遇也是够悲惨的。汉主刘聪俘虏晋怀帝司马炽时，他宴会群臣，令司马炽穿青衣行酒；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愍帝司马邺向刘聪投降，刘聪对他极尽侮辱之能事。刘聪狩猎，命司马邺执乾作前导。又使其行酒、洗爵。去厕所时，又令司马邺给他扇扇子。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投降宋后，信奉佛法深居简出，以避灾祸，最后祸也避不了。尽管西、东晋的这些末代皇帝卑躬屈膝、小心谨慎，最后都免不了杀头。西晋之亡及其后代的悲剧，罪在司马炎。其子司马衷痴呆众人皆知，他也并非不知，众大臣多议立德才兼备的他的弟弟司马攸，司马炎不仅不同意，反而逼害司马攸致死，硬立其嫡子司马衷。司马衷继位其妻贾南风才能弄权，因而引起“八王之乱”，使中国陷于大分裂，北方与南方和北方与南方之间，混战不休，时间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给人民带来灾祸是极其惨重的。论罪魁祸首，司马炎罪责难逃。

“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一片血腥。所谓“五胡”，是指匈奴、羯、氐、羌、鲜卑。古代汉族称异族为“胡”。所谓“十六国”是指：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和夏。另外，参加混战的还有汉人和氐人，建立的国家有代（北魏）、冉魏和西燕。在南方，相继出现的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不管是南方和北方，暴君之暴，也是罕见。著名的暴君，南方有九人，北方

有十一人，加在一起有二十人之多。如前赵国主刘曜是个杀人魔王，他攻破洛阳时，屠杀西晋官民三万亲人，纵兵烧掠奸淫妇女，使繁华壮丽的洛阳变成一片焦土。他围攻长安时，“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半数以上。”（《晋书·愍帝纪》）后赵国主石虎更残暴，建长安、洛阳二宫，征民夫四十余万，民不堪命，破产的“十室而七”。夺人妻女三万人充后宫，其中有夫的达九千余人，而杀其夫及夺而遣之因而自缢死的有三千余人。他好游猎，废广大耕地为猎，有犯其猎地的兽的，就处以极刑。上行下效，其属官也残民以逞，民间有美女，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被杀的有百余家。而其父子相残也骇人听闻（《晋书·石季龙传》）。石虎在战争中，“降城陷垒，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在这次大分裂的历史时期，人民所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2. 统一之势已形成

大混战结果，北朝只有北周，南朝就有南陈。南北的对峙只此两家，最后只能是由谁来消灭谁，中国再统一之势已形成了。

最后统一北方的是周武帝宇文邕。北周实际是武帝之父周文泰所创建。宇文泰掌握着西魏大权，生时不敢篡位，临终托其侄宇文护辅佐其子。后在宇文护导演下，宇文泰儿子宇文觉代西魏恭帝登上皇位，建国号为周，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北周。宇文觉因不满宇文护专权，与司空李植等密谋诛之，事泄，被宇文护所废，不久被毒死。其兄宇文毓继为北周皇帝，在位未及三年也被宇文护毒死。宇文护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为北周皇帝，称周武帝。宇文邕为人胸有大志，沉毅有智谋，对宇文护表面恭顺，任其所为，实是伺机除之。他筹划和忍耐等待了十三年，终于亲自打死了这个“蠹政害民”的宇文护，公元572年3月18日，护从同州回来，周武帝登文安殿，会见宇文护，然后引护到含仁殿去朝见皇太后。武帝于内宫见护，常行家人礼，每次护拜见太后，太后必赐他坐，武帝则站在旁边。护将入，武帝将《酒诰》交给他，请他劝太后戒酒保护身体，护不知是计，拜见太后，按照武帝所托，读《酒诰》进谏。这时，站在后面的武帝举起玉珽猛击其头部，护昏倒地。武帝令太监泉用刀砍之，泉惊慌，砍不能伤，先匿于内的卫王宇文直便提刀出而斩之（《周书·晋荡公护列传》）。杀了宇文护，武帝才亲政，掌握了军政大权。之后经过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一系列改革，终于达到其增强国力、“修富民之政”的初愿。于是，亲自两次率军征齐，在公元577年消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周武帝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据《周书·武帝纪》记载，他励精图治，勤于政事，性既明察，用法又严。其所行事，都想超越古人。他提倡节俭，身体力行，穿的是布袍，寝的是布被，后宫妃嫔也只有十余人。所住宫殿不许装饰繁华。他不怕劳苦，勤见群臣，虚心听纳，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平，锐意练军。为校兵阅武，他不辞劳苦，亲自领军步行山谷，登山涉河。在平齐之战中，他看见赤脚的士兵，便脱鞋给他。每次宴会将士，必自举杯劝酒，或亲手赐物。在征战行阵之中，他机敏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齐之后，本欲穷兵黩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统一天下。当时，陈的实力远不如北周，以周武帝的雄才大略，他的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可惜其壮志未酬，过了一年，即在578年病死了。

二、夺权两手

周武帝继位者，即周宣帝宇文赧，如果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根据当时周强陈弱的形势，宇文赧是可以继其父志实现统一的。但宇文赧是个荒淫残暴之主，且其在位只一年，整天忙于淫乐，是不会想到图天下的事的。其继位的静周帝宇文衍又是个娃娃，即位时年仅七岁，他的外祖父、丞相、隋王杨坚便耍其软硬两手取而代之，改周为隋。所谓软的一手，是指他实行德政；所谓硬的一手，是指他对反对派尤其是周宗室大杀戮。

1. 软的一手买人心

周宣帝的荒淫残暴，使杨坚实行其软的一手更得人心。

《周书·宣帝纪》记载：宇文赧，周武帝的长子，武帝死，赧继位，称周宣帝。赧为太子时，武帝恐他将来不能治国，管教甚严。朝见进止，要求都与群臣一样，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不让他休息。他嗜酒，武帝便禁止带酒入东宫。他每有过错，就加以鞭打。武帝对他说，“古来太子被废的不知多少，难道其他儿子不能立吗？”即警告他，如下改过，将被废而另立。并指派东宫官员记录他的言语、动作，每月上奏。他内心虽不满，但惊武帝威严，便矫情修饰，掩盖自己的过恶，以假象来迷惑武帝。武帝被其所惑，也就不换太子。武帝一死，便逞其所欲，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他对武帝的死，没有一点愁容，武帝还未安葬，便逼武帝的妃嫔跟他淫乱。他耽迷于声乐，淫于美色，采择天下美女，以充后宫。西阳公宇文温，是宣帝的从祖兄的儿子，其妻尉迟氏有姿色，因以宗室入朝会见，他便强其饮酒，逼而淫之。对女人歌舞，他看惯了，觉得无味，便令京城少年穿着女人的衣服，入殿歌舞，与后宫宫人观之，以为喜乐。他禁止天下妇女施粉黛，只有宫中妃嫔、宫人例外。他胡作非为，无所顾惮。他认为自己最尊贵，不准别人有天、高、大之称。他好自矜夸，饰非拒谏，摈斥近臣，多所猜忌。他恐群臣规谏，不得行己志，常派左右密探，小有乖违，便加之罪。自公卿以下，都被鞭打，被其杀戮或降免职的，不计其数。每鞭打人，都打够一百二十，名为“天杖”。对待后、妃嫔和宫女亦如此。于是，内外恐惊，人不自安。

宣帝为了专心于淫乐，只当了一年皇帝，便禅位于才七岁的儿子宇文衍。不久，他因酒色过度而丧生。从此，周政权就落在丞相杨坚的手里。

《隋书·隋文帝纪》记载：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其父杨忠是北周功臣，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其父爵位。他曾随武帝破齐，有功，任柱国。宇文衍继位，年幼，不能理政事，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就矫诏命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太后是杨坚的女儿，杨坚以帝外祖父之尊掌权，群臣不敢有异议。宣帝时，酗酒好色，刑政苛酷，上下离心。及杨坚执政，“大崇惠政，法令请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节俭是杨坚的一种美德，也是他得人心的一条重要方法。在他辅政及后为皇帝，始终带头和提倡节俭，使朝廷内外节俭成风。也因此，就不扰民，能实行惠政。由于他为人节俭，他就不许掠夺百姓，严惩贪官污吏。也因其节俭，在生活上严于律已，不纳妾，只有妻子独孤氏一人，他当皇帝后，独孤皇后还在时，他过的是一夫一妻的生活。与宣帝穷奢极侈、荒淫残暴、刑

政苛酷相比，一仁一暴，极其鲜明，因而人心归之，也是必然的了。

2. 硬的一手慑群臣

杨坚在掌握周的实权后，其代周的野心逐渐暴露，引起周宗室及一些大臣的反对。杨坚为排除异己，毫不手软地进行诛杀。据说他十六岁时，相面人赵昭偷偷地对他说：“你当为皇帝，但必大诛杀才能定天下。要好好记住我的话。”这是否是相面人所说，抑或是他假托以为其大诛杀制造根据，姑且勿论，但他的大诛杀制服了周宗室及一些大臣的反抗，并慑服了群臣，使他顺利地登上了帝位。

杨坚在代周前，已做好各种准备。他先是把周室文臣武将可以利用的，罗致到自己集团中来，对于周室诸王及不附己的严加防范。尉迟迥是周太祖姊昌乐大长公主所生，战功卓著，在周甚有威望。宣帝即位，任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宣帝死，杨坚辅政，便命郟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知杨坚是在削弱忠于周室的力量，便举兵反抗，其弟青州总管尉迟勤起兵响应，众数十万，荣州刺史宇文胄、中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亦各据州以应迥。迥又北通突厥，南连陈人，一时声势浩大。尉迟迥子惇率众十万入广德，驻军于沁水东。杨坚以韦孝宽为元帅，高颖督战。孝宽军隔水相持不进，惇军连营二十里，引军小退，欲让孝宽军半渡击之。孝宽因其小退，鸣鼓猛攻，尉迟勤军大败。孝宽军乘胜直追到邺城，迥与子惇、祐等又率十三万军，列陈于城南，尉迟勤率青州兵五万来援，三千骑兵先到。迥披甲上阵，率其麾下千关东精兵参战，孝宽军夫利退却。两军交战时，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颎领军冲观者，乘人群大乱而攻之，迥军大败，退入邺城。孝宽挥师攻城，城破，迥自杀。迥起兵到败，只有六十八日。

杨坚为防止周氏在外的诸王生变，他以招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借口，召诸王回朝，诸王不知是计也就听命，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逖便来长安。为稳定五王，表面上十分尊重，因他们都是静帝祖辈，给他们特殊待遇，“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不久发生这样一件事：据说赵王招知杨坚阴谋代周，密谋图之。有一天，招邀请杨坚到家，在寝室里饮酒。当时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所亲人史胄，已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在帷席间和后院伏下武士。杨坚随从都在阁外，只有元胄等四人坐于近侧，招屡以佩刀割瓜给杨坚吃，杨坚没有怀疑。元胄发觉有变，提刀而入，招便以大杯酒请胄饮，又叫胄到厨房去取浆，胄不动。滕王逖后到，杨坚下阶迎之，元胄便向他耳话说：“形势大异，公宜速出。”杨坚坐一会儿便辞出。“后事觉，陷以谋反”（《周书·赵王招列传》）。所谓招要密图杨坚，果尔，既然埋下刀斧手，要杀之非元胄一个可救，而杨坚却脱险了，显然可疑，故招传的作者在后面加上“后事觉，陷以谋反”语，“陷”即“陷害”的意思。不管招有否杀杨坚的阴谋，杨坚也要将之杀掉，周室几代当时还在的诸王子未见有什么罪，后来也都被杨先后杀掉了。

镇压了反对派，消灭了周室诸王，杨坚本可废静帝登上帝位，但他还是导演了几次谦让喜戏：静帝先下诏封王爵，他再让乃受；接着静帝要他“如有表奏，勿复通闻”，即他可决定一切，但仍要经百官敦劝才同意；静帝请他出入如天子礼仪，他前后三让才接受，于是静帝以众望有归，便下诏禅位，经百官劝，杨坚才即皇帝位于临光殿。这种禅位好像是出于对方自让，而接

位的又是一让再让，其实背后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这位八岁的静帝让位给他的外祖父杨坚后，被封为介国公，过了半年，死了。隋志这样记载：“开皇元年五月王申，崩，时年九岁。”

三、灭陈方略

南北长期对峙，阻碍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也给南北人民造成极大负担和痛苦。杨坚即位后，就着手进行灭陈的准备工作，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南北人民的要求的。

1. 越长江明攻暗渡

高颍是灭陈方略的策划者和具体执行者，他推荐韩擒虎、贺若弼和杨素为大将，三人都立大功。灭陈，高颍应居首功。

高颍，自答是渤海蓍人。父宾，背齐归周，在大司马独孤信手下工作，因得宠信，赐姓独孤。杨坚娶独孤信的女儿，因与高颍常有交往。杨坚见颍有才华，又知兵事，执政后欲请他入府，便使人致意，颍一说便同意，说：“愿受指使。纵令公事不成，族灭在所不辞。”从此成为杨坚的心腹。他竭力献智，深得杨坚信用，在与韦孝宽镇压尉迟宽反抗中立功，任柱国。杨坚即位，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后又兼左领军大将军。杨坚曾征求灭陈的策略，颍说：“江北地寒，收获较迟；江南天热，水田早熟。待江南收割季节，便扬言要集中兵马前往掩袭。陈必屯兵御守，这样就可耽误其农时。陈既集中兵马，我便解散军队，如此反复几次，他们就习以为常。以后再集中兵，他们就不相信我们要出证了。当敌犹豫不决之际，我们立即渡江登陆作战，士气必定倍增。又江南土质薄，做房子多用竹茅，所有储积，都不是储存地舍，而是放在茅竹房。我可密派人，因风放火，将之烧毁；如再修建，则再放火烧之。不过数年，可使他们财力枯竭。”杨坚行其策，使陈人穷于应付，更加困弊。高颍还主张要服秦人之心。公元582年（开皇二年），长孙览、文景山等率军伐陈，杨坚令高颍节度诸军。适陈宣帝死，颍以不乘人丧，奏诸班师。杨素、贺若弼等都是颍所推荐，在灭陈中成为名将。灭陈之战，颍为帅府长史，晋王广虽为元帅，因年少，一切军务都由颍决断。他确是“参谋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是平齐的主谋者，功勋是卓绝的（《隋书·高颍列传》）。

隋出兵平陈，是在公元588年（开皇八年）。杨坚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广力主帅，高颍为元帅府长史，起兵伐陈。共分兵八路出征：晋王广出六合，秦孝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薪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共有兵五十一万八千。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战船，绵延数千里。

杨素、贺若弼、韩擒虎三路军都打得很出色。

杨素曾数次向杨坚献取陈之计，杨坚任他为信州总管。素到任后，建造大舰，名为“五牙”，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可容战士八百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用来拍打敌船。还建可容百人的“黄龙”船。伐陈开始，杨坚率巴蜀水师自信州顺流东下，渡过三峡。当他率军到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时，

陈将戚欣以青龙战船百余艘、数千兵，扼守狼尾滩，以遏隋军。其地险峭，隋诸将患之。素说：“胜败在这一举。如白天进击，敌看清我行动，且滩流迅激，难于作战，对我进攻不利。不如在夜间袭击，攻其不备。”于是，杨素在夜间亲率黄龙船数千艘悄悄地偷渡，另派王长袭率步兵从南岸击欣别棚，又令大将军刘仁恩率骑兵从北岸夹击。陈军无备，被突然袭击，大败而逃。所俘隋军，安抚后都释放，所过秋毫不犯，陈人大悦。素便率水军东下，陈军扼守岐亭，在北岸开凿岩石，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隋军战船。素军登陆破隋军，砸毁三条铁锁。隋军到处，陈军惊而退走。巴陵以东，敌不敢守。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派使来请降。素率水师下江口，与秦孝王俊胜利会师（《隋书·杨素列传》）。

贺若弼因高颎的推荐，杨坚任他为吴州总管，委以平陈重任，弼欣然以为己任。为麻痹陈人，在沿江将上换防之际，必命换防将士先集中历阳，大列旗帜，营幕遍野，陈人误为隋大军到，便急增兵防守。后知是隋军换防，也就撤回。后以为常，便不复设备。故弼奉命以大军渡江时，陈人全不发觉。袭陈南徐州，攻占陈朝都城建康东北门户京口，擒南徐州刺史黄恪。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接着贺若弼进占建康北部屏障钟山（今南京紫金山），陈将任蛮奴、肖摩诃等率军顽抗，弼军屡退。弼知敌将骄卒惰，于是鼓励将士，作殊死，大破隋军。肖摩诃被活捉到，弼命左右牵出斩之，因见摩诃脸不改色，视死如归，弼释其缚以礼待之。隋即挥师从北门攻入建康（《隋书·贺若弼列传》）。

韩擒虎是个文武全才的猛将，他屡败陈军，陈人丧胆。杨坚任他为庐州总管。及伐陈，任为先锋。擒虎率五百人于天未亮便渡江，袭采石，这天是春节初一，昨天三十日，晚上陈军都饮得大醉，隋军到时还未醒过来，故轻而取之。攻占姑熟，仅用半天时间，随即率军北上，进入距建康南仅二十里的新林，向建康挺进。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纷到军门求见，日夜不绝。陈人见擒虎军到大惊，陈将樊巡、鲁世真、田瑞等相继投降，晋王派行军总管杜产所率的部队与韩擒虎合军，共有步骑二万。朱雀航的陈守军，听说擒虎军到，惊不敢战而溃散。任蛮奴为贺若弼所败，弃其军向擒虎投降。擒虎以精骑五百，直入朱雀门，陈人欲战，任蛮奴喊道：“老夫尚且投降，诸君还打于吗！”众皆散走。逐平金陵，俘虏陈后主叔宝。

2. 醉梦中当了俘虏

杨坚得天下是较易的，他夺周权不费吹灰之力，灭陈也轻而取之。虽然也由于高颎的策略正确和韩擒虎、贺若弼、杨素等名将英勇善战，但主要是因他的对手陈后主叔宝是个昏乱的诗人，日夜在女人群里醉生梦死，不理军国大事，故能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平吴，统一了天下。

即使最富强的国家，由陈叔宝这样的花花公子来继位，国家也是要灭亡的。唐魏征在《陈书·后主纪》中论及陈叔宝时说：“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不想及国家的危急，也不知农事的艰难。即位之初还有所惊危，写的诏书还屡次提到仁义的话；后来政权较安定了，便煽起淫侈之风。他宾礼文人，只是跟他们一起寄情于文酒；他亲昵佞臣，委以重任。为他计谋的，没有骨硬的贤臣；掌握权要的，都是侵掠百姓的官吏。刑政日益紊乱，尸位素餐之徒充满朝廷。他与艳妻美妾日夜淫乐，不顾国家危亡，上下相蒙，

众叛亲离。国家亡了还不悟，他自投于井，想以此保己安全，其愚如此！”这确是谗论。

魏征在《陈书·张贵妃列传》里还具体描述了陈后主寻欢作乐、穷奢极侈的情况：“陈后主于光照殿前兴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各高数丈，并有各种各样建筑数十间，窗牖、壁带、悬楣、栏槛都用沈檀香木制作，又装饰以金玉，间以珠翠，门挂珠帘，房内有室床、宝帐，服玩之类也瑰奇珍丽，这是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拂来，香闻数里；晓日初照，光映后庭。阁的周围，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住临春阁，张贵妃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住望仙阁，三阁之间都有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也受宠爱，经常来此游乐。后主还以宫人有文学才能的袁大舍等为大学士。后主每引宾客跟张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用其最艳丽的新诗以为曲词，制作新声，选宫女中有客色的成千人，使习而歌之。交相歌唱，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内容大都是赞颂张贵妃、孔贵嫔的美色，其词只不过是“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之类。张贵妃发长七尺，其黑如漆，光可照人。她很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于阁上靓妆，立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她有才辩，强于记忆，善伺后主的颜色。后主怠于政事，百官奏事，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抱张贵妃坐在膝上共同决断。李、蔡不能记的，贵妃便为之改正，无所遗漏。由是张贵妃得到后主的宠爱，冠绝后庭。后宫家人，违法乱纪，便向贵妃哀求，贵妃则使李、蔡先启其事，然后从容为之说情。大臣有不从命的，亦向后主谮毁，后主无不听。于是，张、孔之势，横行四方，朝廷上下，日益腐败。

宦臣，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紊乱。”

唐编撰梁、齐、周、隋五史时，魏征是监修官，魏征在后主和张贵妃传记里写史论，是为总结亡国的教训为唐作鉴戒的。

魏征所谓“尸位素餐之徒充满朝廷”，是指宰辅江总、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人，这些人常陪后主游宴后庭，被称为狎客。这些狎客往往自吹以取宠，如孔范自谓有文武全才，曾对后主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只不过有勇，他们哪有深见远虑！”后主听其言，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由文官代将其兵。时佞臣施文庆、沈客卿二人代掌机密，外有表启，皆由其呈奏。及边防吃紧，因与边将有隙，各处守军要求增兵，都压而不奏。后虽知隋军渡江，后主仍不为所动，他说：“王气在此，北齐三次发兵，周师又来攻，无不失败。现在隋军来犯能奈我何！”孔范也帮腔说：“长江天堑，自古乃限隔南北，隋军那能飞渡！边将欲立功劳，便妄自告急。臣常忧官不大，如隋军敢渡江，臣就要升为太尉了！”意是说，隋军来犯，他就可立大功，当了最高的武官。有人说北军马死，范说：“这是我的马，为何死了！”意是说北军马如渡江，必不能北归，将全为他所有了。后主听了笑以为然，故不把北军放在心上，歌舞、纵酒、赋诗不停。陈君臣如此自吹自擂自欺，口发狂言，显然是狂饮中的醉汉的语言。时贺若弼、韩擒虎两军正向建康推进，这时，陈后主才惊慌了，日夜哭泣，建康虽有十余万兵，也不知如何调度。贺若弼攻京口，肖摩诃是南陈名将，英勇善战，曾为陈多次立奇功，是南天一柱，他请将兵迎击，后主不同意。贺若弼军到钟山，摩诃又说：“弼孤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可以必胜。”后主又不同意，坚持死守京

城的错误战略。当隋军逼近时，后主才召请将议军事；任忠说：“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兵足食，宜固守城池，沿淮水立棚，北军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路，使敌互不通消息。请给臣精兵一万，战船三百艘，下江掩袭六合，敌大军必以为其渡江将土已被俘获，可挫其锐气。淮南士人与臣是旧相知，今臣去必相从。臣再扬声前往徐州，要断其归路，隋军惊而必退。待春水涨，上江周罗睺等军可来支援。”这本是良策，后主不听。明日开会时，后主说：“兵久不决，使人心烦，可叫肖摩诃率军出战。”任忠叩头苦请勿战。孔范又放狂言：“请决一战，当为勒石燕然。”“勒石燕然”是指东汉时窦宪大破匈奴追到燕然山，在那里刻碑以记其功。孔范不顾国家危亡，说大话力后主帮腔，以谄媚后主。后主对摩诃说：“公可为我决一战。”于是使鲁广达布阵于白土冈，在诸军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肖摩诃军在北，诸军南北绵延二十里，像一条长蛇，首尾进退不相顾。贺若弼轻骑登山，观察阵军阵势后，率领八千兵勒阵以待之。广达力战，击退隋军，弼纵烟以隐其军，引军攻孔范军，两军相交，范军败走，弼军勇猛追击，陈师溃乱，不可复止，被杀五千人。这时，韩擒虎军已入朱雀门，后主惊慌要逃匿。尚书仆射袁宪说，“大事如此，陛下去哪里有安全？臣请陛下穿好衣帽，坐在政殿上，效梁武帝见侯景故事。”后主不听，忙下榻奔出，说，“锋刃之下，不要开玩笑，我自有计！”什么计？后来隋军到，有人说他在井中，叫他出，不应，便说要下石，才听到他的叫声，投下绳使他攀着拉上，人们惊其太重，及拉到上面，却共有三人，即后主和他两个宠妃张贵妃、张贵嫔，真是生死不离（以上事迹见《资治通鉴》一百七十六卷陈纪十和一百七十七卷隋纪一）。

第六章 唐宗一统

史称，唐的开国皇帝是唐高祖李渊，实际上创建者是其次子李世民，即唐太宗，这是李渊自己也承认的。在《权利之争》一书里已论证，这里不拟重复。

这一章，主要是探讨隋亡唐兴的原因：隋在文帝时已富强，其继位者隋炀帝曾任灭陈的统帅，此人颇有才干，略有文才武略，也想有所作为，为何他登上宝座后弄得天下大乱，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其心腹部下缢死？隋亡的教训是什么？隋末，群雄崛起，其中也不乏英才，有的颇得人心，有的也解兵机，为何都被唐太宗打败了？隋失其鹿，而独由太宗得之，太宗兴唐的经验是什么？

一、隋亡教训

隋之亡，是由于隋炀帝荒淫极侈，好大喜功，专横独裁，不然，被史称历史上最富裕的隋朝，不会亡得这么快，从其兴起到灭亡只有三十五年、是历史上短命王朝之一。隋亡的教训是深刻的，故唐太宗建国治国都以隋亡为鉴戒，古今历史学家都加以总结，其历史教训迄今还有借鉴意义。

1. 虽富极侈亦困弊

不论是国家或个人，其富裕莫不起于节俭。但是即使是最富有的，如果穷奢极侈，终必困弊。

比之历代封建王朝，隋最富饶。《隋书·高祖纪》的（唐初）作者认为文帝统治二十年间，天下太平，朝野欢娱，其原因是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禀实，法令行。”仓禀实到什么程度，《资治通鉴》说：“天下储蓄，可供五十年。”

到隋炀帝继位，其所作所为，与文帝截然相反。文帝躬行节俭，炀帝则穷奢极侈；文帝减轻徭赋，炀帝则加重徭赋。于是由“天下太平，朝野欢娱”变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炀帝这人是很有巧于伪装的，当他要夺取其兄的太子位时，表现得多么节俭朴素，不好声伎，少女宠，穿着、车从简朴，以争取父皇母后的欢心。及其继位后此人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隋朝的富裕，也填不满这个二世祖无穷的私壑，穷奢极侈的事件不断地出现：

巡游占去炀帝大部时间，其巡游不是了解民间疾苦，主要为了享乐。他在位十二年、到处巡游就占了十一年。他每次巡游都带上庞大的随从队伍和千军万马，供应要精要美，皆由人民负担，故其经过的地方如瘟神来到，万民遭殃。《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了他游江都的一次感况：公元605年（大业元年），即炀帝即位的第一年，他就游江都。他乘着龙船，共有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有一百二十间房，都装饰金玉。下层内侍住。皇后乘翔螭船，比龙船小，装饰一样。另有浮景船九艘，都有三层。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鳧凌、波、五楼、道场等数千艘船，由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载内外百司供奉的物资。共用挽船工八万余人，其挽漾彩

以上大船的有九千余人，这些挽船工称为“殿脚”，都穿锦彩的衣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等数千艘船，由十二卫兵乘坐，并载兵器帐幕，由兵士自挽船。游船前后相接长达二百余里，照耀川陆。为保护船队安全和显示皇帝的威风，骑兵沿江两岸行，旌旗蔽野。所经过州县，五百里内都令献食，要的是水陆珍奇之物，多的一州有的百车。供应的食物太多吃不了，大多丢弃了。炀帝所过之处，献美食就高兴，就得宠。有一次他巡游雁门，雁门太守丘和献食很精美，于是便将丘和从边郡调到内郡博陵任太守，以示奖赏。马邑太守杨廓没有献食，他很不满意。从此，炀帝所到之处，地方官都争献美食。而这些美食不会由长官出，都是向老百姓搜掠得的。

为了住得更豪华舒适，炀帝在位期间几乎无日不建设宫殿。本来长安、洛阳两京及江都，亭、殿、花园已建筑了很多，但他觉得不新鲜，每次游幸，左顾右盼，都感到不满意，不知所适。于是，便叫人画天下山川之图，亲自阅览，寻求胜地建设宫殿、花园。于是又建了很多华丽的宫殿，在陕西渭南建崇业宫，安徽临淮建都梁宫，江苏扬子建临江宫，河北涿县建临朔宫，山西太原建晋阳宫，山西汾阳建汾阳宫。

炀帝自持国家富有，挥金如土，役民如奴，游乐、建宫殿花了无数民力，财力，同时还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等。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等虽有其经济、军事意义，但主要还是从其游乐着想，如他令开凿的运河，要求能通龙船，两岸要筑御道，以便军队前行以壮观，并建筑许多供其享乐的御用工程和保卫其安全的军事据点。开通济渠长达二千余里，每两驿建一离宫以供其休息。而所建的工程，不营人民的死活，工程从不间断。据有人统计，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开通驰道等几项大工程役用民工达千万以上。而炀帝在位的头八年间，动用民工超过了三千万。

炀帝对外族往往示之以威和摆调气，他于城东建一大帐，其下可容数千人。他在帐内备仪卫作散乐，宴请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落，并赏赐甚厚，使知中国富裕。边疆胡人请准许到东都东市丰都做生意，炀帝批准，并先命商人装饰店肆，穿着华丽，堆满珍货，卖菜小贩在菜摊上铺上龙须席。胡客经过酒食店，邀请入内，不取分文，任其醉饱，还欺哄他们说：“中国丰饶，酒食不要钱。”胡客听了，大为惊叹。也有了解中国情况的，看见用丝绸来缠树，说，“中国亦有穷人，他们没有衣服穿，为何不将这些丝绸给他们，却用来缠树呢？”中国商人羞愧不能回答。

炀帝役赋重而频繁，各级官吏也趁机层层加码，上下一起吮吸民脂民膏，人民困苦不堪。朝中忠贞之士进谏，如果炀帝有所悔败，还不致引起大乱，但他死不悔改，不只不纳谏，甚至置谏者于死地。当时，边塞较安定，他下诏征百余万民工筑长城，西从榆林起，东到紫河，且急如星火，要在二旬内筑好。尚书左仆射苏威因其非急务而劳民伤财，谏之不听。炀帝征求散乐以供淫乐，太常卿高颍谏，不听。颍退，对太常丞李懿说：“周朝的天元因淫乐而亡，殷鉴不远，哪能再步其后尘！”高颍因炀帝过于厚待启民可汗，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颇知中国虚实，了解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对颍王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颍说：“今上的奢侈，不是远远超过了周朝的天元？”又说：“修建长城，并非急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亦私议宴请启民可汗太奢侈了。他们私下的议论，有人向炀帝报告了，炀帝便以诽谤朝政论罪，将高颍、贺若弼、宇文弼杀了。高颍的儿子流放边疆，妻子没为官奴。因事牵连到苏威也被罢官。隋文帝谋代周室、

消灭南陈，高颀献智竭力，推贤举才，是隋朝的第一功臣；他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佩服。隋朝的富裕，他是出了大力的，他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贺若弼在灭南朝中立了丰功伟绩，是隋朝的开国功臣。他们被冤杀，时人都为之悲痛。

2. 穷兵黩武自作孽

古人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又说：“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这是历史教训之谈。战争是不得已的事，为正义始可战，如敌军来侵奋起反击，和救民于水火，以及老百姓被统治者压榨得活不下去只有起来造反，等等。至于非正义之战，如自恃富强而侵略别国，支持反动的战争，或为私利而煽起战火，这属于穷兵黩武，其结果，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灾祸，对于自己“自作孽”，“将自焚”。

炀帝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已弄得国弊民困，而为了示威于外族，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资治通鉴》记载了炀帝讨伐高丽的起因、战况及其后果。初，中国与高丽两国之间，太平无事，而后来双方发生战争，咎由炀帝，是他示威于外族和强迫高丽王臣服而引起的。有一次，炀帝到启民可汗帐，适这时高丽使者在启民那里，启民不敢隐瞒，便带高丽使者拜见炀帝。炀帝使人宣旨说：“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到其帐。明年当到涿郡，你回去告诉高丽王，勿自疑惊，当效法启民。如不来朝，将带启民和率大军前往高丽巡游。”高丽王惊，不敢来朝。于是，炀帝就做讨伐高丽的准备。先是，强迫天下富人买武马，购置器仗，务要精新，如不遵命照办，立即斩之。接着下诏讨伐高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负责造船，共造大船三百艘，派官吏严加督役，造船匠日夜立于水中，不敢休息，自腰以下都生蛆虫，有十分之三四死了。公元611年四月，炀帝车驾到涿郡，住在临朔宫。在这以前已下诏征召天下兵，不论远近，都集会于涿郡。又征召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镞（凿冰工具）手三万人。于是，被征召的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向涿郡奔流，又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以载运衣甲幔幕，由兵士自挽之；并征召河南、北的民夫转运军需。又征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洛口等仓米到涿郡。载兵甲及攻战工具的各种运输船首尾相接，长达千余里。而日夜往还在路中的常有数十万人，途中死人相枕，臭气熏天，天下骚动。仅在山东一郡，老百姓的遭遇已够悲惨，炀帝征民夫运米积于沪河、怀远二镇，车牛前往的都不能回来，士卒死伤过半，使农耕失时，田地多荒。粮食大都供应军队，人民饥饿，谷价暴涨，尤以东北边疆地区为甚。如所征粮粗，令老百姓买新的偿还。又征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运米三石，因路途险远，民夫干粮不够吃，途中已吃光，惊罪都逃亡。加上官吏贪残，乘机加码侵掠，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分守己的挨饿冻死，抢劫则犹望延生，于是，纷纷铤而走险。王薄聚众据长白山，知世郎在齐、济两郡之间聚众起事，作《无向辽东浪死歌》相号召，逃避征役的多往归附。刘霸道在平原东聚众十余万。在起事者中，尤以漳南人窦建德最得人心，他能帮人解决困难，且胆力过人，为乡里所拥护，对炀帝西征东讨，人民厌弃，他认为“天下心大乱”，便聚众起事。因其倾身下士，与士卒同甘苦，人争附之，乐于效死。全国各地起义的不计其数。

人民纷纷起义，实是反战，而炀帝下以为意仍摧四方兵集涿郡，计有一

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而从事后勤的人加倍。分左十二军，右十二军，日派一军出发，各军相距四十里，四十日军才出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相接长达九百六十里，史称为“近古出师之盛，前所未有”。各军陆续进到辽水，临水列大阵，高丽兵阻水拒守。初战，隋军胜，高丽兵败退。隋诸军乘胜进围高丽城，即襄平城。炀帝告诫诸将：“凡军事进行，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权。”辽东数出战不利，便坚守。辽东城将陷，守将请降，隋诸将不敢自专，派人上奏，得批文到城中时，高丽军守御已备，久攻不下。左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水军直指平襄城，与高丽兵相遇大破之，便领精兵四万直临城下，被高丽伏兵打败，来护儿与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其他各军粮将尽，士无斗志，且将帅不能自决，事事要奏炀帝批准才能行动，因而被动挨打。当高丽兵发动反攻时，纷纷溃败。初，九军渡辽水，共三十万五千人，及回到辽东城，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以亿计，都丧失了。炀帝只能领残军撤回，隋军第一次伐高丽的战争以惨败告终。但是，炀帝不甘心失败，公元613年（大业九年），炀帝又下诏征召天下兵会集涿郡，发动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这时各地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多的十余万，少的数万人。趁炀帝陷于高丽战争和人民大起义之际，杨玄感在后方举兵起事，炀帝只好回师。以后炀帝虽还想要征高丽，但已力不从心了。

杨玄感举兵起事，表明隋朝统治者内部公开分裂。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杨素是隋朝开国功臣，又因支持杨广夺位有功，继续掌握大权，故深为炀帝所忌，早想设法地除之。素死，炀帝对近臣说，“素不死，终当灭族。”玄感也知此事。因见朝政紊乱，炀帝猜忌，内心不安，且其累世显贵，在朝文武多是其父故吏，而玄感这时已成为关陇集团的头头，便与诸弟谋叛乱。炀帝征伐，玄感自荐“愿为将领”，炀帝高兴说：“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这话不虚。”由是宠遇日隆。炀帝第二次征伐高丽，任玄感在后方督运军需。玄感故意迟运，使渡辽诸军乏食。玄感见炀帝陷身绝域，四方起义，便起兵造反。他对其众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乱，死于辽东的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民困，何如？”众皆欢呼万岁。时李密为玄感谋主，提出三策，上策是起兵断炀帝归路，高丽兵必蹙其后，前后夹攻，可不战而擒。中策是直取西安，据险守而徐图之。下策是袭取东都，如不能克，天下兵到会处于危地。而玄感认为李密的下策实为上策，便率军向洛阳，结果正如李密所说：“天下兵到会处于危地”，玄感终被打败。炀帝回洛阳后，大肆屠杀参与叛变的人，共杀了三万人，流放六千余人。炀帝认为在北方多敌不可靠，便率兵到江都，因他曾是灭南陈主帅，南人多归之，成为其主要骨干，而北方将相多为其父文帝之臣，大都为其所杀，故忌北人而亲南人。由于炀帝为人残暴独裁，忠贞之上多被杀戮，得其宠信的大都是佞臣，而这些人善于看风转舵，跟他并非一心。他在江都只不过是孤家寡人而已。

3. 众叛亲离被缢死

残暴的封建帝王总是怕死又愚蠢的，总想永远享受荣华富贵，因而都寻求不死药，秦始皇如此，隋炀帝也如此。河南郡嵩高山有道士潘诞，自称已三百岁，为炀帝合炼金丹，炀帝封他官阶三品，为他建嵩阳观，有华屋数百间，给他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供他使唤，给数千人供他驱使，所费巨万。潘诞说炼金丹要用石瞻、石髓，便使石工凿嵩高山大石深百尺的有数十处。

潘诞炼了六年，金丹炼不成。诞说：“没有找到石胆、石髓，如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这时，炀帝才知受骗，将他斩了。世上并无不死之药，即使有他也活不了，对如此暴君，人们是不会让他长命不死的。暴君多活一天，人民多遭殃一天。

得到炀帝宠信的人，大都是顺意取宠，有的就外表忠顺暗中图之。如他最宠信的文臣有三人，即虞世基、裴蕴、袁充。这三人都原在南陈当官，陈灭后归附隋。他们都善揣摩炀帝的所思所为，顺而媚之。虞世基掌机密，知炀帝厌听叛乱之事，虽下边告急，也不如实反映。裴蕴知炀帝不欲听反面意见，他任御史大夫，其处理罪犯的轻重都随炀帝意，不管是非。袁充对炀帝每次出征，事前都已探知，便假托星象，鼓励其出征。正因这三人都极尽其谄媚之能事，才得到炀帝的充分信任。而这些人恰恰为炀帝帮了倒忙。这是残暴独裁的统治者自招的恶果，对于炀帝信任的武将也如此。如王世充、西域胡人，父死母嫁霸城王氏，故姓王。世充读过些经史书籍，也喜欢读兵法，因军功升江都宫监。炀帝数次到江都，世充善察炀帝颜色，阿谀顺旨，每入奏事，炀帝称善。为媚炀帝，在江都宫室，雕饰池台，搜集珍物，以博炀帝欢心，由是更得亲昵。世充外媚炀帝，暗怀野心，他知隋政将乱，阴结豪杰，多收群心，有犯法的，枉法释放，以树私恩。炀帝派他领兵与孟让相拒于盱眙，世充佯输，让轻而不备，被其大破，让带来十数万兵，只领数十骑逃走。炀帝以其有将帅才，委之重任。突厥启民可汗围炀帝于雁门，世充从江都起兵赴难，他在军中蓬首垢面，悲泣无度，日夜不解甲，铺草而卧，炀帝知道了，以为忠，给予军事重任。后正是此人，夺取了炀帝死后在长安所立的杨侗的帝位（《旧唐书·王世充》）。宇文文化及是炀帝的屯卫将军，炀帝为太子时，他是其心腹，故甚得炀帝信任。在江都事变中，他被拥为头头。炀帝正是死在他的心腹的手上。事情经过是这样：

炀帝到江都后，荒淫益甚，宫中有百余房，每房住一美人，每日令一房做主人，炀帝与肖后及其从姬都跟随宴饮。炀帝天天酒杯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但炀帝见天下大乱，内心不安，对肖后说：“外间有不少人要图依，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依可为长城公，卿为沈后，欢饮再算！”所说“长城公”即陈后主叔宝，沈后即叔宝后。炀帝以为被俘只不过当个亡国君，还可蒙耻偷生。可是，有时他也怕被杀，醉后对镜自照，对肖后说：“好头颈，谁来砍之！”肖后惊问其故，炀帝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炀帝料不到的是，砍他头颈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心腹。炀帝见中原已乱，不敢北归，想迁都丹阳，据江自保。炀帝有禁卫军数万人，都是精选勇猛敢死之上充当的，称为“骁果”。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是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炀帝不想西归，多谋叛逃归。郎将窦贤率所部西走，炀帝派骑兵追斩之，而逃亡的不断。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素为炀帝宠爱，派他领骁果驻守于东城，德戡与其相好相谋，认为反正骁果要逃，不如与他们同去，以免获罪。这时，禁军将士都公开谈论逃亡之事，无、所畏避。有宫人告诉肖后：“外间人欲反。”后说：“可向帝奏。”宫人告知炀帝，炀帝大怒，以为非所当说，斩之。其后宫人有将谋反事告肖后，后说，“天下事已如此，无可救了，不必说了，说了只能使帝担忧！”以后再没有人说了。司马德戡已与一些将领商量好准备结党西逃。其中有杨士览，他将这事告诉其舅宇文智及，智及大喜说：“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乱的已有数万人，不难举大事。”德戡等赞成，便公推智及兄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为主。于是，江都兵变终于

发生了：德勤等率军自玄武门入，炀帝知道叛乱，换便服逃到西阁。骁果入永巷，问：“陛下在否？”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炀帝映窗扇对行达说：“你要杀我？”答：“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归。”便扶炀帝下阁。虔通，是炀帝还是晋王时的辛信左右，炀帝见他，说：“卿不是我的故人么！何恨而反？”答：“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西归。”炀帝说：“朕正想归，因上江米船未到，今与你归。”虔通派兵守之。天明，虔通要炀帝上朝会百官，虔通让炀帝乘马，他执辔挟刀引出宫门。宇文文化及扬言：“何必带他出来，毒死好了。”虔通引炀帝到寝殿，虔通、德勤等拔白刃侍立，炀帝叹气说：“我有何罪？”叛党文学说：“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炀帝说：“我实负百姓，至于你们，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谁为首？”德戡说：“普天同怨，何止一人！”便缢杀之。这便暴君隋炀帝的结局。

二、唐兴经验

隋亡的教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鉴诫，前车之鉴，使后人不再沿着它的覆辙走去。唐太宗李世民始终以隋亡为鉴诫，反其道而行之，故在武功、文治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下面，我们总结的是他创建唐王朝主要的成功经验。

1. 得人心人乐效死

能聚众始能举事，而得众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隋末，天下乱起，正是英雄逐鹿之时，李世民暗中准备义举。他“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及其起兵，所经之处，不扰民，对百姓来劳军，一无所受；军令严明，秋毫不犯，敌人心归附。在与群雄逐鹿中，重视选贤任能，虚心下士，诚信待人，得文臣武将之心，乐于效死。谋主房玄龄、杜如晦尽智报效，来自敌营的骁将尉迟敬德、秦叔主、程知节效死沙场。

李世民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都与房玄龄、杜如晦为之划策有关。玄龄幼聪明，稍长博览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见炀帝“竟崇淫侈”，认为“难以保国”，预言“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十八岁中进士，任隰城尉。李世民起兵经渭北，玄龄到其军门求见，向其献策，因其有卓见，世民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因感世民知己，竭智尽力相报。在秦王李世民芟除群雄的战争中，众人所竞求的是珍玩珠宝，只有玄龄为世民搜求人才；与秦王府的谋臣猛将深相结纳，勉励他们为秦王尽其死力。因其功劳卓著，唐太宗即位，论功行赏，评其功一等。唐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眼，说：“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评功臣第一，臣实不服。”太宗说：“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叔父不能与功臣同赏。”后房玄龄被图形于凌烟阁以记其开国的功勋，太宗对他的评价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旧唐书·房玄龄列传》）如晦原任隋滏阳尉，不久弃官归去。李世民平京城，他投在其麾下，被任为参军，房玄龄很赏识其人。当时秦王府多英俊之士，不断被外调，杜如晦是其中之一，他将调为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大王如欲图天下，非此人不可。”

世民大惊悚：“你不说，几失此人！”立即挽留不让他走。后从征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他都参谋帷幄，而这些战役的胜败都决定唐的兴亡，可见其功不小。当时军国多事，李世民向其请教，他剖断如流，多所贡献，因而深为同僚所服（《旧唐书·杜如晦列传》）。由于李世民对他俩言听计从，充分信任，故能发挥其才能以报。

李世民率军南征北伐，冲锋陷阵，每战必胜，也由于其麾下骁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乐于效死。这些人原都是敌营的人，为何弃其主而投到李世民的麾下？又为何从此死心塌地追随李世民，且下为敌人重金所收买？这无他，一是他们敬佩李世民，知其能成大事，自己能成功名；二是李世民以诚信待人，结之以恩，故他们乐于效死。所以他们始终对世民铁心不移。例如，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想谋害秦王世民，企图收买敬德为内奸，秘密致书给敬德，要与他建“布衣之交”，并赠送给他金银器物一车。敬德回书辞谢说：“敬德出身微贱，适逢隋亡，天下大乱，窜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蒙秦王赐以生命，令名属秦府，当以身报恩。敬德对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如果私许殿下，便是二心，殿下要这样的人有何用处？”建成接书大怒，从此，彼此关系断绝。敬德将这事告知世民，世民对他说：“却金拒交，知公情不可移。以后送金照取，不必顾虑。不然，恐公身不安。”果然，元吉等因深忌敬德，派人行刺。敬德知了，打开门户，安卧不动，刺客多次到其庭中，知其有备，惊其勇，不敢入。行刺不遂，元吉便向唐高祖谗毁，下诏逮捕敬德审讯，判死罪，太宗坚谏才得释放。敬德明知拒绝太子、齐王收买，自己将处于危地，但他对秦王世民的忠心始终不变（《旧唐书·敬德列传》）。

2. 临机果断庙算胜

纵观《旧唐书·太宗本纪》，唐起兵和西指长安及其芟除群雄的关键战役，莫不由于李世民能临机果断，作出英明的决策。这是否都出于太宗个人的英明果断，还是其集众智成大智，即倾听众人的计谋后才作出决定呢？史书只写前者，没有提及后者。但是任何智者只是独断而不听别人意见，每事都能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是罕见，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唐太宗即位后的言行中，说明他并不独断独行，而是兼听纳谏，正因此纠正了他的许多错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取得“贞观之治”。这时，他的言行及其兼听纳谏的事迹能详细记录下来，因为他这时已即皇帝位，有史馆照实为之笔记。他在此以前取得辉煌的武功，显然也是有英才辅佐他为之出谋之故。在这个时期，他初是公子后是秦王，他与所属的言行无人为之记录，故五代后晋时史官所修的《旧唐书》关于太宗前期的活动也就写得较简单。不过，笔者断言其集众智成大智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从他对房玄龄、杜如晦的评价中，足以证明。他曾对待臣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玄龄是谋臣，其功如此之高，当然是因为他出定天下的奇策。《后唐书·杜如晦列传》称，杜如晦“从征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尝参谋帷幄。”这两位谋臣都在起兵之初就投在李世民麾下一直到其即帝位，始终是与他“周旋艰险”“参谋帷幄”的，他们作战谋略都与他们谋而后定的。当然，有众智而不能集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智虽多也无用。唐太宗超过其同时代群雄之处，正是由于他能临机果断，做出正确的决策，故能庙算胜。

这是他亲自领导的战役都能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隋末，天下大乱，炀帝留江都，时李世民父亲李渊为太原留守，世民便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李渊举义兵，直捣长安，以号令天下。初，李渊犹豫不决，经世民多次规劝才起兵。大军到贾胡堡，被隋将宋老生率二万精兵所阻，又久雨粮尽，李渊拟回太原，再图后举。世民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只能进而不能退，因为退“则众散于前，敌乘于后”，只有死路一条。并以哭谏，李渊乃罢退军之议。后雨止，世民诱宋老生出战而斩之，大军顺利挺进长安。炀帝在江都被缢杀后，李渊受杨侗“禅位”，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唐。

当时割据金城（今甘肃兰州市）称帝的薛举，起兵进逼高塘，秦王世民率军相拒，深沟高垒不与战。适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且告诫他俩说：“薛举孤军深入，食少兵疲，如来挑战，慎勿应战，待我病好，为君等破之。”开山对秦王部署有不同意见，他回来后对文静说。“王担心你不能对敌，故这样告诫。今敌知王病，必轻我，应用武以威之。”文静也赞同，便列阵于高塘西南，自恃人众而不设备。举潜师掩袭其后，战于浅水原，八总管都被打败，高塘被攻陷。这次战败，都因开山、文静违反秦王的作战部署。在病中的秦王，只好令唐军退回长安。薛举死，其子仁果继位，众心猜惧，上下离心，秦王便率军到高塘，伺机击之。仁果派宗罗率军相拒，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世民说：“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势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胜。”便向全军下令：“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其将梁胡郎等率所部来降。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令行军总管梁实扎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攻之甚急，世民料敌已疲，对诸将说：“可以战了！”明早，世民率大军反击，罗军溃逃。世民亲率二千余骑追之，其舅父宝轨叩马苦谏说：“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说：“破竹之势，不可失！”仁果布阵于城下，世民据泾水列阵，仁果骁将浑干等数人来降。仁果惊，率军入城据守。日向暮，大军继到，将城包围，夜半，守城的纷纷自城上跳下投降。仁果计穷，出降，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诸将问世民：“大王弃步兵，率轻骑临敌城下，众人都认为不能取胜，而终破敌，这是何故？”世民答道：“罗军皆陇外的人，将骁卒悍，我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如缓取，都逃回城，仁果抚而用之，则不容易取胜。急攻，则散归陇外，城中虚弱，仁果惊恐，不暇为谋，这就是我之所以取胜。”众皆惊服。这一战，终于解除西线的威胁，使甘肃一带地区为唐所有。

李渊主力渡河入长安后，在突厥支持下在山西北部建立割据政权的刘武周，攻破太原，其大将宋金刚长驱直入，直临黄河的边上，关中震惊。李渊认为，“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应弃河东之地，固守关西地区。”太宗上表反对说：“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富裕，京邑所资，决不能放弃。请给臣精兵三万，必能消灭武周，收复失地。”李渊同意，于是，李世民率军赴龙门关，履冰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与宋金刚相持。李世民坚壁不战，诸将都要求出战。李世民说：“金刚悬军千里，深入我地，精兵骁将，都聚在此。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扞蔽。士卒虽众，内实空虚，意在速战。我坚壁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后果如其言，金刚遁走时。太宗率军猛烈追击，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到高壁，总管刘弘基执轡谏说：“大王破贼，逐北到此，功劳不小，继续深入，不顾身吗？且士卒饥疲，应驻军停留，待兵粮都到，再进也不为迟。”世民说：“金刚势穷而

走，众心离散；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势取之。我尽忠为国，哪能顾及身！”便打马前进，将士也不顾饥饿，追及宋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八胜，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世民率军追到介州。金刚还有兵二万，背城布阵，南北七里。世民派总管李勣与战，稍退，为敌所乘，世民率轻骑击之，冲其阵后，金刚大败，斩首三千级。敬德、寻相率众八千来降，世民令敬德仍率原军，与军营相参。有人惊有变，劝他不要过信敬德，世民说：“昔肖王（指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人为效命，今委任敬德，又何必惊疑。”宋金刚大败，刘武周惊而逃到突厥，世民终于收复山西失地。

宇文文化及缢杀炀帝后率众西归，渡过永济渠，李密击之于童山，化及大败，向北逃窜，后被窦建德擒杀。王世充趁李密得胜将骄兵疲，采取突然袭击，打败李密，李密势穷投奔李渊，后不满给予的待遇而叛变，也为唐将所杀。这时中国北部只存下三十强大的割据政权：李渊在关西称帝，国号唐；窦建德在河北称王，国号夏；王世充据洛阳为帝，国号郑，唐、夏、郑已形成三国鼎立之势。李世民先攻王世充，率诸军围洛阳，城中守御甚严，世民四面进攻，一连近十天日夜不息，城不能破。唐将士疲惫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世民说，“东边诸州已望风降服，只有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为何弃之而去！”便向全军下令：“洛阳不破决不回师，敢言班师者斩！”李渊知了，亦密令班师，世民使人回长安陈说形势说洛阳必破，并指出：“如果回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李渊才取消回师之令。世充因危急，求救于窦建德。建德原与世充有隙，但恐唐灭郑，夏势孤，也将被唐所灭，且打算与郑打败唐后，再灭郑以图天下，便以兵十余万来援世充，进军到酸枣。封德彝等说：“我兵疲老，世充坚守难破，建德锐气正盛，我腹背受敌，不如退保新安，以待敌弊。”世民说，“世充粮尽，上下离心，不能力攻，可以取胜。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我据武牢，扼其咽喉。彼如冒险争锋，我取之甚易。如狐疑不战，一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倍增，可一举两克。如不速进，贼入武牢，新附诸城，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有！我计已决！”派屈突通等助齐王元吉围困洛阳，世民率三千五百骁骑进据武牢。建德不能前进，与唐军对峙累月，又数战不利，将士思归。世民又派轻骑抄其粮运。建德进退两难。祭酒凌敬献计说：“不如率军渡过黄河，破怀州、河阳，派使守之，然后，越太行，入上党，取山西的汾阳晋阳，趋向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建德将从之。由于世充不断派使告急，并以重金贿赂建德诸将以乱其谋，诸将都说：“凌敬书生，哪知战事！”敬固争之，建德怒，令人扶他出外。建德妻曹氏说：“祭酒说的不可违。今天王自溢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北山，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回师自救，郑围何忧不懈！如驻兵于此，老师费财，何日才能成功？”建德说：“此非女子所知！我来救郑，郑亡在朝夕，我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弃信，不可。”

世民派出的侦察回报说，“建德拟待唐军刍尽，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世民便放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诱之。建德果率众而至，自板渚出牛口列阵，绵延二十里，鼓行而进。建德列阵，自早至中午，士卒饥渴，无斗志，都坐下，又争饮水，阵列错乱。世民派宇文士及带三百骑经建德阵的西边驰驱南上，告诫他说：“贼如动，你即回兵；不动则引兵东出。”士及到敌阵前，

阵果动，世民说：“可击了！”乃挥师出战。世民率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冲其阵，所向皆靡。淮阳王道玄挺身冲入敌阵，直出其后，又突阵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蝟毛，他勇气不衰，射人，皆应弦而仆。世民给他副马，使从己。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帅史大柰、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骁将卷旆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见了，惊而大溃。唐军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杨武威擒建德来见世民，世民责他说：“我讨伐王世充，关你何事，却来犯我兵锋！”建德说：“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建德将士溃散，所俘获五万人，世民即日遣散，使还乡里。建德彝入贺，世民笑说：“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德彝惭愧。

世民囚窦建德等到洛阳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与建德语而泣。世充召诸将议突围，南走襄阳，诸将都说：“我们所恃的是夏王，夏王已被擒。虽得出，终必无成。”世充便带领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到军门投降。世民以礼接待。世充俯伏流汗。世民说：“你常以小孩待我，今见小孩，为何这么恭敬？”世充顿首谢罪。于是，率军入洛阳，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

一举降服窦建德、王世充，天下大局基本已定。

李世民在芟除群雄中，善于根据敌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临机果断，应缓则缓，该急则急。如敌兵气正锐，则坚壁不战以待敌变，敌粮尽遁走，或士气低落，则猛烈反击，乘胜追击，一举消灭之。他对薛仁果和宋金刚都是用先缓后急、先守后攻的战法。对于窦建德率大军救援王世充，他认为世充已无力反击，其亡可待，而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情，可以胜之，便确定围点打援的作战方针，故力排撤围退兵待敌变的众议，进军据武牢扼敌咽喉，待敌疲而击之，终于一举而消灭两雄，奠定了唐统一天下的基础。

3. 骁骑所向敌披靡

得人心、策略正确固然是取胜的决定性的因素，但两军相战，勇者胜，可见勇在决斗中非常重要。所谓“勇”，包括士气、武艺、武器，李世民之所以能以少击多，每战都胜，也是由于具有训练有素、勇猛善战的骑兵和众多艺高胆大的骁将。他选精锐千余骑，都穿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次战斗，世民穿玄甲亲自率领打前锋，乘机进击，或在敌前，或穿敌后，来去如飞，或在危急时突然出击，所向无不摧毁，敌人遇之，往往惊溃。

兵勇与帅勇、将勇都有关。世民既是决策者也是战斗者，能与将士共危难。他本人就是骁勇异常的猛将，精于骑射，自说是“以弓箭定天下”，他常战斗在前，退军殿后。有一次与世充作战，世充率精兵三万在慈涧列阵，世民以轻骑进击，时众寡不敌，陷于重围，左右都惊。世民命左右先回去，他独自殿后，敌将来追，世民张弓左右射之，无不应弦倒地，俘获其大将燕颀。世民率军据武牢以拒建德，他率骁骑五百，到武牢东二十余里，观察建德营寨，他使李勣、程知节、秦叔宝分别将兵伏于道旁，余下四骑跟他前进。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执弓矢，公执槊相随，敌虽百万其奈我何！”又说：“贼见我而回，是其上策。”距建德营约有二里远时，与敌游兵相遇，敌以为唐侦察兵。世民大呼说：“我秦王也。”张弓射之，死其一将。建德军中大惊，派五六千骑追之，从者惊得脸已都变了。世民说：“你们只管前行，

我与敬德殿后。”于是按辔迟行，追骑将至，世民引弓射之，死其一人。追者惊而止，止而复来，如是再三，每来必被射死，世民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杀十多人，追者不最再逼。世民迟行以诱之，引敌入其埋伏圈内，李勣等奋击，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俘获敌骁将殷秋、石瓚。

世民身边的骁将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都是艺高胆大。敬德善避稍、夺稍，每单骑入敌阵，敌将兵用稍来刺，因他善避，都不能伤他。如他与世民打猎，突然遇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世民，他跃马横枪刺雄信坠马，保卫世民突出重围，敌稍兵后来攻，都不能伤他分毫。在与建德对阵，敌将王琬乘隋炀帝骏马出阵以夸众，世民说，“真是良马！”敬德请以取之，世民止之说：“不能以一马丧猛士。”敬德不从，领三骑直入其阵，擒琬，引其马驰归。秦叔宝，每从太宗征伐，往往只身冲入敌阵，刺敌将于万众之中。程知节则每阵必先登，勇往直前。

世民亲率领这支由骁将锐卒组成的骑兵部队，往往能转危为安，制敌于死地。世民带五百骑前往观察世充阵地，与世充万余人相遇，会战，大破之，斩首三千级，俘获其大将陈智略，世充仅以身免。如与仁杲将罗 战，世民使右武侯大将庞玉列阵于浅水原，罗 倾师攻击，玉迎战，几不能支，世民率骁骑先陷敌阵，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 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

唐太宗芟除群雄的成功经验，概言之，即因其得人心、策略正确，有由骁将锐卒组成的以骑兵为核心的精悍部队。有这三者，他才能每战必胜。窦建德也得人心，但他没有世民临机果断的才能，对凌敬的计策，初从之，后被所惑而不能用，致被世民所擒。王世充亦略解兵机，但为人狡诈，不得人心，其骁将如秦叔宝、程知节等因此投奔在世民麾下，由于上下离心，终于被打败而投降。

第七章 大宋兴起

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形势开始出现，唐末分裂割据局面形成。公元 907 年，朱温篡唐，唐亡。各地节镇也先后称帝称王，开始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北方地区，先后有五个短命王朝迭相更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迭替，多不过十六年，少的只有四年，共五十三年。在南方，先后出现九个政权。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加上契丹入侵，到后周时，由于郭威、柴荣相继进行改革，政治、经济局面有所好转，在军事上已是当时割据政权中最强者。柴荣死，掌握周室军权的赵匡胤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帝位，改国号为宋。在当时，北有北汉，西有后蜀，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荆南等。赵匡胤即帝位后，平定叛乱，消灭了南方的割据政权。当他要继续进行统一战争时，不幸早死，留下了“斧声烛影”之谜。

一、和平过渡

五代十国时期，谁手中兵强马壮，谁可称王。而在每次政权更迭中，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新王都是在一片血腥中登上宝座。可是，赵匡胤高明之处是：他不是用暴力来进行残酷屠杀以威人，而是用和平手段使人心服。为了不再发生同样的政变，他同样采取和平手段，在欢饮中，从其宠将中把兵权拿过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破天荒地任用文人在其指挥下任统帅。赵匡胤从夺权到巩固政权，可以说是和平过渡。这种和平过渡，其好处有三：1. 将原周室贵族、旧臣基本上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免因分裂而削弱原有的力量，故能继承和推进柴荣，即周世宗时出现的将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2. 避免了改朝换代时出现的大肆屠杀、抢掠的骚乱，使国民经济不致遭到破坏。3. 将敌对情绪减到最低点，故能团结各种力量，对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都大有利。

1. 改朝换代不流血

据《宋书·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有谋略，善骑射，早年从军，受郭威、柴荣重用，因作战多立功勋，从一个小校逐步升到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军统帅）。及周世宗柴荣死，七岁的柴宗训继位，称恭帝。公元 960 年，忽报北汉勾结契丹入侵，赵匡胤受命出师抵御，他率兵到陈桥驿时出现著名的“黄袍加身”的事件。他在禁军的拥戴下回到京城，恭帝禅位。赵匡胤在郭威麾下时，也亲眼看到诸将“撕黄旗加身”的拥立郭威为帝的把戏，且他本人就是这次事变的主要支持者，他将之重演就更得心应手了。不过，其独特之处，是没有出现过去改朝换代人头纷纷落地的惨状，一切按照他精心策划的和平过渡。在将兵拥戴他为帝时，已与之“约法三章”，不得惊犯太后、幼主，不得欺凌大臣，不得侵掠朝廷府库、士庶之家。由于赵匡胤在任禁军统帅六年中，他善于团结将兵，其威信极高，说的话是算数的，他的“约法三章”得以执行，使京城如常，上下安泰。

这种和平过渡，当然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的。诸将拥赵匡胤回京后，他先令将士回军营，自己则退居公署，由别人出面来表演。不久，诸将拥宰相范质等到，赵匡胤见了他们，痛哭流泪，假惺惺他说：“违负天地，今至

于此！”意是说要代周不是其本意，是众将拥逼所致。范质等互相注视，不敢说什么，这时军校罗彦瑰举刀加在范质颈上说：“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赵匡胤叱彦瑰，彦瑰不退，范质等不知所措，在这种形势下，只好跟同来的大臣王浦、魏仁浦等下阶跪拜，并召来文武百官。翰林承旨陶穀就从袖中取出周恭帝禅位的诏书来宣读，由宣徽使引赵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之后，扶赵匡胤升崇元殿，穿上皇帝服冠，即皇帝位。并迁恭帝及符后到西宫，改其帝号为郑王，尊符后为周太后。对于原周朝官员，仍然录用。

宋太祖对于原宗室及旧臣，有的大臣职位虽不降但不给实权，在生活上就多赏赐，以安其心。如他即位之初，仍任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以免引起旧官员的疑虑。但却是逐步削减其权力。如范质虽加兼侍中，却罢免其在枢密院的职位，不让管军国大事，只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如有一次到范质家，则赐黄金二百两、银器千两、绢二千匹、钱二百万。太祖最信任的谋主赵普则位在范质等之下，职任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职虽不高，但得参预军国大事。范质等在物质上得到满足，自知非赵匡胤心腹之臣，知其倚靠谁，故也顺意推荐，上书认为赵普精通治道、公忠于周，可堪重任。范质对赵匡胤小心谨慎，唯恐得罪。宰相见天子议政事，原来都命其坐下而议之，议事后赐茶才退出。唐及五代都遵守这制度。范质每奏事都写书上奏，并要求废坐论之礼，认为如此才“免妄庸之失”。范质如此自愿降低宰相地位，抬高天子的尊严，太祖当然乐得从之。当赵宋政权稳固后，就免去了范质、王溥、魏仁浦三相，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这地位虽与宰相相当，但已无过去宰相所掌握的大权。因为赵匡胤已设副相、枢密使与三司计相，以分宰相权、军国大事则都由赵匡胤直接决定。吴越王钱俶派使致书赵普，并送海物十瓶，适太祖来，仓卒间不及拿走，他见了问是什么，普以实对。赵匡胤说：“海物必佳。”就命打开，都是瓜子金。普惊得叩头说，“臣还未看书，实不知。”赵匡胤说：“受之不妨。彼认为国家事都是由你们书生来决定吧！”从打开海物到说这话，说明匡胤对赵普仍有戒心，也表现国家事并不是由“书生来决定”，他是大权在握的。

2. 防止政变的妙方

从北周的郭威到北宋的赵匡胤，他俩得帝位都是由于掌握了禁军的大权，才能先后演出“黄旗加身”、“黄袍加身”的把戏。赵匡胤曾积极参与郭威的“黄旗加身”，自己也身体力行“黄袍加身”，军权的利害，他是深有体会的。为了防止这类政变的重现，经他与赵普商议，于是出现了“杯酒释兵权”的事。“黄袍加身”是使政权和平过渡，“杯酒释兵权”是使兵权和平过渡。而和平过渡之法，主要是实行赎买政策，用优厚的生活待遇使之交出权力。在历史上，有大权才有大利，无大权则无大利，甚至连命也没有，赵匡胤却用赎买政策，改变了人们这种观念和恐惊。他对原北周贵族和旧臣一概不杀，仍给他们的虚衔和让他们照旧甚至比以前生活过得更好，既然无权而可保命，又有利可图，他们也就无怨言，安份守己了。他在北周室贵族和旧臣中实行赎买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后，便将之在禁军将领中推行。他跟自己的拜把兄弟，即禁军中的主要将领石守信等在欢饮中谈心话，他但直他说自己当皇帝后，终夕未尝安枕而卧是因恐人有“以黄袍加身”，言下之意是向这些拜把兄弟提出警告，并且把话已说得最明白不过，就是担心在拜把兄

弟中又发生政变。接着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最好的出路，即放下手中的军权，这就可让他们去“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那么，“君臣之间无所猜嫌”、是最好不过了。果然，他的赎买政策又收效了。明日，石守信等都自称有病，恳请解除他们的兵权，太祖当然立即批准，并都以“散官就第”，或去当没有掌握军权的地方官，给很丰厚的赏赐，这些人便去“聚敛金钱”，乐其天年。

“杯酒释兵权”之后，太祖立即进行军队体制的改革，将原禁军两司之一的侍卫司，为分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三衙分立，各不相属，三衙只有带兵权，没有发兵权。发兵权归枢密院，但不能直接统兵。三衙和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这对于防止禁军兵变是有作用的。

太祖吸取唐中期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强干弱枝”的策略，节度使不由武将任，地方强兵锐卒都调到禁军，由禁军驻边防，并实行更戍法，定期调换防地。

重用士大夫，且誓不杀士大夫，是太祖防止政变的内容之一，枢密院和地方长官都由文人担任。因此，儒学大兴，而儒学提倡忠君爱国，大多数士大夫对宋政权是忠心耿耿的。由于有“不杀士大夫之誓”，士大夫可不担心有杀头的危险，大部敢言敢谏，为宋王朝竭力献智，宋朝能延传三百二十年之久，与此未尝没有关系。

二、恩威并济

赵匡胤能顺利进行和平过渡，还有赖于他掌握了强大的禁军，且他在禁军中威信极高，将士听其指挥。而恩威并济，是他实行和平过渡和统一战争的既定方针。有恩无威，敌人不怕，不会自愿亡国而接受他的恩；有威无恩，敌人除了拼死抵抗外，别无他择。正因太祖在进行统一战争中，恩威并济，因而能减少抵抗力，顺利地降服南方割据的政权。在其生时，已基本实现中国的统一。

1. 对叛者先拉后打

“先安内后攘外”，这是一切统治者处理内外事的次序。因内部不安要征服各割据政权，是难成功的，且招致祸乱。故太祖取得帝位后，即着手安内，对原周室贵族官员，或封官许愿，或赏赐财物，即使对叛逆已露的也尽力拉拢争取，不得已才用武力镇压。也因此，大多都归附。但也有三人不服，其中有二人起兵反抗，赵匡胤在争取无效的情况下，便亲自率军镇压。

《宋史》特将此三人称“周三臣”，另立传。因这三人忠于周，义不归宋，故有此名。

“周三臣”中的一人是韩通，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是周世宗柴荣的亲信之一，他没有附属赵匡胤。他的儿子幼时便驼背，人们称他“橐驼儿”，他人虽残废，却颇有智谋，见赵匡胤有野心，劝通早做防备，通不听。及闻陈桥兵变，通措手不及，急从殿阁逃奔回家，于途中遇太祖的心腹、军校王彦升下途，鞭马追逐，通刚入家门，还来不及关门，便为彦升所杀，其妻子也被杀死。太祖知通被杀，虽怒斥彦升专杀，但也不加罪。只是对通的死表示哀悼，追封他为中书令。通的被杀，说明赵匡胤策划陈桥兵变前已

布置其禁军心腹监视不附己的人，故彦升一发现通逃归，疑其组织反抗，便将之杀了。太祖追封通中书令，只不过是安人心的一种策略而已。

另一个起兵反抗宋太祖的是后周开国功臣李筠。这时，李筠以昭义节度使名义镇守洛洲（今山西长治）。太祖即帝位后，给他加官，兼任中书令，派使告知已受周禘，筠原想拒命，因左右劝谕，才勉强下拜受命，但貌不恭。及置酒宴请使者，他取周祖画相悬在壁上，放声大哭，其左右惊恐，告使者说：“令公醉酒性乱，请勿见怪。”及北汉刘钧以蜡书约筠共举兵，筠虽上书告知，而心已蓄异谋，太祖回诏抚慰。其子守节为皇城使，知其谋，尝哭谏，筠不听。太祖对守节说：“听说你谏你父，你父不听，我今杀你，不如派你归告你父，我下为天子时，任他为自之；我既为天子，为何唯独不愿做我的臣下呢？”守节回去将此意告知其父，而药谋愈甚，遂起兵，令幕府所写檄文，辞多不逊。从事间丘仲卿献策于筠说：“公以孤军举事，其势甚危，虽倚河东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宋军将勇兵锐，难与争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以争天下，这是上策。”筠说：“我是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如兄弟，禁卫军都是我的旧部，知道我来，必倒戈归我，何况我有儋圭枪、拨汗马，何忧不胜！”儋圭，筠的爱将，有勇力，善用枪；拨汗，筠的骏马，日行七百里，故筠以这两者自夸。筠还请刘钧来授，钧只领数千兵来，筠以臣礼拜见，见兵少，甚后悔。但已起事，只得起兵，留其子守节守上党，引众南向。赵匡胤知筠起兵，立派兵扼其隘，阻筠下太行，自率兵亲征。在泽南破筠众三万，降者三千余。筠走保泽城，太祖亲督战围其城，筠赴水死，进而围上党，守节投降，太祖释其罪，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任为单州团练使（《宋史·李筠列传》）。赵匡胤因其子守节曾劝其父并以城投降而释罪封官，这说明不因父有罪而连及其子，而是分别对待，即有罪的罚，立功的赏。

接着起兵反抗的是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福庆长公子的儿子。重进年长于世宗，及周祖病危，召重进受顾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赵匡胤即帝位，以韩令坤代他的侍卫都指挥使的职位，而加任他为中书令，并命他移镇青州，重进与匡胤共事周室，分掌兵权，常心忌匡胤。匡胤为皇帝，他更不自安，及使他移镇，更为疑虑，便心怀异志。太祖知其疑惧，派使赐其铁券，即有罪不杀，以安其心。重进欲随使者入朝谢恩，因被左右所惑，犹豫不决。又自以为是周室近亲，恐不得全，遂扣留使者，筑城池，缮兵甲，并求援于南唐主李景，李景却将其谋转告太祖。监军安友规常为重进所忌，便越城将其谋告知太祖。太祖派兵进军扬州。太祖对左右说：“朕对于周室旧臣无所猜间，重进不体会朕心，心中不安，朕当前往慰抚。”遂亲征。到扬州城，即日攻入。重进举族纵火自焚（《宋史·李重进列传》）。

2. 借路途一箭双雕

太祖镇压李筠、李重进的反抗后，就开始考虑统一天下这个大问题。《宋书·赵普列传》记载：太祖经常微行拜访功臣家，所以，赵普每次退朝回家，不敢换便服。一日，天下大雪，又已入夜，普想太祖不会出来了。过了很久，听到叩门声，普急忙出去，见帝立风雪中，普慌忙迎拜。太祖说：“已约了晋王。”一会儿赵光义到，君臣三人坐着褥子，在堂中围着红红的炭火，吃

着烧肉，赵普的妻子斟酒，太祖称他为嫂子。太祖跟赵普谈他准备攻打太原的事。普说：“太原当西北二面，攻下太原，契丹之患则由我们来对付了。不如等消灭了南方各国，北汉这弹丸之地，还能逃到哪里去？”太祖笑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刚才所说想试探你的想法”（《宋书·赵普列传》）。史称“雪夜定策”，确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图天下的方针。

当时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政权军事力量较弱，占领荆湖，可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下南汉。适湖南周保权因被其大将张文表所攻而向宋求援，太祖便决定假道荆南进军湖南，以消灭这两个割据政权。湖南原由周行逢割据，太祖即位，加兼中书令，名虽归附，实自行其是。行逢临危，托其十一岁的儿子保权于诸将校说：“我部内凶狠者已略杀尽，只有张文表还在，我死，文表必作乱，诸公善保我儿，不要把基业丢了。必不得已，当举族归宋，无令陷于虎口。”行逢死，张文表果叛，起兵欲灭周氏。保权乃向太祖求援，荆南高继冲也将此事上报。因继冲也接受宋给予荆南节度使的任命。太祖为援保权，下诏要求荆南派水军三千人赴潭州。继冲即派亲校李景率军前往。慕容延钊奉太祖命率十万大军假道荆南时，继冲以牛酒劳师，自知力不如，开门纳宋军，派人向太祖奉表纳土。宋大军未到潭州，文表已为保权之众所杀。保权诸将惊宋军袭取湖南，出军于沔州南企图抵抗，但一战而溃，其大将汪端带保权及其家属弃城逃亡，匿藏在山洞内，被宋军所擒。保权到京师，上章待罪，太祖下诏释放，赐衣冠、金银和房屋，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后又升右羽林统军。还修建其父行逢之墓（《宋史·保权列传》）。

3. 伐西蜀师出有名

取荆南、湖南后，宋太祖讨伐的下一个目标是西蜀，但隐而未发。西蜀割据者孟昶见太祖下荆、湖，欲派使进贡，其大臣昭远等固止之。他派赵彦韬等到京师做间谍，彦韬却将昶与北汉刘钧蜡丸帛书送给太祖，其书说要与北汉联合代宋，太祖看了书说：“我师出有名了。”立即命忠武军节度使全斌率禁军三万人，并与诸州兵二万人分路讨之。并使人画西蜀地势、兵寨、戍守远近等等，以授全斌等。太祖问：“四川可取否？”全斌等对说：“臣等仗天威，遵庙算，刻日可定。”龙捷右厢都校史延德上前奏道，“西川一方，倘如在天上，人不能到，则无可奈何。如在地上，以今之兵力，到即可平。”太祖壮其言，高兴他说：“你们果敢如此，我何忧？”又对全斌等说：“攻克城寨，只取其器甲粮草，钱帛要分给战士。”宋军到，孟昶派王昭远等率兵拒战，昭远等相继被擒。孟昶大惊，出金帛召募兵，令其子玄喆领兵去守剑门。玄喆素不习武，他离开成都时，带姬妾、乐器及数十伶人，途中日夜嬉戏，不理军政。他到绵州，听说宋军已破剑门，就逃归东川，所经过的地方，把庐舍仓廩都烧了。昶更惊恐，向左右问计，有老将斌认为宋师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固守以老宋师。昶说，“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矢。今如固垒，何人为我效命？”于是上表请降。太祖回诏说，昶如能知错，痛改前非，将自求多福。

孟昶便举族与官属由峡江而下，将到京师，太祖命其弟光义到近郊迎接。太祖登崇元殿，备礼见之，赏赐甚丰。又派人到江陵、凤翔赐其家属钱帛，有病的给以医药治疗。即日宴于大明殿。在先，已下诏有司于右掖门外，临汴水起大屋五百间以待昶，供帐全备，至是赐之。又为其官属各建住屋（《宋

史·孟昶列传》)。

4. 征南汉救一方民

在消灭西蜀政权后，南下南汉已成破竹之势。因南汉统治者刘 昏庸，国力衰弱，是不能抵御宋军的。

刘 委政宦官，日与宫人、波斯女等游戏。内官多到七千余人。群臣有小过及士、释、道有才能可备问的，便将其下蚕室将之阉割，令得出入宫闱。对于百官，则视为“门外人”。用刑机酷，有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刑。赋税繁重，穷奢极侈。建离宫数十，常游乐累月不返；仅作诸淫巧，就日费数万金。宋军破郴州，俘获其内官十余人，有一个名叫余延业的，太祖问他：“你在岭南当什么官？”答道：“当随驾弓箭手官。”给他弓矢，延业极力控弦却开不了。太祖因而笑问 治蜀情况，延业便详谈其极奢侈而残酷的事迹，太祖惊骇说：“我当救此一方之民。”

太祖将征伐西蜀前，想促令其自动投降，以免用干戈，便使江南主李煜写书劝谕 向宋称臣。 得书拒绝，回答煜书，言甚不逊，煜将其回书转给太祖。太祖便派潭洲防御使潘美等率兵讨伐。宋师连续攻破贺州、昭州。宋师攻韶州， 都统李承渥率兵数万列阵于莲华山下。 教象为阵，每只象载十数人，都执兵仗，凡战必置阵前，以壮军威。潘美见了，便派强弩手射之，象惊奔，乘象的都坠下，反践踏李承渥军，致大败，承渥仅以身免。之后，宋师先后破英州、雄州，进逼广州。 惊恐，取船舶十余艘，拟载金宝、妃嫔下海逃亡，还未及行，他的宦官乐范与卫兵千余已偷船舶先逃走了。只好乞降。城既破， 尽焚其府库。美擒 送京。太祖释其罪，授予右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

很胖，有口才，性绝巧，尝以珠结鞍勒为戏龙之状，极其精妙，以献太祖。太祖将之交给诸宦官看，都敬佩其手工之巧，就以钱一百五十万给其值。太祖对左右说：“ 好工巧，习以成性，倘能以习巧之勤移于治国，哪能亡国呢？”（《宋史·刘 》）

5. 降南唐软硬兼施

太祖即位后，南唐经常进贡，以求宋军勿南下，苟延残喘。李景死，李煜继位，进贡更勤。其继位那年，即上表述其继位并非心愿，并派使进贡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纱罗缯彩三万匹。以后未有婚丧事都进贡，对宋军打胜仗，必遣使犒师修贡。南汉平，煜惊，上表，自动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赐诏，直称其名，并将其所属官品级也顺次降低。李煜对宋，虽外示畏服，实内修兵备。太祖虑其难制，其弟从善来进贡时，令其谕煜来朝，煜只进贡而不从命，后又下诏，令其来朝，煜称病不奉诏。

于是，太祖派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曹彬等率军征代南唐。行前，太祖告诫说：“卿到彼慎勿暴略，可示以兵威，俾自归顺，不必急攻。”煜初闻宋将起兵，甚惊惶，派使贡绢二十万匹、茶二十万斤及金银器用、乘舆服物等。但宋军不因此而停止不进，攻破池州后，又破其众二万于采石矶。在宋起兵前，江南进士樊若水就亲到京城献策，请造浮梁以渡江。议者以为古

未有作浮梁渡大江的事。太祖使人制作，在采石试渡，如行于平地。煜听说宋造浮梁，告诉其臣张洎，洎对说：“从古以来，长江无造浮梁渡江之事。”煜笑说：“我亦认这不过儿戏罢了。”及宋师渡江，李煜还在梦中。而宋军临城下，煜还一无所知。一日登城，见宋军旌旗遍野，才大惊，急召朱令斌到上江，令连巨筏载兵数万人顺流而下，以断浮梁。未到，被宋军所破。又召募勇士五千余人，谋袭宋军，因素不习战，在夜间来攻袭宋军北寨，宋军待其到，将之全歼。宋军攻入金陵，煜率其近臣迎拜于门。曹彬以李煜并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上献。太祖释之，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宋史·李煜传》）。

6. 以恩结吴越效力

这时，南方只剩下吴越，因其主钱俶臣服，经常进贡又效力，故太祖另眼相看，以恩结之。

太祖一即位，俶即以白金万两、犀牙各十株、香药一十五万斤、金银真珠、玳瑁器数百来贡。不久，又派幕史黄夷入贡，太祖对他说：“你归去说给元帅，应常练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兴兵讨代，元帅当助我，不要惑于人所谈阶‘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特命有司建造很大房屋于薰风门外，绵延数坊，建筑宏丽，各种家俱无不全备，太祖对送贡的吴越进奉使钱文莹说：“朕数年前已在城南建离宫，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及你主，谁先来朝就赐给谁住。”宋军出师征伐，钱俶常派兵助战。因其助宋有功，太祖使人告谕钱俶说：“俟平江南，可来与朕相见，”后俶果率其妻子和平江军节度使来朝见，太祖派皇子德昭到睢阳欢迎和慰劳。俶到，让他住在礼贤宅。太祖在崇德殿接见，俶进贡白金四万两、绢五万匹。即日，太祖宴钱俶于长春殿，俶又贡白金二万两、绢三万匹、乳香二万斤。祝贺平定江右，又贡白金五万两、钱十万贯、绵一百八十百两、茶八万五千斤、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药三百斤。太祖车驾到其住处，又贡白金十万两、绢五万匹、乳香五万斤，以助郊祭。钱俶就是这样不断大量进贡和经常派兵效力，才得到太祖的信任。

太祖也给钱俶以殊荣，下诏称其国，并特赐其“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封俶妻为吴越国王妃。宰相以为异姓诸侯王妻无封妃之事，太祖说，“行自我朝，以表对其异恩。”太祖数请俶与其子惟濬宴射苑中，只有诸王参加。每次宣谕俶，俶拜谢，多令内侍扶起，俶感动得流泪。一日召宴，只有太祖弟晋王光义和儿子秦王德芳侍坐。酒酣，太祖令俶与光义、德芳叙兄弟之礼，俶伏地叩头，涕泣固让，乃止。令俶归国，说：“南北风土不同，渐及炎暑，卿可早回。”俶感动得哭泣说愿三年一朝，太祖说：“路途遥远，可待诏旨才来朝见。”太祖在时，钱俶仍任吴越国王。因其已臣服，并不派兵征伐，一直到宋太宗时，同意他自动请解除国王和元帅的称号，并接受其纳土归朝（《宋史·钱俶列传》）。

在平定南方后，宋军曾两次征北汉，一次由太祖率军前往，因有契丹之助，没有成功。其弟匡义继位后才平定北汉。之后，西夏和金起于北方，与宋朝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北宋没有完全实现中国的统一。

第八章 元主中原

蒙古在漠北崛起时，中国大地上有宋、金、西夏三国鼎立。蒙古原是金的藩属，及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被尊为成吉思汗后，曾两次大举攻金，前锋直抵黄河北岸，一度占领金中都（今北京），后又率兵攻灭西夏。成吉思汗临死时，留下了假道南宋以灭金的遗言。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继位，按照成吉思汗的遗言，联合南宋攻金，终于灭金。金亡，南宋也就暴露在蒙古兵的刀刃下，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位，改号为元，随即挥师南下，消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

一、金宋之亡

金、宋长期对立，金是宋的世仇。金兵常侵宋，宋每战多败。公元1127年，金兵南侵，攻陷汴京，俘虏徽宗、钦宗，北宋灭亡。这时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即帝位，创建南宋王朝。赵构畏惧金兵，只求偏安江南，后与金订“绍兴和议”。割弃秦岭、淮河以北的土地，向金称臣，每年向金贡银、绢二十五万。后金常南侵，宋多妥协，金、宋也互相削弱。蒙古则利用其矛盾。先灭金后灭宋。而宋、金之亡，主要是由于失政和战略上犯了错误所致。

1. 腐化是衰亡预兆

一个国家之亡，虽有其种种原因，但大都起因于统治者的腐化。而每当这个国家的政权出现腐化的现象，如果不及时制止，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也就预示着这个政权将趋向衰亡。宋、金末代王朝就是这样。

由于蒙古不断南侵，金军屡战屡败不能抵御，金宣宗便从中京（今北京市）迁汴京（今开封市）。这时金王朝所辖的只有河南、陕西两省。在大敌入侵频繁，而金国军力日弱、赋税减少、帑藏告罄而国难当头的情况下，金朝君臣不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而是日夜陶醉于声色犬马，纵情享乐。每当蒙古兵南下，上下束手无策，相对饮泣。但蒙古兵来侵不在得地，掳掠奴隶和财物后便北返，金朝君臣又弹冠相庆，歌舞升平了。上行下效，贵臣、豪族、将相莫不掠民自肥，竞相享乐。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穷奢极侈生活，尽管河北地区几经兵燹，人民穷苦不堪，却横征暴敛，“民之赋税三倍于昔时”。白撒，金室贵族，他不读书，为人杆黠，好积财，能猜人主心，因而得宠，被任力将相。为将时，纵军四出抢掠、俘虏、屠杀，甚至掠人食之，哭声相接，尸骸盈野，所过残虐。他在汴京的西郊建房屋，规模拟宫殿，婢妾数百，都穿金缕衣，奴隶的每月奉给跟列将一样。他一饭费了数十金，还觉得难于下口（《金史·白撒列传》）。金大将纥石烈牙吾塔千方百计积财，甚至不择手段，他给妓女银符，派她们到各州郡去敲榨勒索，州将的妻都远出迎接，厚加贿赂。御史康锡上书弹劾，说：“朝廷如果纵容，适足害之。欲保存其人。应予制裁。”朝廷竟不治其罪（《金史·纥石烈牙吾塔列传》）。金朝将相如此，金朝前途可知。

自宋高宗赵构向金屈辱称臣，岁贡银、帛，求得江南偏安后，上下日夜宴乐西湖。之后，几代皇帝也屈辱求和。到宋理宗时更甚，他宠信奸臣丁大臣、内侍董宋臣等，招权纳贿，货赂公行，朝政日坏。尽管这时蒙古灭金后

准备南侵，南宋君臣仍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宋理宗制一舟，都用香楠木，用黄金装饰，极其豪华。公主驸马奉旨泛舟两湖，其游船装饰之奢侈，使杭州轰动，“倾都游观，都人为之罢市，”极一时之盛，仿佛是太平世界。皇亲国戚、公卿大臣、王侯将相的府第竞相比美，人们酣歌漫舞，极尽其享乐之能事，已忘却国难当头，宋理宗崇信僧道，祈祷保佑，故厚待僧道。史馆检阅黄震曾指出时弊最大的有三，即民穷，兵弱、士大夫无耻。他建议不再发给度僧人道士碟，待原有的僧人、道士死后，就收回其田归公，这样就可以富军国，纾民力。因当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黄震有这建议。理宗大怒，将黄震降职，贬任于德军通判（《宋史·黄震列传》）。宋理宗死，其子赵显继位，是为未恭帝。他即位时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以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贾似道原是个吃喝嫖赌的荡子，因其姊姊贾氏被理宗纳为贵妃，因而得到宠信，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而他之得到如此倚重，以至店来独擅朝政，是谎报战功取得的。而这个荡子虽居高位，其吃喝嫖赌本性并没有改变，而且更甚。有人赠他一翦梅词说：“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今事如何？金也消磨，粉也消磨，拓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娇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这词活活画出了在国难当头，奸臣贾似道仍沉缅酒色的荡子形象。据《宋史·贾似道列传》记载：公元1270年（宋度宗咸淳六年），蒙古兵围襄樊甚急，贾似道却在葛岭，日夜淫乐。有一日，度宗问他：“襄阳被围已三年，怎么办？”他谎称：“北兵已退，陛下哪里听到这种消息？”由贾似道这种人掌军权，南宋不亡何待！

2. 一场有预见之战

成吉思汗是个很杰出的军事家，他对金的战略部署了解很清楚，如何灭金早就“胸有成竹”。他在公元1228年，临危前就对其左右说，“金精兵在潼关，而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一时难以攻破。如果向宋借路，宋与金是世仇，心然同意。我军则南下唐、邓，直捣金首都汴京，金急，必征潼关兵，以潼关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能到不能战，我军必定破之！”（《元史·太祖纪》）。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位，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和路线，于1209年分兵三路大举攻金。次年，三路军会师汴京。这时潼关守军奉令急行军赴援汴京，长途行军疲惫和恐惧，士气低落，到洛南以南，被埋伏的蒙古兵截击，金军覆人，正如成吉思汗所料。金哀宗弃城出走，汴京守将投降。

窝阔台派使到宋，约共伐金。宋派使报谢，窝阔台允许灭金成功后，以河南地归宋，宋则供应蒙古粮秣。宋与蒙结盟伐金，既是金所促成，也是宋的大失策。所谓是“金所促成”，是指金被蒙不断侵入抢掠，便取自南宋以补己之所失，常常对宋发动战争，使其屈辱求和，岁输银、帛。当时蒙古强大，其吞并金、宋之心已明显摆着，宋、金两国有如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金是宋的屏障，如撤去这屏障，宋则暴露在蒙古兵的刀锋之下。而金如果与宋修好，联合抗蒙，那么蒙要灭金、宋则不那么容易。对此，金国有知之士、大臣术甲脱鲁灰则曾提醒哀宗说：“潼关险隘，兵精足用。但我国商、洛以南地区接近来境，大山重复，宋人不知守，我军亦不能越过宋境去屯戍。如果蒙古由散关入兴元（陕西汉中）、下金（陕西安康）、房（湖北房县），

绕出襄、汉，北入邓州边区，那则危险了。应与宋人释怨，谕唇亡齿寒之理，彼必答应。据其险以备，不然必败”（《金史·术甲脱鲁灰列传》）。但金哀宗置之不理。对于南宋来说，本来已有前车之鉴。北宋时，宋、辽对立，后起的女真族金常起兵侵辽，宋徽宗听别人建议，竟与金联盟攻辽，以夺回我国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于是与金订立所谓“海上之盟”。宋攻辽时虽大败，也削弱了辽国的实力，使金得以迅速消灭辽国。而北宋得到的只不过被金掳掠一空的燕京等一些荒地，却要输送给金朝大量钱财，而对宋最大不利的是，从此宋、金直接对立，经常在金朝刀锋之下，屈辱求存，岁输银、帛，才能苟延残喘。现在，南宋又忘记这历史教训，又步着北宋的后尘定去。

金哀宗率二千骑逃到归德，因缺粮，又投奔蔡州。宋、蒙按照签订的盟约，各派军围攻蔡州。蒙古将塔齐尔约兵临城下。宋大将孟珙率兵两万人，并带送给蒙古兵的粮秣三十万石，与蒙军会师，实践攻蔡州之约。宋哀宗自知大势已去，对侍臣说，“古无不亡之国，而亡国之君往往受尽侮辱，朕决不至于此。”他将位传给金室皇族大将完颜承麟。承麟即皇帝位，就出外指挥抵抗。这时，南面已立宋帜，四面呼声震天地。元军已攻入城，城中守军不能御。宋哀宗自缢于幽兰轩，纵火焚尸。末帝承麟在战斗中被杀。金国亡（《金史·哀宗纪》）。

3. 欺人自欺的悲剧

根据宋与蒙古夹击金人的盟约，灭金后，河南地均应归宋。因此，在金亡后，宋廷议收复三京，即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于是，派兵三路出击，占据三京。蒙古军背盟，发动反攻，三京再度陷落，宋军丧失战士十余万人。但这时，蒙古大军忙于西征，使宋暂时得到喘息机会。

蒙哥被蒙古贵族拥立为大汗后，于公元1258年（宝祐六年）到六盘山，与众将集议，分兵三路伐宋。蒙哥亲自领兵入蜀，使其弟忽必烈攻鄂州（今武汉），大将兀良合台攻潭州（今湘潭）。忽必烈军进围鄂州，并准备直取南宋都城临安。宋理宗甚为惊慌，忙令诸将出兵御敌，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自汉阳人督师。贾似道便密派宋京到忽必烈军中求和，其条件是，宋向蒙称臣，向蒙古岁贡银、绢，忽必烈加以拒绝。正在这时，蒙哥汗在钓鱼山死，合州守将王坚派人向贾似道报告，贾似道又派宋京前往向忽必烈再提议和条件，忽必烈也急于回去争帝位，这次就顺势答应了。忽必烈率大军北返，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什么蒙古兵已肃清。理宗受骗却认为似道立了再造宋朝的丰功伟绩，升似道为少傅、右丞相，召他入朝，并派百官前往郊迎（《宋史·贾似道列传》）。一时，贾似道这个骗子荣幸无比，声价百倍，成为宋朝的大功臣及其希望之所在。贾似道终于独擅政权。

本来，在忽必烈因蒙哥之死而他又急于北返争帝位，宋军可趁蒙古军心不稳之饥布置兵力追击，也许可重创蒙军。但既已议和，就应如实上报，厉兵秣马，保卫国土，而似道却以谎报邀功，君臣为“鄂州大捷”而欢欣鼓舞，忘记了国难，不把蒙古兵放在眼下，又沉缅下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如此欺人自欺，虽出于似道的骗局，实是宋朝的悲剧，似道后来不仅得到应有的报应，宋王朝的灭亡也不可挽救了。

骗局终被揭开的。忽必烈即位后，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使到南宋重申彼此息兵，要求宋践约，进贡岁币，似道怕其骗局被揭穿，便将郝经扣留。

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统军伐宋。元大军由襄阳出动，沿汉水入长江，顺流东下。南宋守将毫无斗志，纷纷不战而降，沿江重镇相继落入元军之手。这时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权仍由贾似道掌握。1275年，贾似道被迫率领各路军马十三万出战。军到芜湖，似道派使往见伯颜，重申称臣、贡岁币以求和，伯颜因其失信，加以拒绝。宋军在丁家州大败，似道乘单船奔扬州。明日，败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扬旗招之，都不到，有的还出恶言谩骂，似道兵败逃跑，他“鄂州大捷”的骗局被揭穿，被贬经广东，于途中被杀。1276年春，元军入临安，南宋恭帝及谢太后等上表投降，不久，被俘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后虽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忠贞之士坚持继续抗战，但彼此力量悬殊，文天祥在五城岭(今广东海丰北)兵败被俘，最后不屈被杀。宋端宗赵昷病死，张世杰、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死，张世杰突围遇风溺死，南宋亡。

二、蒙元崛起

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汗国，原只是一个小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其建国者成吉思汗，就其武功而论，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在世界历史上无人可以与之媲美。成吉思汗曾发动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西征三次，南征两次，及灭宋时，蒙古汗国的版图横跨欧亚大陆，面积三千万平方公里，共有五个子国，即元帝国(在中国)、察合台汗国(在中亚西亚北部)、窝阔台汗国(中国亚西亚南部)、钦察汗国(在俄国、东欧洲)、伊尔汗国(在伊朗、伊拉克)。

蒙古在中亚和欧洲的子国与本文无关，在这里探讨的是忽必烈何以能创建及其巩固元王朝的原因。

1. 战斗中日益成熟

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各个部落中，锻炼了一套战争的本领和杰出的指挥才能。而在他统治下的蒙古人，也都是在战争中不断成长的，精于骑射，善于冲杀，马术超人，来往如飞，故所向披靡。成吉思汗在其初起时被打败一次外，以后，他战无不胜。

蒙古人每次作战，都不是盲目的，必先摸清情况而后战，如成吉思汗在准备灭金以前，对全国情况，如地理、形势、战略等等，已摸得一清二楚，故能做出避开潼关的险阻、向宋借路从后进攻金的正确策略。即使在部队行军和扎营时，蒙古军也经常提高警惕，都以了解敌情放在首位。《黑鞑事略》曾记述蒙古人行军布阵情况：“蒙古人行军常恐中敌人的埋伏，即使是偏师也必先派精骑四出侦探，他们登高眺远，深哨远至一二百里，掩捕居者行昔，间左右前后的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哨兵回极后始作出行动的决定。凡野战，不利不进。催坚陷阵，全靠前锋；过敌阵，则三三五五，决不簇聚为敌所包；骑之分合、因敌而决定。由台而分，视指挥官马鞭之所向；由分而合，听角声而集中，自近而远，俄倾千里。夜聚则望烟火而知其所。”

蒙古兵过去南侵，目的在于掳掠奴隶和财物，而其攻城略地，凡抗拒的则屠城，后在耶律楚材等人的进谏下，这种作风才有所改变。及忽必烈即位，

有志于图中原，又受汉儒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影响，认识到得其地要得其民才能更好统治，于是破城后注意抚降安民。耶律楚材，是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他学问渊博，下笔成文，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成吉思汗破燕（今北平），闻其名，召见之，从此为成吉思汗谋划，甚彼见重。成吉思汗南征时，将渡黄河，通知逃难的老百姓，凡自动来降的免死。有的说：“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给降民，使他们回到家乡，因而活了很多。金都汴京将陷时，蒙大将速不台派人来说，“金人抗拒持久，蒙兵多死伤，城破之日，全屠之。”楚材立即入见成吉思汗说：“将士攻战数十年，无不是为了得土地和人民。得地而无民，这有何用！”成吉思汗犹豫不决。楚材说：“奇工巧匠，都在汴京，如果都杀，将无所获。”成吉思汗才同意，令罪只止于金皇族完颜氏，余都不问，当时，避兵燹而住在汴京的共有一百四十七万人（《元史·耶律楚材列传》）。如不是楚材谏止，这么多人将都被屠杀。忽必烈征大理，大理国主高祥拒命，杀蒙使者后逃走。忽必烈大怒，要屠大理城。张文谦与刘秉忠、姚枢等谏说：“杀使拒命的只是高祥，人民无罪，请宥之。”因此，大理人民得以全活。忽必烈率军伐宋，文谦与秉忠对忽必烈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说：“当与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忽必烈下令告诫诸将：“毋妄杀，毋焚人房屋，活捉的都释放（《元史·张文谦列传》）。

忽必烈一改蒙古人一贯屠杀掠夺的野蛮行为，注意抚降安民，说明其已认识到“得地必须得民”才能实行有效的统治。公元1275年（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向宋发动最后的总攻时，就下谕告参知政事高达说：“我国过去出征，所获得城邑，即委而去之，没有派兵戍守，由于随得随丢，致连年征战不息。而要图天下，取其土地和人民而已。如果得其地而无民，其地谁来居住。今要保守新附的域邑，使百姓安居乐业。”（《元史·世祖本纪》）正由于蒙古人从屠杀掠夺到安辑百姓的转变，使南宋军不拼死抵抗，蒙古兵也减少了死亡，故在最后的决战中，势如破竹，打败了南宋，最后统一了中国。

2. 招人才与之谋国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请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他的哥哥即宪宗让他主管漠南汉地。于是，他广招人才与之谋划国事。1242年，忽必烈召海云禅师到漠北讲佛法，海云将与他同来的刘秉忠推荐给他。秉忠论天下事如指掌，忽必烈甚为赏识，就留秉忠在藩邸，以后屡召见，虚心向他请教。从此，忽必烈不断召见中原汉地的儒士，问以治国之道。1247年，刘秉忠推荐张文谦、李德辉入幕府，同年被召见的还有窦默和张德辉等人。许衡、郝经、宋子贞等人也先后应召而至。这些人所读的无非儒学的“三皇五帝”治国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姚枢向忽必烈将儒学治国学说概括为八点，即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并提出三十条救时之弊。许衡在上疏中强调，为治之本，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窦默对忽必烈说：“君有过，臣当直言。今则不然，君说可臣亦以为可，君说否臣亦以为否，这非善政。”明日，猎者失一鹤，忽必烈大怒，侍臣从旁大声附和说应治猎者之罪。忽必烈恶其迎合，命人杖之，释猎者之过不问。可见窦默的言论对其影响。忽必烈

问窦默说：“朕欲求像唐魏征那样的人，现在有吗？”默答道：“许衡能犯颜谏净，刚毅不屈，史天泽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天泽时宣抚河南，忽必烈召天泽封为右丞相，以默为翰林侍讲学士。

由于忽必烈的见重，这些儒士都为之竭力献智，有的忠心则始终如一。忽必烈受命主管漠南汉地时，曾大宴藩邸群下，当上下高高兴兴欢饮时，只有姚枢默默不乐，他语重心长对忽必烈说：“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众，财赋之丰，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民都归我有，天子还有什么，他日如有廷臣提及此事，上心悔大权旁落，不如只掌兵，财赋、土地归之国家，军须所需向有司索取。如此，则事顺理安。”忽必烈便向上奏请，得蒙哥允许。当蒙哥对忽必烈怀疑时，姚枢指出“远将受祸”，提出让王妃王子留在朝廷，于是忽必烈带家属回去朝见蒙哥，兄弟相见终释前嫌。蒙哥死，继位人尚空，而其弟阿里不哥正在阴谋夺帝位，这时忽必烈正在率军围攻鄂州，郝经建议“断然班师，以定大计”，并提出对付阿里不哥的策略。忽必烈采纳其策，终即帝位。忽必烈派郝经到宋，促贾似道执行和议的条件，似道恐其“鄂州大捷”的谎报被揭穿，将郝经扣留于真州。郝经待下素严，又久被羁困，随来的多埋怨。经对他们说，“我终不能屈身辱命。你们不幸，宜忍以待之。我看宋朝也不久将亡了。”被扣留七年，郝经对之忠心不易。他坚持学术著作，撰写《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等书及文集，共数百卷。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伐宋，并派使到宋问扣留郝经之罪，宋惊，派使以礼送郝经归（《元史·郝经列传》）。

3. 随其俗以御其民

蒙古人数比他所征服的广大地区人数几乎是微不足道，而其之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其民，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其俗和用其民所习惯的国法以御其民。

由于汉地长期受儒教的影响，蒙古统治者就利用儒士为之效力，选取儒家学说有利于己者以统治汉民。蒙古人以游牧为生，当其初侵占的土地也想将之变为牧地。早在成吉思汗之世，他主要的精力在于西征，每次南侵志在掠夺，只留下部分军队留驻所侵占的汉地，而蒙古官更多聚敛自肥，官库无所入。成吉思汗将南征时，近臣别迭等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将汉地变为牧地。”耶律楚材说：“陛下南伐需要的军须，可取之于中原税赋，从田税、商税及盐、酒、铁冶、山泽中收取，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就足以供给，哪能说无补于国？”成吉思汗同意试行，结果如楚材所说。成吉思汗笑对楚材说：“你在朕左右，而能使国雨充足，南国之臣，谁能有你这样本事？”（《元史·耶律楚材列传》）。及忽必烈即位，更认识到按照蒙古那种游牧方式和统治方法来对待汉人不行，必须随汉俗采用汉法，才能更好地统治汉人。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之初，所派差役大大超过老百姓的负担限度，加上经常要抽调军马，以及蒙古官吏的烦扰，老百姓负担不了，便纷纷逃窜。因此，刘秉忠建议差役应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秉忠还以邢州的情况为例指出：“邢州原有万余户口，兵兴以来户口还不够数百，凋坏日甚。”秉忠建议：“应派良守张耕、刘肃等前去管理，才能恢复原貌。”忽必烈纳其言，以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副使。在他俩的治理下，流民逐渐回来复业，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邢州被列为顺德府（《元

史·刘秉忠列传》)。忽必烈即位之初，效汉法建立中书省，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弊，以安国便民为务。文谦对文统说：“民困日久，今又大旱，不酌量减轻赋税，人民则难以生活。”文统说：“上新即位，国家经费只靠税赋，如果减少，何以供给？”文谦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待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于是减常赋十分之四，商酒税十分之二（《元史·张文谦列传》）。

蒙古人利用儒教统治汉民，对于吐蕃地区则利用喇嘛教。因当时藏族人民普遍信仰喇嘛教，在其诸多教派中，以萨迦派影响最大，且早归顺蒙古，忽必烈即位后就加封萨迦法王八思巴为“国师”，设宣政院由其管理。宣政院负责具体事务的正职由朝廷任命，副的由“国师”推荐僧人担任。元朝这种因其俗以御其民和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对稳定吐蕃地区的统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忽必烈采取因其俗以御其民政策，只不过是一种统治的手段而已。忽必烈利用儒教，并不信仰儒教，他听儒士所建议的只限于有利本民族的东西，对于不符合本民族利益或习惯的则坚决拒绝。归附元朝的儒士想以儒学影响忽必烈，使其用儒学作为其治国总方针，只不过是白费心机而已。忽必烈从亲近、重用到疏远、排斥儒者的转变，正是说明这一点。他一直对儒学有所怀疑，如他认为金、宋因崇尚儒学而亡。至其晚年，他承认“朕左右已无复有汉人”（《元史·世祖纪》）。

在南征的过程中，由于战争或统治的需要，尽管蒙古人的手段或策略有所改变，但其本性和贪欲却依然故我。蒙古人始终将本民族高高置于各民族之上，各族官员都是在蒙族官员绝对领导之下为其服务的，所谓实现满汉联合统治之说没有实现，蒙人警惕地保持其民族性而下让其汉化。忽必烈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是统治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最早归附蒙古的西域、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是蒙古人的忠实的爪牙；第三等是汉人，指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他如此划分，是利用和促使各族人民矛盾以分而治之。并在法律上将各等级的待遇加以严格划分，汉人、南人尤其南人受到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如法律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还报，这是把汉人南人置于奴隶的地位。即使是一些力蒙古人建功立业的汉人，顶多在各级政权里只不过任个副职。

蒙古人的野心和贪欲是极大的，几乎想把整个地球都吞下。在灭南宋后，就向中国边邻各国进军，先后征伐日本、缅甸、占城、安南、爪哇五国。但这五次出征都以惨败告终。这说明在成吉思汗时蒙古铁骑战无不克的威武已成过去。这是因当时蒙古人的各级官将已成为养尊处优的大小奴隶主，其军队也过着优裕的生活，已没有拼死沙场的勇气，连爪哇那样一个小岛，前去远征的元军一万六千余人，大败撤回泉州时只剩下三千余人。这便是想凭武力征服天下的蒙元军队最后下场。这时，蒙元已开始向下坡路走去。

第九章 明朝创建

明王朝的创建者朱元璋，跟汉高祖一样都是白手起家，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平民皇帝。朱元璋与刘邦有其相似之处，固然都因有机遇，也与其素质良好有关。朱元璋生逢元末大乱之际，饥饿逼其投奔造反队伍以求生，开始未有任何奢望，只求不饿死而已。因其具有良好的素质，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因常订胜仗，人马日众，地盘日大，野心始萌，且渐逐膨胀，于是，想当皇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由于条件具备，且有志者事竟成，朱元璋芟除群雄后，即向北进军，终于消灭元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一、统一策略

朱元璋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每次作战，必与谋臣武将谋议而后决断，确定作战方针、具体措施。对强敌不畏怯，善于出奇制胜；对弱于己者也下轻敌。在作战总的指导思想，决策力求万全，作战稳步推进。当胜利条件具备时，就猛打猛追，取得胜利。

1. 打基础从虚拓展

对于任何创业者来说，打好基础最为重要。不打好基础而要想创业，是不可设想的。在楚、汉相争中，汉胜楚败都与基础打好与否有关。刘邦选关中为其立足之地，且治理得很巩固，故虽被项羽屡次打败，由于有后方支援，才能屡败屡战，坚持到最后胜利。项羽选彭城为都城，其地当时还不具备建都条件，因而后援无力，最后还不是被打败了。朱元璋能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他的力量可以独挡一面时，就以集庆为其根据地，并集中力量经营，力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元末，民族和阶级压迫更严重，民不堪其苦，纷纷起义。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义于颍，山童死，福通迎立其子林儿于亳，国号宋。徐寿辉于郢称帝。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郭子兴也于濠州举事，受宋节制。这时在皇觉寺的小行童朱元璋因饥饿投奔郭子兴。初当亲兵，因作战勇敢得到重用，成为独挡一面的将官。子兴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元兵十万来攻，元璋率军破之，元兵皆走渡江，郭子兴死，刘福通立的林儿政权，任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朱元璋愤然说：“大丈夫哪能受制于人。”不奉命。但考虑到林儿势盛可倚籍，便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明史·太祖本纪》）。

元璋略地到妙山时，定远人冯胜来投，他向元璋建议：“金陵地势龙蟠虎踞，是帝王之都，可先占据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就有希望可以定天下。”元璋深为赞赏（《明史·冯胜列传》）。因和州发生粮荒，元璋便渡江，破乐石，得资粮，诸将请归以济和州饥。元璋说：“渡江得胜，如弃而归，江东就非我所有。”便将所有的船缆都割断了，让船只漂去，以示不旧。他对诸将说：“太平甚近，当与公等取之。”就乘胜攻占太平，俘获元万户纳哈出。之后，攻入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元璋占有集庆后，因西有徐寿辉，东有张士诚，而自己力量还不够强大，便想与张士诚通好，以免两面受敌。他派使送书于士诚说：“昔日隗嚣称雄

于天水，今足下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我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希望以后信使往来，互相通好，不要惑于谗言，免生边畔。”士诚得书，扣留使者不回书。随派舟师攻镇江，元璋派徐达打败士诚军于龙潭。又派徐达、汤和攻常州，士诚兵来援，大败，便以书求和（《明史·张士诚列传》）。这时，朱元璋对陈友谅、张士诚不主动出击，其主攻方向是南面和东南面，夺取孤立、分散的元军据点，以扩大自己的地盘。

这时，朱元璋被诸将奉为吴国公。他听取儒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练兵备战，发展生产，减轻赋税，集中力量建设应天府，作为四出征战的后方基地。

2. 歼强敌以长击短

公元1360年，徐寿辉被其部属陈友谅所杀，友谅自称皇帝，建国号汉。友谅占有江西、湖广之地，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并约张士诚前来夹攻。这时，朱元璋兵力也不弱，已可与友谅、士诚一决雌雄。但让友谅、士诚合力，元璋将处于不利地位。另是，友谅舟师十倍于元璋，海战难与相敌。因此，跟谁先战和如何战。这是元璋在作战策略上必须解决的问题。元璋向刘基问及征取计，刘基说：“士诚只不过是个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肋下，名号不正，其地在我上游，无日不在想吞并我，应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图中原，王业可成。”陈友谅攻陷太平，谋东下，来势汹汹，诸将或主张投降，或主张奔据钟山，只有刘基瞪着眼不说话。元璋便召他入内，刘基说：“主张投降和逃奔的，要斩！”元璋问：“先生有什么计策？”刘基说：“贼骄傲，可诱其深入，伏兵击之，取胜不难。后发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一举。”（《明史·刘基列传》）于是，元璋排众议，采纳刘基的策略，便叫友谅的旧好康茂才致书友谅，说愿为内应，着友谅率军来攻。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江东桥，呼茂才不应。始知为所骗。因水路狭隘，仅容三舟入港，友谅舟不得并进，便想退出到大江，以舟冲江东桥，而原以木做的江东桥已改用铁石建筑，故冲不动。友谅便引舟向龙湾，友谅军只好舍船登陆，这就陷入元璋所设的伏兵圈。元璋军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要走上船，适潮退，船搁浅，船不能动，友谅军被杀和溺死的无数，被俘二万余人。友谅乘单船脱走。这次应天之战，是关系元璋的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元璋军得胜粉碎了友谅要消灭元璋的企图，使两军力量发生了变化，从两军力量悬殊到势均力敌，且优势正转向元璋这一边。元璋之所以能取胜，他不是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法，而是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先发制人的战术，逼使善于水战的敌军，只好舍船登陆作战，即舍己之长用其所短，而元璋就避己之所短用己之所长，故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元璋使茂才施振诈降计，使友谅单独提前率军前来，这就使友谅约士诚夹攻的计落空，避免了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故能集中力量以打击友谅军。

友谅不甘心失败，积极备战以反击。他造大船数百艘，都高数丈，有三层，艙箱都包铁，载家属、百官，亲率二十万大军包围洪都，攻三月不下。元璋率军救援。元璋军到，友谅撤围，东出鄱阳湖，两军遇于郎山，友谅将大船连锁列阵，友谅船高，元璋船小，不能仰攻，连战三日，处境危急。友谅骁将张定边直犯元璋坐船，而船搁浅，正在危险时，元璋大将常遇春射中定边，元璋船才得脱走。适东北风起，元璋派人纵火焚友谅船，其弟友仁等

被烧死。友仁号五王，盲一眼，有勇略，既死，友谅丧胆。明日复战，友谅又大败。友谅军欲退保鞵山，元璋已先派兵扼湖口，截其归路。友谅军益困，其左、右金吾将军先后投降。友谅军乏食，突围出湖口，元璋诸将自上游截击，两军大战于泾江口。是日，从上午战到日暮，两军还在激战。友谅军且斗且走，友谅被流矢射死，其军大溃。朱元璋率军攻破武昌，俘其子陈理而归（《明史·陈友谅列传》）。这次战斗，彼此都曾处于危境，胜败对于双方都有可能，而元璋终能取胜，这与其士气高有关。

3. 对弱敌也不骄忽

吴王张士诚据有浙西、两淮之地，因其地富裕，士诚渐奢纵，怠于政事，只图割据实无远图。元璋集中力量对付友谅，暂对士诚放松，灭友谅后再算。友谅曾约士诚夹攻元璋，士诚守境观变，表面同意，却不出兵。元璋打败友谅破武昌后，即吴王位，挥兵东向，以消灭士诚。他任命中书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万大军，西征张士诚。大军起程前，他召集全体将佐进行战前动员，告谕他们说：“陈友谅败灭，独士诚据有浙西、北连两淮之地，恃其强力，数侵我境，赖诸将连年征讨，已取两淮之地。今尚存浙西姑苏诸郡，故命卿等前去攻讨。”诸将再拜受命。将行，元璋问诸将：“你们此行，用师孰失？”常遇春答道：“逐果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捣姑苏，姑苏既破，其余诸郡可不劳而下。”元璋说：“不对。士诚起自盐贩，与张天骥、潘原明等强徒情如兄弟。士诚穷蹙，天骥辈惊其死，心并力相救。今不先分其势而急攻姑苏，如天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台，难以取胜。不如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再移兵姑苏，必然破之。”遇春犹坚持其议。元璋说：“攻湖州失利，责由我负；如先攻姑苏而失利，我将不宽贷你。”遇春才不敢再说（《明太祖实录》）。

战争按照元璋的部署顺利进行。徐达军先趋淮东，破泰州、通州后，围高邮。士诚率舟师来援，元璋率军击走之。徐达军攻入高邮，取淮安，全定淮北地。徐达随即移师直指平江，出檄文揭露士诚八大罪行。徐达军自太湖趋湖州，吴军迎战于毗山，又战于七里桥，都被打败。徐达军围湖州。士诚派朱暹、五太子等以六万众来援，屯兵于旧馆，筑五砦自固。徐达断其粮道。士诚见事危，亲督兵来战，败于皂林。旧馆援绝，五太子、朱暹、吕珍投降。五太子是士诚养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跃丈余，又善沉水，朱暹、吕珍都善战。徐达军攻占湖州。

在剪除士诚羽翼后，徐达率大军进攻平江，筑长围困之。士诚拒守数月。元璋曾致书和派人去劝其投降，士诚不理。士诚军有勇胜军号称“十条龙”者，每战穿银铠锦衣出入阵中，都骁猛善斗，也都战死。最后其丞相中砲死，城中惊惶无斗志。1667年9月，城破，士诚收余众战于万寿街东街，众散走。士诚慌忙回府，闭门自缢，其部将赵世雄解救；大将军徐达数次派人谕意，士诚闭目不答。送其上船，绝食。至金陵，自缢死，年四十七。元璋命以棺埋葬（《明史·张士诚列传》）。

4. 取元都先剪其羽

朱元璋灭张士诚并平定南方后，就开始北伐，以统一天下。在命诸将北伐前，对信国公徐达说：“自元失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起，人民涂炭。今欲命请公北伐，计将如何？”鄂国公常遇春答道：“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破彼久逸之卒，可轻易取胜。元都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进，余可建瓴而下。”元璋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如悬师深入，不能即破，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而敌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这对我很不利。我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移师河南，破其蕃篱；取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胜。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及关陇，可席卷而有。”诸将都赞同说：“好！”元璋对信国公徐达说：“兵法以庙算，胜者得多算。”（《明太祖实录》）朱元璋在芟除群雄后，其兵力已比元王朝强大，他仍主张继续采取灭张士诚时所用“先剪羽翼、后捣心腹”的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万全之策。先剪羽翼，使元都处于孤立无援，使占领区与原有地区连成一片，保证补给的源源不断，然后直捣元都，再移师西向。后来，战争的进程正是按照朱元璋的战略部署进行，因而取得了灭元的胜利，使朱元璋终于登上了皇帝位。

灭元后，朱元璋大宴请功臣。宴会后，在华盖殿上与徐达等谈话，他总结了灭元的建国经验说：“昔日四方纷乱，群雄竞起。朕与卿等，初起于乡土，只为生活所迫以求自全，并不想到要图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于子女，贪残者耽于货宝，奢侈者溺于富贵，剽贼者喜于战斗，他们都无救难之心，徒为生民之患。如张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陈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所恃者与卿等一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与士诚、友谅相拒时，有人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如先击友谅，则士诚必乘我后。殊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如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二寇既灭，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郡寇，乃取元都，或主张直取元都，兼攻陇蜀，都不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如此则先声既震，幽燕自倾，然后西征，可少解甲胄之劳。”（《明太祖实录》）

二、取胜之道

逐鹿英雄的得胜者，其取胜之道，包括诸多因素。有时好象某一个因素则可起决定性作用，其实有些因素却是互相联系，缺某些因素则不能发挥作用。从战争整体而论，必须发挥诸多因素的作用，才能取得全胜。例如要庙算胜，这就需要有一个智囊集体，因为任何智者靠个人的智力来决策，都不可能事事正确，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要能集诸多智者共同筹谋，为之献智竭力，必须礼贤下士、诚信待人、以仁德服人，这就关系到个人的素质问题。所以说，取胜的重要因素——庙算，跟个人素质、侍士如何都联系在一起。就“两军相争勇者胜”而论，“勇”与否，决定于士气如何，士气高则勇，士气低则怯。而士气高低，这决定于统帅御军的本领，如能否与士卒共甘苦，能否将将士团结如一人，以形成“父子兵”，如此，才能战无

不胜。否则，难打胜仗。而能否正确对待降俘，对敌方士气也有影响，能优俘抚降，在敌不利时，其将士则愿投降；如屠俘杀降，敌方将士只有拼死相搏。人心向往则是取胜的决定因素，没有人民的支持，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人心向往，善于庙算和良好的个人素质、礼贤下士以及优俘抚降，等等，都是取胜的因素。综观古代逐鹿得胜者，都是由于善于利用和发挥这诸多的因素之故。朱元璋也是如此，他才能芟除群雄，创建明王朝。

1. 布信义而守勤俭

朱元璋幼时家很贫穷，父母死无葬身之地，因饥饿无以活，只有造反以求生。由于他亲身受到元统治的双重压迫，即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对贪官污吏更为痛恨，因而与之划清界线，这在他即帝位后，对贪官污吏处置之严厉，与此有关。也因此，他举义旗，与元作殊死斗，严明军纪，保护人民。他认为其他逐鹿英雄，非暴即贫，毫无救民之心，而他无所恃，所恃的、且与他人不同的是“布信义，守勤俭”，此非虚语。泗州元降将薛显献金玉马鞍，元璋却之说：“今有事四方，所需的是人材，所用的是粟帛，宝玩非我所好。”他在征战所得金、帛都用来犒军。如龙湾之战，他尽发库中金、帛犒军，对鼓舞士气打败陈友谅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元璋日以继夜勤于军政务，即使他当皇帝后也如此。生活也艰苦朴素。他曾说：“从前有国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是理乱盛衰之所系。”有鉴于此，元璋反对奢侈。陈友谅曾造镂金床，巧夺天工，灭陈友谅后，江西行省将这床送给元璋，他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命毁之。

而陈友谅、张士诚和元顺帝之所以亡，莫不与奢侈腐化有关。《元史》作者认为元之亡是由“上下因循、纪纲废弛”。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躬行俭仆，公私分明，及其后代皇帝，横征暴敛，挥霍无度。到了元末，即元顺帝时更甚，尽管“京师大饥，加以疫病，民有父子相食者”，元顺帝还是滥行赏赐，广做佛事，盛宴狂欢于庙堂之上（《元史·顺帝本纪》）。而每次蒙古贵族进朝廷聚会，来自四面八方的地方蒙族大员，沿途骚扰，有如瘟神。不仅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奉，还到处放鹰走狗，围猎取乐，庄稼被毁，人民敢怒不敢言。赏赐数量之多也惊人，如对亲王、宗臣、庶官、卫士等赏赐金、帛、谷、币往往以万万计。因滥行赏赐，府库不足则刮自民间以补充。因此民不聊生，只有铤而走险。这便是元末大乱的重要起因。

陈友谅、张士诚等其初起时是为反元而造反，但他们不是为解民困，而是千方百计搜刮财宝以供其享乐。明·孔迩《云蕉馆纪谈》说：“友谅无远大志，处兵戈间而急于珍宝。其将征伐，必使之遍求珍宝。故善承意者甚至发冢行劫。”张士诚据有江浙地区后，只想享乐而无远图。上行下放，将相都尽情搜集金银财宝和美女，以供淫乐。尤其以其弟士信、婿元绍为最。士信在军中，也常载妇人，乐器自随；城被围时，还在食金桃饮美酒，飞炮射中其中人而死（《农田余话》）。元绍有美人数十，内有苏氏，才色兼美，醉后，横加其罪，将她杀了，以金盘盛其首于客宴（《国初群雄事略》）。这些人纵乐、残忍如此。

2. 集众智以明决断

朱元璋之所以能成大事，是因其能集众智以明决断。

在投郭子兴之初，朱元璋只是为求生存，及其具有一定的兵力时，他要干什么怎样干还不是明确的。他以刘邦的“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作为自己图天下的榜样，是李善长指点他的。朱元璋征浙东，攻占婺州时儒士许瑗进见，对元璋说：“今元祚已尽，天下大乱，豪杰之士都想施展其才。有雄略的人才能驭御雄材，有奇知的人才能识奇士。阁下要想平乱定天下，非收揽英雄，难以成功。”许瑗所说跟元璋想的一样，这时他正“思贤若渴”，因留许瑗参顶谋议（《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到处都虚心向才智之士请教，对他的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听取冯胜的建议，攻取集庆作为根据地；采纳朱升的“九字”方针，以免“树大招风”，踏实地扩充实力，经营好根据地，这使他能站稳脚跟，四出征战，处于有利的地位。

广招人才是朱元璋图天下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更好听取意见，朱元璋常请诸名儒到建康，讨论时事，给予隆重的礼遇。1363年5月，建设礼贤馆，刘基、章溢、宋濂、叶琛、陶安、苏伯衡等都接到馆中。元璋初用币聘，刘基不奉命，后再使人固请才出，既至，向元璋献时务十八策以后。朱元璋征战的不少战略战术，都是刘基为他谋划的（《明史·刘基列传》）。他辅佐元璋定天下，功勋很大，是明朝开国功臣。宋濂也常在元璋左右，论经史。宋濂说，“《春秋》是孔子褒善贬恶的书，如果能遵行，赏罚适中，天下可定。”又说：“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不得人心，金虽多有何用。”《明史·宋濂列传》章溢与刘基、叶琛、宋濂同到应天，元璋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能定？”溢答道：“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的才能定天下。”（《明史·章溢列传》）

朱元璋由于能“广揽群议，博收众议”，加上其个人素质良好和实战经验丰富，才智日增，故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一个小行重变成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公元1367年，灭土诚、平定南方后，元璋与太史令刘基、学士陶安等讨论北伐。刘基说：“土地日广，人民日众，可以席卷天下了。”元璋说：“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恃众。我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遇小敌，亦视如大敌，故取胜。今王业将成，中原虽动荡，也不能小看。”基说，“近灭张氏，彼已丧胆，乘胜长驱申原，给彼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彼难以抗御。”元璋说：“彼方犄角为声援，哪能急于长驱。彼虽有可亡之机，我要执可胜之道，要恃重才是万全之策，决不能骄忽致生不虞之患。”刘基是从整个形势看，认为可以乘胜长驱直入，而元璋从其实战经验得出的经验教训，即“每遇小敌，亦视如大敌”，“要恃重才是万全之策”。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北伐时仍坚持灭张士诚的“先剪羽翼，后捣心腹的计策。由于元璋有丰富的实战经历，又勤于学习兵法，每战不拘泥于古法，能随机应变，从敌我实际形势中确定战法，连智如刘基也服其神明。他与刘基论兵事，元璋说：“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任将不得人则兵必败。是以两军之间决生死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基说：“荷蒙圣上厚恩，基得侍左右。每观庙算，初谓未必尽对，及摧锋破敌，动如神明。臣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如主之胜。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这是不易做到的。”元璋说：“兵者，谋也。因敌敌，何必拘于古法？朕亲当矢石，观战阵之事，开合奇正，倾刻变化，犹如风云之变幻，要妙在于通其变哪能拘泥于古！”（《明太祖实录》）

3. 严军纪安民优俘

在朱元璋周围的儒士都强调“得人心为本”，这对他当然产生影响。在当时群雄中，朱元璋的军纪最严明，因其不扰民，故得人民的拥护。

朱元璋一贯军纪严明，如他在和州当总兵官时，将兵掠妇女的，都放她们回家。召集官吏父老谕之说：“元失其政，干戈蜂起，我来是为民除乱，其各安堵如故，贤士我礼用之，旧政不便的除之，吏无贪暴害我民。”人民大喜过望。派徐达等攻镇江时，戒之说：“我自起兵，未尝妄杀，今你等将兵往，当体我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都遵命，入城，号令严肃，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朱元璋亲征婺州，既入，元璋命骑士带令牌遍告军中：“毋杀人，毋掳掠妇女，毋烧房屋，违者依军法斩。”全军都遵令。于是，兵不离伍，市不易肆，开仓以济贫民。

朱元璋将起兵取浙东诸郡时，告谕诸将说：“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破城虽用武，而安民心以仁。我军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政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未下郡县，亦望风而归。我每听到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就喜不自胜。因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聚鹰鹫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于宽厚之政。为将者能有不杀之心，不只是国家之利，自己亦蒙其福。你们听我的话，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明太祖实录》）攻入平江时，徐达遵元璋命，向将士下令说：“掠民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既入，吴入安堵如故。元璋又谕中书省说：“东南久遭兵燹，民生调弊，尤其太平、应天诸郡，是我渡江开创地，供应烦劳已久。今人民贫困，有司又急催租税，加重负担，民何以堪。应免去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明史·太祖本纪》）优俘抚降，是分化敌人，壮大自己队伍的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对于敌方归降的将领一直采取优待，“赤心以待，随其才而任使。”如俘梁铤判于光来降，待之甚厚；及其回去，元璋亲到南门外送行，脱衣赐之。建昌平章王溥献全城来降，自备军食不支官粮，元璋于南门外造屋，给溥居住，名“宰相街”，以宠之。江西丞相胡廷（瑞）以南昌降，元璋入城拜候其母以使他安心（《国新事迹》）。

由于军纪严明不扰民，优待降俘因而人心向往，队伍日益壮大，这是朱元璋能芟除群雄、灭元的关键原因。

第十章 满清入关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国的元、清两个王朝，都是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蒙元崛起，遇到的对手——宋末期王朝，其在位的非昏君即幼主，故能轻取而代之。而满清南下逐鹿中原时，其对手是日夜勤于军国大事，想有所作为的崇祯皇帝，及逼使崇祯自缢、身经百战拥有百万大军的李闯王，为何都不堪清军一击，其原因何在？

一、胜利进军

满清的兴起，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等几代满清人英勇奋战的结果。总的说，清军与明军、大顺军的战争，几乎是每战必胜，可以说是胜利进军。其中有三次战争是关键性的，现将之概述如下，可以概见一斑。

1. 以优势逐个击破

满清的奠基者努尔哈赤，进兵辽沈与明朝公开分裂，是在他建立后金之后。在这以前，他任明朝建州左卫指挥使，自称他是在“保守天朝（明朝）九百五十余里边疆”，表面仍申明效忠于明朝。

《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载：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氏，先人世居长白山山东俄漠惠的俄朵里城，其部族称满州。元朝在这里设军民万户府，明初设建州卫。明总兵李梁成攻古勒城主阿太，城破，努尔哈赤和其祖、父及弟怡到这里探亲，其祖、父被明兵所杀。努尔哈赤和弟被明军所俘，成梁妻因见努尔哈赤相貌奇伟，便暗中把他及其弟放了。努尔哈赤归，用其祖遗留下的十三副甲，招兵买马，组织部队，誓报祖、父之仇。经过三十六年的征战，统一了女真各部和漠南蒙古大多数部落。他创建八旗制度和主持制定蒙文，建立后金政权。公元1618年4月14日，他发布“七大恨”讨伐明朝。他令左四旗兵攻陷东州，自己率右四旗兵袭抚顺，明守将李永芳投降，毁其城，班师，明总兵张承胤等率兵来追，回军击斩承胤等。之后，先后攻破抚安等五堡和雅鹊关。又攻破叶赫二十余寨。这时，后金兵主要是为抢掠，再取得奴隶、粮食和财货，便满载而归。

后金与明朝第一次大战是萨尔浒之战，他集中优势兵力，击败其中最强者的一路军，然后逐个解决。这次战役显示了努尔哈赤非凡的军事才能。初，明经略杨镐派使与努尔哈赤议和，彼此罢兵，努尔哈赤回书拒绝。于是，杨镐督师二十万，并征召叶赫、朝鲜兵，分兵四路进军：以总兵杜林为主力，出抚顺攻其西；以总兵马林合叶赫兵，出靖安堡攻其北；以总兵李如柏经清河堡，出雅鹊关攻其南；总兵刘綎，会朝鲜兵，出晾马佃攻其东。努尔哈赤接到情报，决定先击其强者，说：“明兵从南来，是想诱我南向，其在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便集中兵力先击明北军。杜林军渡过浑河后，留师扎营于萨尔浒，自率军攻界凡城。后金先行军已分一路骑兵援界凡守军，另一路骑兵袭其后，使杜林两部不能互援。努尔哈赤率大军攻萨尔浒，毁其垒，入夜袭击杜林军，杜林战死，其军大败。是日，马林军从东北清河、三岔来到尚间崖，努尔哈赤率军下山冲击，明军奔溃，马林仅以身免。努尔哈赤随

即移师南下，击东路明军。刘綎军正向阿布达里冈挺进。努尔哈赤设下埋伏，刘綎军人其埋伏网时，后金兵四起，刘綎兵败身死。杨镐急令北路李如柏军撤回，至虎栏，山上后金游骑鸣螺呼噪，明军以为后金兵到，仓惶逃奔，自相践踏，又死了千余人。

这一次战役，使后金与明朝在辽东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明朝已不能向后金进攻，只处于防御的地位。而后金势力日益强大，之后，侵占了沈阳和辽阳。努尔哈赤迁都于辽阳。

努尔哈赤从起兵以来几乎战无不胜，但最后攻明宁远时，却遭到了挫折。努尔哈赤来攻，宁前道袁崇焕同总兵满桂、副将祖大寿固守。天寒土冻，后金兵凿城不堕，城上放西洋炮，后金兵死伤甚众，据说努尔哈赤也受伤，才退军。努尔哈赤回到沈阳，对诸子说：“朕用兵以来，没有人能阻挡。袁崇焕何人，如此厉害！”不久，努尔哈赤死了。

2. 先围后伺机决战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因其有文武全才，又得到后金贵族的拥护，登上了皇位。他取明的意图更其明确，伐明已不只是为了抢掠，而是志在得其地统治其民，他是满清王朝的开创者。

据《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皇太极在登位之初，就纠正过去对汉人的错误政策，他宣布不论对满人或汉人，讼狱差役都应一样。以前，将汉人都分给满官当奴隶，现在将大多数汉人编户为民，让他们另外居住，选择廉正的汉官治理，并将汉人编为八旗，分别由汉将统领，称固山额真。其次放宽“逃人法”，过去汉人因不堪当奴隶之苦纷纷逃亡，一被捕获便处死；现在皇太极规定，以前逃亡的不予追究。在对明征伐时，严明军纪，告诫军民：“兴师伐明，拒者戮，降者勿扰。俘获的人，父母妻子不要使离散，勿淫人妇女，勿褫人衣服，勿毁庐舍器皿，勿伐果木，勿酗酒。违者罪无赦。固山额真等不禁，一样加罪。”在其伐明前，往往先以书议和，如其不从，则出师征伐，使其师出有名。并争取明将归附。在攻伐明城池时，他见明将恃节死守，认为这是因其人读书明理尽忠之故。而满人只喜骑射而不愿读书，因此，他令子弟年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都要读书。这些新的转变，使后金走上新的时期，对灭明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

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这标志着他公开宣布将取明而代之，统一中国，成为中国的皇帝。

皇太极是个杰出的军事家。在战略战术上，他不只敢于出奇创新，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做出新的决策。初，每战他猛攻猛打，因曾在锦州、宁远攻坚战中，由于袁崇焕以山海关为根本，在关外层层布防，且明军上下一心，皇太极率领的清兵除死伤狼藉外，毫无进展，他只好班师而回。他接受了这次教训，不正面攻强敌，而是避开锦、宁坚固的防线，穿过内蒙草原，经长城青峰口，直指北京，迫使袁崇焕回师护京师，并用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这次虽不得土地，已足使明统治者丧胆。他总结了前败后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战争不能光凭勇敢，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袁崇焕创立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使善于骑射的后金兵无所施其伎，便弃攻坚，先围困敌人而后伺机决战的策略，因而在大凌河之战和松锦决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

松锦决战是与当年努尔哈赤指挥的萨尔游激战并称为明清兴亡史上二次

战略决战。先是，皇太极在发动大凌河之役中取得围困逼敌降的战果。他分兵两路，一路由义州入驻锦州、大凌河之间，皇太极自将兵自白上场入广宁，会师于大凌河。皇太极下令说：“攻城恐伤士卒，当掘壕筑垒困之。敌如出，与战；外援到，迎击之。”便分八旗兵合围。围困明守军达三个多月，城内食尽，兵民相食。明几次派援兵来都被击退，守城军突围的也被消灭，守将被迫出降。长期以来，清兵一直被阻守于宁锦防线，不攻破宁锦防线，清兵则不能与明争天下。因此，于1640年春，皇太极决策攻打锦州。明朝急从陕西调洪承畴来总督蓟、辽军务。他统领八总兵、兵十三万出关援锦，到锦州南十八里的松山扎营。皇太极便倾全国之师，亲自领兵迎战。他将清兵布置在松山、杏山之间，自乌欣河南至海边，当大路立营。他仍实行大凌河之战的战术，即围困待机歼敌的战术，沿锦州至南海角掘三道大壕，壕外驻兵数重，严密围困，断绝明军饷道。如此，后金兵转攻为守，明军出战，屡被打败。皇太极告诫诸将说：“今夜明军可能逃遁！”他命诸将分地而守，敌逃，视其众寡，派兵出击，到塔山而止；分派诸将截塔山、杏山道及桑噶尔寨堡，皇太极亲自领兵自小凌河直抵海边，以断绝明军归路。这天晚上，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广恩等明总兵率所部沿海逃窜，为后金兵所掩杀，死伤无数。洪承畴率将吏入松山城坚守。明军被围困一年余，守松山的副将夏成德秘密投降，活捉洪承畴。接着，塔山、杏山两城也被攻破，松锦大战宣告结束。于是，山海关便暴露在清兵面前，其入关已指日可待了。

1643年（崇德八年），皇太极病死。

3. 待敌疲歼敌夺关

皇太极病死，由于生前未继承人，满清贵族发生皇位之争。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袞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都想继承皇位，彼此都拥有武装，都有拥护者，彼此各不相让，矛盾很尖锐。后经妥协，立年仅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改年号为顺治。多尔袞任摄政王，满清军政大权操纵在多尔袞的手里。统一中国的战争是由他指挥的。

这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已占领北京，逼使崇祯帝自尽于景山。明灭亡。李自成令明诸降将及吴三桂父亲吴骥致书招降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初，吴三桂决定归降，自率兵奔赴北京。可是，正在这时，刘宗敏占有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并拷打吴骥追赃。吴三桂行军到滦州闻知此事，极为愤怒，立即回师山海关，发布讨李自成檄文，并向满清求援。满清摄政王多尔袞得书，立即率军向山海关，驻军于西拉塔拉。多尔袞回书吴三桂，申明满清“底定中原，与民休息”的宗旨，同时表示对“崇祯惨亡，不胜发指”，要“用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这说明多尔袞把矛头由对明朝转向农民军，以争取原明朝文臣武将的支持和归附。并对吴三桂说：“伯如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报，世世子孙，长享富贵。”用封王保富贵来收买吴三桂，使其死心为满清效力。吴三桂得了新主子的赏识，十分高兴，立即派使请清军速进。清军于夜间越过宁远到沙河。李自成闻吴三桂据关抗拒，但不知他已降满清，立即亲率兵二十余万挟吴骥以行，奔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另派唐通率军从一片石越关外。吴三桂向多尔袞报告自成兵已出边。多尔袞令诸王迎击，败唐通于一片石。多尔袞率军到山海关，三桂出迎。多尔袞令所部以白布系肩做标记，先驱入关。自

成军自北山列阵，模互到海。满清军阵不及海岸。多尔袞下令说：“贼悍而众，不可轻敌。我观其阵大，首尾不相顾，我军可伺敌阵尾，待其疲而击之，必胜。”并令吴三桂军在翼后，令其军与自成军搏战。这时，大风扬沙，咫尺不能辨。两军鼓噪，战斗激烈。满清突然从三桂阵右出击，万马奔腾，矢如雨下，直指自成军中坚。自成登高望见，策马走。满清军追击，自成军大溃。多尔袞在军前封三桂为平西王，以马步兵各一万人属三桂，令他追击自成。召集诸将誓师说：“此行除暴安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加罪。”由于禁掠杀，果然生效，自关以西，逃窜于山谷的百姓都回归乡里。途中明将吏出降，命供职如故（《清史稿·多尔袞列传》）。三桂率兵追自成军到永平，自成杀吴驥，奔还北京，即帝位于武英殿后，退出北京。后来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杀，年仅三十九岁。

夺关大战的胜利，是决定满清统一中国的关键战役。从此，诸军所向无敌。多尔袞领兵直趋北京。由于兵不掠杀，归降的明文武官员供职如故，得到明官民的欢迎。之后，多尔袞接顺治帝到北京，继皇帝位，定都北京。多尔袞还采取各种措施以争取民心，如为崇祯帝发丧，令军民服丧三日；讼师诬陷良民，加等论罪；与民约，赋税除正额外，原明朝的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不照办，切实治罪。多尔袞原令汉军民都要薙发，因人民抗拒，便令暂缓。这些安民措施，对统一中国、巩固满清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成败原因

明朝之亡，大顺之败，满清之兴，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

1. 逃不脱亡国规律

崇祯皇帝对群臣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他在景山自缢前，在衣襟写道：“诸臣误朕”。至死还毫无悔改之心，不自责而将亡明之罪归咎于诸臣。

凡衰亡之国，都与君昏有关。由于君昏，用人不当，导致政治腐败，经济凋弊，人民活不下去，天下大乱，统治者也统治不下去，必被人取而代之。这便是一条亡国的规律，也是崇祯帝逃脱不掉的。

历史上的昏君有种种，但概而言之，却有两种，一种是昏乱无能，任由奸臣佞人摆布，明末这种昏君不少，如武宗、世宗、神宗、襄宗等；一种是想有所作为，事事干预，但其做事昏乱，把事情弄得乱糟糟，明毅宗崇祯皇帝就是这种昏君。明之亡，他应负其历史责任。

《明史·庄烈帝本纪》的作者对崇祯的评价是：“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割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朝廷则门户纠纷，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近声色，忧勤惕励，尽心治理。临朝感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非其人，益以误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处事错乱。祚讫运移，身罹祸变，亦气数使然。”崇祯帝自缢景山，不能归之于气数，人为还是主要的，应该说是自作自受。当然，我们说崇祯帝是昏君并非其一生所言所行都昏，正如作者所说的，“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割除奸逆”，这是指他除掉魏忠贤奸党，当时得到朝野的赞扬，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以

为天下可望“治平”。从崇祯帝的主观来说，他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位十七年，不近声色，勤劳治国，足以说明。从客观形势来说，当时内忧外患交逼，朝廷党派分立，之所以出现这种艰难局面，是他接受了其前辈所遗留下来的破烂摊子，这不能归咎于他。而后来把军国大事弄得一塌糊涂，责任就不能不由他来负了。作者说他用非其人，且一切事情都信任宦官，是其使明亡的要害，这是正确的。而他为何如此，作者却没有分析其原因。

笔者认为崇祯皇帝的致命伤是：他认为自己最高明，群臣都是草包，故得出了“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的结论，至死还怨恨“诸臣误朕”。凡自认“最高明”的人，往往会做错事，说昏话，颠倒是非。加上其人猜忌多疑，刚愎自用，对群臣不信任，这样，便只有相信自己了。既然群臣都是依包，他们的话就不会听入耳。如果说的与自己想的相反，更使他反感，不是被罢官、廷杖，就是遣戍赐死。而最听他的话还是他身边的寄生虫——宦官，于是，他从排斥宦官又回到宠信宦官了，由于他一切事情都要干预，都派自己的爪牙去管，所有的要职，重要部门都派宦官去任职，以进行控制。宦官人数到崇祯时竟增至十万人之多，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而这阉余的人，既无学识，又无办事经验，把事情越搞越坏，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必然的了。

如果崇祯帝善于用人，国事并非不可挽救。他曾“思得非常之材”，但“非常之材”在他眼前，不只不用，而是将他们毁了。如镇守宁锦防线的袁崇焕使满清不敢窥关，后崇祯帝被皇太极施反间计所迷惑，且都毫无根据，却把崇焕斩了。卢象升也是个抗诸名将，1683年，清兵入侵，蹂躏京畿、山东，崇祯帝因主张与清和议，对在前抗战的卢象升不予支援，使其孤军苦战，终于壮烈战死。

在国难当头，如能设法缓解与人民的矛盾，团结各阶层把斗争矛头引向清军，内忧外患不致越来越烈，清军就不会如此顺利入主中原。他虽下罪己诏，痛骂贪官污吏任意搜刮，致使民不聊生。话虽如此，他对造反的农民军恨之入骨，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不断增加剿饷，这就造成恶性循环，使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更加活不下去，只有参加造反，故越剿造反的人越多，李自成的农民军越来越大。

“聪明反被聪明误”。认为自己最高明，且猜忌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最后变成了孤家寡人，他的无所不在的十万宦官，当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城时，监视各部门的宦官都投降，其他宦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宦官，陪他自缢于景山。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悲剧。

2. 沉痛的历史教训

人们对于受到残酷压迫和剥削起来造反的人，总是怀着同情的心理。因此，对李自成造反队伍的忽兴忽灭，也深为惋惜。但从李自成及其他将相入关后的表现来看，他的灭亡又是不可避免的。

明末，昏君辈出，政治腐败，为官的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困苦不堪。一遇灾年，统治者置若不闻，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景况更惨。1627年，首先爆发于陕西的王二举行的起义，正是在荒年饥饿活不下去的情况下发生的。各地农民四起响应，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陕西农民军后来分成两支队伍，一支由李自成领导，一支由张献忠领导，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攻

城略地，给予明统治者严重打击。张献忠转战湖广、江西，之后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率军到河南时，杞县诸生李岩来投，李岩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两弊病，向李自成建议实行“均田”、“免粮”的政策，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动员群众，得到自成采纳。李岩还作免粮歌说：“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绥寇纪略》）远近传播，影响极大，千百万农民纷纷投入，使李自成兵马更扩大。李自成破洛阳，战项城、襄城，曾击破丁启睿、左良玉等数十万大军。之后，攻占襄阳，称“新顺王”。接着进占西安，建国大顺，自称“大顺王”。之后，攻入北京。

本来，李自成推翻明朝时，人心归附，又拥有百万大军，如果其治国有方，大顺朝是可以巩固的。但是，李自成入京后，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对降俘采取错误的政策。对敌斗争，分化瓦解敌人势力极其重要，而分化瓦解的妙方，是使归附的敌人心服为我所用，化仇敌为臣属，这就可削弱敌人而使自己壮大。李自成入京之初，在京明朝官员大都归降，但对他们不是很好安抚，而是掠打追赃，设“比饷镇抚司”专司其事。凡官僚缙绅，按其职位高低规定出银数多少，勋戚则无定数，如不照数交纳，则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明朝归顺的官员大多不能免，仅由权将军刘宗敏收拷的官员就有一、二千人之多。刘宗敏制造夹棍五千副散发各营，夹人无不骨碎。并派使到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向地方官员缙绅勒令输银助饷。大顺政权如此对待投降官员，必然促使他们反对新政权，对新政权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后来，满清入京，对明官员一律任官优待，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大顺将相开始腐化。在封建制度下，官员的腐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大顺将相除极少数如李岩等人外，大多开始腐化。在征战中还以“均田”、“免粮”为人做好事，入京后，他们想到的是自己，如何聚财享乐。刘宗敏住进豪华美宅，忙于搜美妇人淫乐，吴三桂的美丽的爱妾便是被他夺走，因而引起“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之事。吴三桂投清是其人品问题，但也与夺爱妾有关。初入城时，军纪还好，后来则不行了，“至夜则以防奸细为名，将马兵拦截街坊出路，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淫妇女，民始苦之。每至夜皆然。”（越士锦《甲申纪事》）将相如此，军纪如此，要想有昔日的军威已不可能。

胜利冲昏了头脑，这是李自成及其将相的致命伤。入京后，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等人不是致力于如何巩固新政权，而是忙于拷打原明官以追赃、筹备登极大典、开科取士等事，对军国大事，不闻不问。李自成则认为王业已定，只准备登基，对关外满清的情况则茫茫然。满清取代明朝的野心早就昭然若揭，要讨伐吴三桂，必防其与清勾结，而自成谋不及此，因胜利而自以为天下无敌，轻率地出军，结果被清军打败。

杀李岩众心离散。山海关大败，如果内部团结，仍可坚持抗战，而正在这时却发生内讧。当刘宗敏、牛金星等拷掠追赃时，只有李岩不参与，故为他们所忌。自成战败后，河南州县多背叛，自成召诸将商议，李岩请率兵前往招抚。李岩在河南甚得人心，他如往当事有可为。可是，牛金星私对自成说：“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人下。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是否应在岩身上？”所谓“十八子之讖”，是预言姓李的当为天子，便诬李岩欲反。自成令金星与李岩饮酒，杀之。从此，众俱解体。

3. 一个新兴的王国

满族突起于东北一隅，不论是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人口在中国中其人数也少，为何满清能先后打败明朝和大顺，统治偌大的中国？

从客观形势来说，当其窥视中原时，明朝早已腐败，且其对手崇祯皇帝虽想有所作为，但却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致使满清可以进入辽沈，且因其对内政策错误使李自成得以将其推翻，这时，满清的对手主要只有大顺。而由于大顺政权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终使满清入关主中原。

从其内因来说，满清之兴起也非偶然。概言之，其原因有四：

(1) 尚武精神。满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曾训练一支善于骑射的队伍，在统一女真各部落中，组成了能征善战的八旗兵部队。满族人民一直以善骑射为荣，其后代都坚持尚武精神，故满清贵族都能打仗。皇太极就曾谆谆告诫其子孙及后代说：“朕读史书，知道金世宗确是贤君。迄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的旧制，侈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告诫他们不要忘记祖宗法制，要努力练习骑射。其后世却没有遵守，以至亡国。我满清国人由于善骑射，以战则胜，以攻则取。以前有人屡次劝朕易满州衣服以从汉制，如果穿汉人宽阔的衣服，必废骑射，我决不会这样。但恐后世子孙忘记祖制，废骑射而效汉人，这值得忧虑。你们要谨记我的话。”

(2) 众议后定。众议后定，这是部落的遗风。这种遗风在满族建立清王朝后，仍然继续存在。皇太极是清朝的开创

者，他登皇位后，并不像明朝皇帝那样，独断独裁，而是大事都与其贵族议而后定。为了防止满清皇族违纪乱法，他设都察院来监察。他对都察院的官员说：“朕或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欧猎逸乐，不理政事，或弃忠任奸，升降官员不当，你们要直言无隐。诸王子或废职业，好财货以偷安，你们要揭发。六部或断事有错，审案延迟，你们要上告。明国陋习，衙门是贿赂之府，应当防检。挟仇诬陷别人，例当加罪。你们说得对，朕即实行；说得不对，朕不查问。”由于众议而后定，又有都察院监督，故决策、做事少出错误。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从努尔哈赤起，都不指定继承人，由有关贵族一起协商择其贤者而任之。皇太极就因其有文武全才，为其兄弟所佩服而推选出来的。

(3) 民风俭朴。历史上，一个新兴起的王朝，其开国者多俭朴，及其后代，逐渐奢华，至其末朝帝王大部穷奢极侈，以致衰亡。在封建王朝，皇帝有三宫六苑，嫔、妃无数，少的数千，多的达几万，光供养这些寄生虫，每天不知吮吸多少人民的血汗。如在明末崇祯帝时，他还算是不近声色的人，但其宫中也有宫女、太监十万九千人，而这些大都是用来侍候皇帝、皇后、嫔妃的，可见其嫔妃也极多。而满清的首几代皇帝，除皇后外，嫔妃只不过十人左右，宫女、太监不过六百余人。十万九千余与六百余人相比，其奢华与俭朴，确有天渊之别。正因其俭朴，取之于民则相对减少，故满清一入北京，为收买人心，立即宣布免除去明朝多过牛毛的税赋，只收田亩的正额租税。在明时，人民受繁重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满清王朝将之免掉，人民当然喜悦，也就拥护新王朝。当然，满清至其末期，也走一切封建末朝的老路，日益奢侈，这是后话了。

(4) 满汉联盟。努尔哈赤时，将俘虏的汉人作为奴隶，到皇太极即位才将这错误的政策纠正。他让汉官治汉人，汉将领汉兵，极力争取汉儒汉将，

如对范文程言听计从，为争取洪承畴投降想尽办法，对于为满清立功的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后来投清的吴三桂，都封为王，这些汉儒、汉将也就死心为满清卖命。由于满清充分利用汉儒、汉将，给其高官厚禄，故形成满汉上层的联盟，对中国各族实行统治。当然满清贵族高居于汉官之上，如同是宰相，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就要下跪。初，禁止满人与汉人通婚，以免被汉化。但由于满族文化、经济比汉族远远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逐渐汉化，其带头人是康熙，他是接受汉族文化成为满族高级知识分子的头一人。之后，满人都逐渐变成了汉人，难于分出彼此了。

